中国知青史?初澜

定宜庄

第 1 节：一从头说起(1)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20 世纪 50 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 50 年代有 50 年代的社会问题，50 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也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 50 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项政策是从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

一从头说起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

从 1953 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 和 1954 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涌入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

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 1953 年底为止，与 1949 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 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 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但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

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

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摆对

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迈入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 50 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

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旧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家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不是添办几所或几十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添办几千几万所学校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干部，还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国家用钱是有个统一的预算的；要想教育经费大量增加，就必须把别的开支大量减少……把哪方面的预算大加缩减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国家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钱最多，是不是把这笔

钱先拿来发展教育呢？按着这个办法做，国家把主要的财力和人力，不拿去办工厂、开矿山，不去修铁路公路，也不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去开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我们国家不要什么钢铁、石油和机器，少生产些大米、小麦和棉花。这就是要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永远停留在落后的水平，要我们大家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什么改善。这就是要削弱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物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本末倒置了(竟将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

第 2 节：一从头说起(2)

经济建设经费不能挪用，国防事业费更挪用不得。因为那样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就是放纵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胆发动侵略战争。战争，我们缺乏防御力量的战争，意味着工厂、学校、城市、村庄大量的遭破坏，老年人、青壮年、妇女儿童大批地被屠杀，我们的学校就是办得再多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中国青年》，1954 年第 14 期。

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这样一种不能相容的关系，未免有些绝对，事实上何至于此？就拿 1956 年亦即建国初期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为"冒进"的一年来说，教育经费也不过占国家总支出的 7?14％。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有些人已经认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们将此与行将垮台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说在国民党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 1946 年，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连 1％都不到。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发展一遇挫折，首先就紧缩教育经费，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2?不重视教育本身的规律

延安时期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而解放后从苏联接受下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两套不同模式的同时采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学等种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时而偏向这方，时而偏向那方的结果，就是教育所出现的不断的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一味贪多求快，或强调通过统一化、标准化提高教学质量。而当后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采取压缩的办法，以减少学生人数、放慢训练教师的速度为代价来进行"调整"，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从此便埋下了种子。以后的十余年，这一矛盾愈演愈烈，不仅在青年中间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领导人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

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 年、1957 年和 1962 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因此出现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长严重不满的原因，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3?教育形式的单一化

50 年代的宣传媒介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时，一再劝告人们不要一切依赖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毕业生采取将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但是，人们的这种依赖思想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由国家负责、由国家安排的做法，给了人们这样的幻觉。

第 3 节：一从头说起(3)

国家确实想将一切都包下来：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 1952 年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自 1952 年下半年至 1954 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全国有私立中学 1412 所，教职员工 34000 余人，学生 53 万余人，占全国中学学生总数的 26％强；全国有私立小学 8925 所，教职员工 55000 余人，学生 160 余万，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 3％强。接办工作虽计划到 1954 年完成，但实际上 1956 年才基本结束。，不如此，又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学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也自找门径。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弊病，它不仅使家境贫寒的孩子难以得到入学的保障，也常常使学有所成者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于是，国家包办一切，让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曾起到过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当公办学校面临国家经济困难或教育需要压缩整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低潮时期的时候，没有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来帮助缓解压力，就立刻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

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情况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教育上的大起大落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特点的一个反映。由于它与经济上的波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摇摆，幅度就特别大。尤为严重的是，当教育上的调整将大批不能升学的青少年压入社会的时候，却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处处超编，到处都向青年关闭大门，单一的经济和单一的办学体制，不具备自行调节压力的能力，国家就想到了农村。

1953 年，也就是建国的第四年，这样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

解放之初学校迅速增加、学生入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势头，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的问题。教育部遂于 1953 年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学的青少年，面临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思想混乱不安，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波动。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而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动员他们回乡遂成为当务之急。

第 4 节：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

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落后的农业拽住了工业起飞的翅膀，这个问题从 1953 年开始尖锐地显露出来。

国家采取的解决途径，从近处说，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涌入，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从长远说，是发展农业生产，当时摆在第一位的，是解决粮食

紧缺的危机，采取的方式，是加紧推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

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评价，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但上述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都与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1953-1954 年间的教育整顿，压力更多地是在农村。农村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与 1951 年、1952 年等年份相比，明显增加了。如山东省莱西县，1951 年和 1952 年两年高小毕业生共 3390 人，升学和参加工作的除外，留在乡里的是 1310 人；1953 年毕业 3518 人，留乡 2438 人；1954 年毕业 3514 人，留乡 3028 人。再如热河省(后来归入河北省)，1952 年暑期全省高小毕业生为 16894 人，未能升学的 9000 人；1953 年高小、初中毕业生 33757 人，有 25404 人未能升学。当时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大抵如是。

很多青年都把升学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升学考试之前就已经有人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是投陆军--流浪"周立波：《王秉源和韩文泰》，《中国青年》，1955 年第 20 期。。一旦落榜，痛不欲生。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8 月 5 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他表示："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魏巍：《创造幸福的家乡》，《中国青年》，1955 年第 22 期。这种现象，其实至今仍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感到陌生。

考不上学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第一愿望就是去城市寻找工作。在大量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中，他们一直占据着很大比例。但这一时期城市的控制措施，却使他们的期望成为泡影。许多回乡青年，甚至后来被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回乡青年，都曾有过四处托人找工作而不得的痛苦经历。总之，问题的严重，还不仅在于学校的压缩，而更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在这里，经济的原因是占第一位的。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如今我们很难断定这一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抑或只是权宜之计，但实行日久，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应该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

当然，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当经济发展再次出现高潮的时候，城市又会为他们提供大量就业的机会，于是大量已经回乡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会再次离开农村，1956 年、1958 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当干部、参军、女青年嫁人，也会使部分青年离开家乡。但总的原则是确定了，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没有改变。

这里，"回乡"二字，是问题的关键。家在农村又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别无其他选择。毕竟他们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国家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对待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国家不也是动员他们回乡吗？

然而，读过书的农民与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无论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农民送子弟读书，一向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出路，说到底，是为了脱离胼手胝足的田间劳动和贫困落后的农村，做"人上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历来的传统。解放初期工业、教育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尤其使农村青年对自己读书之后的前途抱有过高的期望。

不过，也不能把青年希望脱离农村，一概归结为落后的传统观念。人的才能不同，对职业的爱好不同，对自己的期望也不同，为什么除了回家乡务农以外不能有别的选择呢？受过教育的青年，谁又甘愿终生只看见头顶的一方天？后来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之所以每在农村组队，总会有超出预期人数成十倍的人报名，抛开其他原因不谈，很多农村知识青年，正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

第 5 节：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2)

历史上就已存在的城乡间的不平等，由此而在农村中的这些小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体现出来。本来城市与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平等，此时又由于在毕业之后不能升学而更明显，城市青年尚有等待和选择的机会，而农村青年却因只能被动员回乡这一做法而人为地加剧了。

然而，上面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个人有个人的理，国家也有国家的理，国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造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农村永远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而且多多益善。从实际情况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种需要的确显得十分迫切。

1951 年年底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 1953 年已经有很大进展。据当时公布的资料，当年全国已经有 43％的农户被组织进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内。这样一种组织机构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胜任不了的。因此国家向青年发出呼吁："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中国青年》，1954 年第 6 期。。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乡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再次，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李之钦：《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5 年第 16 期。。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话后来成为每个知识青年都背得烂熟的口号。但其中的第一句，却很少被人引用，当然更少为人所注意。其实毛泽东的话，是明确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

可以肯定，除了减轻人口就业压力，避免引起社会动荡这类较为被动的原因之外，在当时中国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之下，毛泽东和当时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确实对中小学生投入合作化运动从而改变农村面貌，抱着真诚的期望。这与"文化大革命"后把知识青年作为被改造对象送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其主导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当时农业部已经着手拟订训练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农业技术员、农具手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的计划。中央还曾设想做出这样一个规定：为了鼓励青年学生积极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一定年限后，成绩特别优异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生产合作社保送到中等农

业技术学校学习；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服务一定年限后，又有特殊成绩或贡献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地方政府保送到高等农业学校深造。这无疑是一个对农村发展、对中小学生本人都十分有益的设想。可惜的是，它始终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文化大革命"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似乎是这一做法的延伸，可是已经大大走样了。

第 6 节：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3)

总之，无论对合作化运动作何评价，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并期望他们在农村有一番作为，并在未来成为国家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骨干力量，这一做法的初衷不仅具有其合理性，也并非是没有可行性的。当时国家也没有要求回乡的中小学生一定要当普通农民，而是期望他们成为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至少使不得不回乡的青年较易接受这个现实。

读了几年书，然后因某种原因未继续升学，而又回乡务农的情况，无论何时都是存在的，但由国家作为一个政策提出来，通过各级组织进行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并加以大规模实施，则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我们将这一做法的实行，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端。

开端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1953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发表《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1954 年 1 月教育部召开中学教育会议，提出了要向小学、初中毕业生宣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道理"。

1954 年 4 月 22 日，青年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团委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要运用范例教育毕业生更好地准备参加劳动生产。

1954 年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提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中、小学毕业生之所以普遍发生紧张的升学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央教育部对中小学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教育思想，继续支配着广大教师和学生，这是中小学教育方针上一个带原则性的错误。

1954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绝对不可以分离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时要求批判那种认为做工、种地"太脏"、"太累"、"太丢人"，搞农业最没有出息，从事劳动生产以后再也不能学习文化和技术等错误思想。

1955 年上半年，宣传动员工作继续进行。当年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说："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还会有相当大的数量，为升学而引起的紧张状态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各地党委和政府必须继续加强对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安排工作"，配合这一指示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紧接着，中共中央又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中

小学毕业生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村文化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后备军。

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一场运动，却首先是从意识形态上开辟道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和动员，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以致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在经济上的真实起因。当然，在下乡务农就意味着放弃城市的物质享受和较之乡村更为优越的生活，意味着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美好理想的情况下，不如此又能怎样呢？何况发动这场运动的办法，只能是动员而不能是强迫，动员当然就是指从思想上进行动员。党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向传统观念的宣战。这是一场艰苦的企图改变人性的战斗。宣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同样重要、同样光荣，就是这场战斗的第一个阶段。

第 7 节：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4)

宣传动员采取如下几个形式：

第一是大造社会舆论。由各地党委、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布置工作，督促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和报告员、宣传员等广大的社会力量，并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对社会各阶层、学生家长、已经毕业和在校的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造成声势；同时让全国、全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这些人在当时社会上是很有感召力的)以写公开信、到学校等处与学生座谈并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表示欢迎《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安等纷纷写信给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欢迎他们从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3 日。，这些都是发动群众运动的一贯做法。当时的宣传有这样几个要点：

1?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新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劳动在今天社会中有崇高的荣誉，只有参加劳动才算找到了出路，才有发展的前途。即使升了学，也只是为将来更好地参加劳动创造条件。应该克服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不能人人都只想当专家，要知道专家也要从实践中锻炼出来。

2?工业劳动重要，农业劳动同样重要，新社会的劳动事业没有贵贱之分。我国的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而工业生产这几年来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仍只占很小成分。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决定了绝大多数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这一现实情况，不能一下子改变。

3?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批判那种认为当农民学的文化知识就没有用了、农业劳动又脏又累等错误思想。

第二是通过各级党、团和行政组织，层层下达文件，进行动员和落实。这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步骤。其具体措施，一般是责成各地党政部门、尤其是团组织，大力抓好思想教育和安置工作，尤其是要当成经常性的工作来抓，不要像有些地方那样，从防范中小学生不闹事不出乱子着眼，看成临时性的突击任务，甚至像有些地方那样应付一下就放弃，而是要真正重视起来。其具体做法，我们可以拿当年被作为先进经验进行广泛宣传的《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为例(辽西为旧省名，今已与辽宁省合并)：

该经验称，让干部统一认识，并组织他们深入开展宣传工作，这是妥善处理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该县党政领导于 1953 年 7 月召开区文教助理、小学校长、教育工会基层主席会议，吸收各区区长、区财务助理及县直属单位准备下乡的干部参加，结合小学的调整整顿工作，说明：其一，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拿不出更大的财力来办更多的中学，

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参加生产。其二，讲清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在一定时期内要把这一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执行。会后，要求各区区长回区后召开村干部会议，号召村干部正确处理自己子女亲戚的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分片集训小学教师，向他们讲清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指出必须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感情，教师应该以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协助学生家长妥善地安定不能升学学生的情绪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初等教育科：《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东北日报》，1954 年 4 月 19 日。。其三，做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这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家长往往是动员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而中央是在动员工作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第 8 节：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5)

1954 年 7 月 11 日，《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向家长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提出"还有许多家长，包括部分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依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把读书和从事体力劳动看成是两件不能相容的事情，不了解在劳动生产和业余学习中完全可以培养出色的人才"，并且提到："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忽视了家长的言论在社会舆论中所发生的重大作用"。对家长工作的重视，就是从此才开始的。

对家长的动员，采取了召开家长座谈会和进行个别访问的方式。《人民日报》曾推荐北京市宣武区的经验，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农村家长的，其内容包括深入了解研究家长的思想状况，在领导的重视下开好家长座谈会，从中发现和培养家长积极分子，以此来初步解决几个问题：一是解决要求子女单纯升学的思想问题；二是通过对有实际困难的家庭采取同情态度而使家长体会到政府对孩子的关怀；三是改变对待孩子的错误态度。据说这项经验在该区 19 个学校推广，收到很好效果，可谓后来办学习班做法的先声。

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容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并且家长包括了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认识、觉悟当然不会一样，所以，1955 年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提出应分别对待三类不同的家长：一类是农民家长，应该让他们劝说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不能继续升学时，愉快地回乡务农；一类是市民家长，应该告诉他们，孩子并非只有升学这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是就业，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包下来；一类是干部家长，他们应该懂得，谁也没有特权，升学并不高于一切。叶圣陶还向家长们呼吁，如果孩子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中国青年报》，1955 年 8 月 18 日。。

将干部家长特别提出来，已经透露出干部家长工作难做的信息。但当时党风尚端正，中央对干部约束尚严，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严重。

第 9 节：三榜样的力量(1)

三榜样的力量

国家希望中小学毕业生体谅国家不能多办学校的困难，为国家分担压力；国家还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去，成为国家在农村贯彻各项政策的得力助手和骨干。而青年希望国家为他们的前途和幸福提供保障，希望国家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当年常常谈及的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矛盾。

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也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必提的原则。但国家不能强迫，只能号召和说服，而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努力方向固然可以，让它成为个人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付诸实施则困难重重。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说白了，谁也不肯无偿牺牲，即使青年可以，在家长那里也行不通。当时有人针对青年提出的发展个性和选择个人前途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

既然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所有的青年都上中学、大学，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条件，而要求升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不可能达到的马铁丁：《"个性自由"及其他》，《中国青年》，1954 年第 4 期。。

当时的青年中，也有人直率地表示过自己的看法：

当然，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但是也包括着自己；既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也为了自己呢？如果有人说："我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不想什么个人生活享受问题"，那好吧，每天什么也不给他，或者是原来每月是一千分，现在每月给他一百分或几十分，他管保不满意或提出质问。因为过美好的生活是人的理想，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谁都有权利得到它，更有权利想到它。李楠枫：《谈谈我的认识--马铁丁同志复韩燕同志的信读后感》，《中国青年》，1956 年第 1 期。

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论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

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结合起来，这是关键。

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民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 年 4 月 25 日。。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非一下乡就能如此，国家又怎么能做出切实的允诺呢？

办法也是有的，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就是树立活的榜样，也就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失落，这使其他青年易于与他们认同，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他们得到赞扬，得到荣誉，得到了当时青年所最羡慕的东西："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今年她们突然像长上了一对翅膀，一下子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她们原来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但却享受了许多大学生也享受不到的光荣，这真是鹏程万里了。"《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 年 4 月 25 日。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们，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

当年的回乡知青大多承认，他们正是怀着对家乡美好前景的期待，抱定向这些先进青年学习的决心，回到农村去的。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这些曾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榜样，如今还有谁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呢？

第 10 节：三榜样的力量(2)

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几个典型吧。

徐建春。她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有个一群青年将毛泽东拥在中间的镜头，其中有个穿花格布袄的女青年，为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她就是徐建春。仅仅这个镜头，就足够让当年的青年羡慕和向往了。

徐建春本是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 年于后吕村完小毕业。她也做过继续读书的梦，但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她升学，她只好回乡帮助家里劳动。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她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由她担任组长，时年仅有 17 岁。不得不离开书本和校园，一度令她思想十分苦闷，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叫人家说我无能，就赌一口气，下最大的劲领导积极生产，但每逢遇到不好解决的困难，又想出去。"在这期间，她也曾报考过公安学校，并且考取，但在互助组组员们的挽留和党、团组织的劝说之下，她下决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此安心农村，不再动摇。

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她带头向老农学习，掌握了耕、耧、锄等生产技术。麦收时劳动力不够，她发动妇女下地生产，并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她利用自己能够识字、读报的优势，带领组员学习书报上的丰产知识，对互助组实行民主管理、分工负责，将小小的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自愿入组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情况很快就被当地党和政府发现和重视，并进行了大力宣传。

1952 年 10 月，在她回乡不到两年的时候，《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和担任互助组长的经过。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观礼，第二年又参加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

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的时候，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被推向了全国。1954 年 3 月 12 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

20 世纪 50 年代的青年是单纯的，他们把徐建春当成自己的伙伴，短短几个月，全国青年就给她写了 2000 多封信，他们有的向她倾诉对回乡务农一事的苦恼和疑虑："为啥叫我们往下坡溜去参加农业生产呢？难道叫我们做一辈子没出息的农妇吗？"辽西省新民县杏树坨子完小 10 名女学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 年 4 月 13 日。但更多的人是表示他们从中获得了力量和鼓舞："我们要像你一样在农业战线上立功"。浙江省萧山县振庭乡 12 名高小毕业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 年 4 月 13 日。他们想的是，徐建春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徐建春后来入了党，从互助组长到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女社长之一。她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她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最有力的例证。如今，在历经各次政治风波之后，她仍然是山东省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据笔者所知，这是知青明星中的唯一一人这里仅指截至 1995 年从知识青年典型而升任领导干部的人而言，并不包括那些曾有过知青经历而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如担任过河南省省长的刘少奇之子刘源等。。

第 11 节：三榜样的力量(3)

吕根泽。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的最初一批知青先进典型中，他的知名度仅次于徐建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个富饶的稻米产区，教育程度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据 1949 年的统计，延边的 749 个自然村，平均每村有 15 名中学生；137000 余户农户，平均每 12 户就有中学生 1 人，延边共 80 万人口，中学生占 1?4％。50 年代以后，延边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尤为迅速，1952 年已有小学 411 所，小学生 115900 余人；中学 37 所，中学生 24700 余人，比建国时又增加了 76％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学校教育情况及学生活动情况》，并参见《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适龄儿童就学率达到 92％。据 1957 年报载，该自治州已达到每户都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的程度《中国青年报》，1957 年 5 月 7 日。。"文化大革命"之前能从这里升起两颗朝鲜族的、全国级的知青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吕根泽，该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朝鲜族。1951 年春从龙井市中学初中毕业，他聪明好学，家境也不错，本来完全有条件升学，但因体检查出肺结核而不能报考高中。他曾感到"一切都结束了"，情绪极为低落。他想过升学是为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为前途。他懂得在新社会前途并不是升官发财，但他认为总该是一条有发展的出路，而这条路在家里是不能找到的。他觉得在家里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于是读遍所有能找到的书，这些书很多是敌伪时留下的旧书刊，他几乎误入歧途。就在这个关口，他得到了党团组织的及时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失学，而是才开始真正地走进学校。这所学校是丰富的，它不仅是农业大学，而且是社会大学"张志民：《一条宽阔的道路》，《中国青年》，1955 年第 1 期。。他从此积极投身于家乡的生产劳动中，开辟一块小小的农业试验田，向当地农民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担任全村的技术研究组组长。他们的互助组由于采用新的种植法，水稻每垧收获比从前的种法增产 2000 斤，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全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吕根泽的经历，被当地的青年团组织所发现，他们认为这中间体现了教育青年的一个原则问题--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问题，于是采写了报道文章，原来只打算送到《中国青年报》作为一般先进人物介绍一下，不料立即受到团中央的重视，因为对他事迹的宣传，"有助于协助党解决一部分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回乡安心务农的问题，而这正是当时农村青年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从而开展起来。1953 年 12 月 24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青年团中央写给吕根泽的信：

你热爱农村，投身于农业劳动，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并有力地推动了你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而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你的事迹，再一次告诉了农村广大知识青年如何与农业劳动相结合，向他们证明了知识青年从事农业有无限光辉的前途。

同时，该报还发表了署名王石采写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青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以及社论《用吕根泽的范例教育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均见《中国青年报》，1953 年 12 月 25 日。，12 月 30 日，吕根泽到县里，在有 1000 余名青

年参加的大会上接受了团中央和团省委给他的祝贺信，从此成为与徐建春齐名的回乡青年的先进人物。互助组转社后，他担任了合作社主任。

第 12 节：三榜样的力量(4)　|福哇 www.fval.cn 小说|

1954 年 2 月 17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在接见吕根泽时提出，要"让吕根泽到各地去做报告，以自己的体会向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说明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是必要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没有一定数量的知识青年参加是有困难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决不该都挤到学校和机关里去"。随后，吉林省团委在全省团县委书记会议上作出具体布置，采取几种方式广泛宣传。方式之一，是通过党报、团报和印发小册子对他的事迹进行广泛传播，其中仅小册子就印发 1 万多本，发到了各农村团支部，要求作为学习材料；方式之二，组织吕根泽到各县和青年直接见面，做报告，还利用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机，组织了一次全省规模的广播大会；方式之三，通过召开各种代表会、举办训练班，广泛进行宣传，全省有 13 个县 70 个区召开了知青代表会。据称，"这次宣传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在吉林省来说还是第一次，基本上达到了人人皆知"，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青年团吉林省委书记徐俊：《我们怎样运用吕根泽的先进事迹推动工作》，《中国青年报》，1954 年 8 月 3 日。。

我们在这里如此详细地引述这些宣传方式，是因为这些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为日后动员知识青年必不可少的形式。

在对吕根泽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该省团组织也强调了对他本人的教育和扶植工作。当地团工委派专人长期住在他那里，对他进行教育，防止可能发生的脱离群众、骄傲自满倾向，"一次他喝醉了酒，谈了一些不妥当的话，群众有些反映，地团工委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他在团支部大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互助组转社，也是上级派专人帮助完成的《海兰村团组织是怎样培养吕根泽的？》，《中国青年报》，1954 年 7 月 21 日。。这种极力把典型人为地往一个固定模子里套，企图将他们塑造成高大完美形象的做法，不仅使还十分年轻的典型本人扭曲了自己的才能和天性，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也使这些先进人物本身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其流弊之深，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都深有体会的。

吕根泽后来的生活道路，与徐建春不尽相同。他毕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出名之后，他开始学习汉语，以后又掌握了汉文。1958 年各地农村大办农业大学，他进入延吉县东成乡办的黎明业余农业大学学习，1961 年被公社党委保送到延边农学院深造，1961 年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在延边农学院讲师的帮助下，写成《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并且"进行了各种水稻育苗方法、水稻低产早熟和高产晚熟品种杂交、异种水稻杂交、水稻各种密植方法对比和水稻需水量调查等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活动，其中不少项已研究成功或取得一定成绩"《吕根泽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农业技术人材》，《中国青年报》，1960 年 11 月 14 日。。他被聘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助理研究员。他成为不同于徐建春的另一类典型：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典型。

吕根泽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也有活跃表现，1960 年也就是三年灾害发展最为严重的一年，他曾代表他所在的海兰生产队，与后来的著名知青典型邢燕子展开"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立功"的友谊竞赛，这场只在报纸上轰轰烈烈，却无多少社会反响的活动如今看来更像一台只为演给人看的戏。此后也曾几经风雨的吕根泽，成为延边农业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直至如今。

第 13 节：三榜样的力量(5) txt 小說下載|www.txteb.cn

杨明汉。他未曾像徐建春、吕根泽那样耀眼，仅仅是当时宣传的大批知青典型中的一个，但他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吕根泽出名之后，有了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有了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像他这样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想"成长为"什么人才都是不难的。可是，以"青年技术革新者"的称号被树立为全国知识青年典型的杨明汉，当年的道路就艰难多了。

杨明汉是广东省罗定县上池乡田边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1950 年考入广东西江农业学校，1952 年春因患脑病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他从小喜欢田间，十二三岁就学会了种地、割禾等简单操作，对回乡生产并无多大抵触情绪。他的家乡是个贫瘠的半山区，粮食产量很低，他在自家的田里搞合理密植，搞"人工降雨法"的实验，还尝试着改良土壤。1953 年，他获得了全县丰产模范的称号。

但杨明汉并不满足。他深感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村里也不具备搞科学实验的条件，连最简单的工具也没有。同时，他也找不到供参考的理论书籍。于是，他决定先到广州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资，至少可以添置些实验用的工具。他得到了广州工务段党支书邓汉的热情支持，邓汉为他写了找省农业试验场的介绍信，还发动工友为他凑齐了路费。下面是杨明汉自己写的在广州的经历：

我怀着激奋的心情来到了试验场。

接见我的是该场人事科的邝湘同志。她简单地问："你到这里做什么？"

我拿出邓汉同志的介绍信和以前他们场里给我的鼓励信，并向她说明我想学习些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她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穿的一身农民衣服，就说："我不认识什么邓汉同志，为什么信内只盖私章？"我说："介绍信的信封上盖有公章。"

她又盘问着："你为什么到工务段里来？"

我又详细地把自己在研究中的困难说了一遍。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摇摇头说："人民政府发给我场的经费，只供给我们使用，怎能抽一部分给你另外开支呢？我们也不能抽一套工具给你单独试验，你希望在我场学习，你带来了生活费吗？你怎么不经过县里选派，自己就跑来了……工具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好吧，就这样吧!"

她既不好好看介绍信，又不好好听我的解释，也未请示他们的领导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把我拒绝了。我想，他们场里在给我的信上，不是说"如果有困难，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为什么她竟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我躺在床上，急得连饭也不想吃。

这时，邓汉同志又来找我，他已看出我的苦闷，赶紧问我"结果怎样？"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接着把这趟不愉快的访问详细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鼓励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我的，并叫我写篇稿子给《南方日报》，要我"狠狠地批评她一顿"。

对，当天我就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三天以后，未见回音。邓汉同志要我自己到《南方日报》跑一趟，"直接找他们谈谈，也许能解决问题"。

到了报社，读者来件组的陆梦羊同志接见了我。可是，他还没把我的情况摸清楚，就把

我当成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并批判我想知道丁颖同志(著名水稻专家)的"千粒穗"经验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我向他解释后他才说："好吧!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和要求很不小，我们得再考虑考虑，以后再帮助你解决。"

第 14 节：三榜样的力量(6)

三天又过去了。在邓汉同志的鼓励下，我又一次到报社去。这次，他们替我给广东农业厅的负责同志写了封简单的介绍信。

我拿着这封介绍信到了省农业厅，我把信交给传达同志，等了一阵，传达同志出来把原信交给我了。信上用红毛笔批了这么一句："华南农学院李副院长接洽。"

我拿着这封信到了石牌，见到了华南农学院李沛文副院长。李副院长很热心，听了我的要求和意见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介绍我到省农业试验场稻作场参观了丁颖同志的"千粒穗"的标本(只是看了一下，因没有人详细讲解)，帮助我找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当时的确有些客观困难，都没有成功。

我想，我是个青年人，青年团的组织一定会帮助我的。在这期间，我到过青年团华南工委两趟。可是组织部的温玉清同志简单地说："这是农业厅的事，你还是去找农业技术部门吧。"

就这样，我白跑了一趟广州。回到家以后，我的心很久都安不下来……

后来，他的母校罗定中学的行政部门和师生们闻知此事，为他送去一些实验用器材和书籍，才使他将实验进行下去。杨明汉：《仅仅是开始》，《中国青年》，1955 年第 10 期；《冷淡与打击--记杨明汉在革新技术中的遭遇》，《中国青年报》，1955 年 4 月 14 日。

1954 年 11 月，他的实验终获成效，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华南农学院院长即上面提到的著名水稻专家丁颖等人闻讯后，先后到他村里参观了水稻实验田，肯定了他的成绩，也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杨明汉从此名扬全国，他于是月入团，被评为农业技术革新能手、先进知青典型，各省、市团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青年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动员的框架就这样大体搭起来了，以"活生生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来教育青年，是这个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也要根据组织的需要来成长，在那种能够把"做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口号公开喊出来的气氛下，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正常。

第 15 节：四一条可行的道路(1)

四一条可行的道路

在这场运动中，全部工作的重点，都是落实在"动员"二字之上的，就是千方百计把青年动员回乡。从这点来说，到 1956 年春为止，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是顺利的，这与当时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以及随之进行的夸大宣传很有关系，很多青年思想中产生了农村就要跨入社会主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错觉。

截至 1954 年 10 月为止，据辽宁、河南等 11 个省、北京等 3 个直辖市和湖北、四川两省部分县、市的统计，初中毕业生已经从事生产劳动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 77000 余人，占不能升学人数的 78％。另据辽宁、北京等 7 个省、市和江苏等 4 个省的部分县、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 446000 余人，约占不能升学人数的 68?5％。

没有就业的，大都是家住城市的年纪较小的学生。

从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情况来看，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才是从事工业生产。如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 5 省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 27 万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将近 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只占 12?1％。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工业发达的省市或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省，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就较多，如河北省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占从事劳动生产或其他工作的 63?6％(参加农业生产的只占 6?4％)，旅大市达到 89?5％。与此相反，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而工业不甚发达的河南省，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只有约 17％从事工业生产，其余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国家从中总结出了这条动员知青务农的道路是可行的，今后不仅是对高小毕业生，就是对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动员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外，也主要是组织他们去从事农业生产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 年)，《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对于 1954 年各省回乡知识青年的具体情况，报刊公布的数字是零散的。今略举几例：吉林省，应届高小毕业生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 4750 人，回乡务农的有 68776 人，大多数在互助合作组织里担任各种职务。河南省，1954 年高小、初中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的有 15 万余人，另有 13000 余人参加了郑州专区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又如华北，到 1954 年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其中蓟县 1953 年、1954 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有 1700 余人《华北大批高小和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 年 5 月 17 日。；山西朔县 1953 年曾有 350 多名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山东省，三年来已有 30 余万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占三年高小毕业生总数 52 万的大半，其中文登专区 7 万余名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中，在乡的 6 万名左右，绝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莱阳专区据不完全统计，1953 年高小毕业生有 34000 名，其中 24400 余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山东三十余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 年 5 月 26 日。。总之，从地区来看，大抵北方比南方为多；而从文化程度来看，是"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8 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

要统计这一时期回乡中小学毕业生的准确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统计资料，而尤其是因为这批人的流动性特别大，有人虽回乡，并未参加农业生产，有的是回乡自学以准备来年的升学考试，有的在当地找到工作，有的女青年后来又嫁到城市等等。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投入了农业劳动，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成为一支"可以依靠的突击力量"。据胡耀邦 1955 年在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在现有的 65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 1?7 亿人，其中担任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 290 万人。据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印发的《莱西县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调查报告》提供，农业合作社的前景吸引着这批学生，在该乡 1954 年毕业的 3000 余名学生中，在合作社、互助组中任干部的有 783 人，还有 1335 人担任了宣传员、教师、卫生员等。报告认为问题在于高小毕业生太少。莱西县一共 10 余万农户，按一个合作社(指初级社)25 户计，全县应建 4000 多个社，以每个社平均设置会计、技术员、计账员等各一名计，就需要 20000 多人，在合作化程度较高的乡，高小毕业生已呈"供不应求"之势。此外如吉林省舒兰县，1954 年参加农业生产的 3892 名中小学生中，入社入组的有 3789 名，其中任社主任的 9 名，任互助组长的 64 名，任会计、记账员的 1789 名；山东省荣成县的 198 个农业社会计中，高小毕业生占 103 人，等等。后来名闻全国的劳动模范吕玉兰、周明山等，就都是十几岁就当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干部，徐建春更是

典型的例子。

然而，将青年动员回乡，未必意味着这场运动就获得了成功。从直接效果来说，回乡只是第一步，回乡之后是否能够巩固住，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能否在农村发挥预期的作用，还关系到今后的动员能否继续顺利进行。而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诸多纰漏。

第 16 节：四一条可行的道路(2)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宣传中最让青年们动心的，是国家为合作化运动所描绘的远景："老是弄小农经济，确是没有干头，可是搞伟大的合作化运动，这就大有出息，大有干头了。"合作化至少带给他们两个希望，一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给予他们进一步学习技术和文化的机会；二是农村的面貌会很快得到改观，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但回乡之后，他们面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第一，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并不像知识青年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它本身的种种失误开始暴露，到 1956 年，南方各省中有的甚至已将合作社自行解散，使回乡知青产生信心的立足点发生了动摇，很多青年发现"高级合作化不过如此"。加上很多地方发生灾情，生产减产，于是大量农村青年不再安心农业生产，要求外出，其中多半是农村知识青年，很多还担任着合作社的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甚至社长等工作，有些是青年团员，在受灾减产和城市、铁路附近的地方，这种现象尤其普遍。他们说自己是"身在乡里，眼在城里，心在厂里"，整天想办法到城市找工作。

第二，动员工作本身的失误也是不可推卸的，主管这项工作的人，从上到下，都只把精力放在将青年送回农村这一环之上，只要把人送回乡，就完事大吉，再无人过问。人们大概以为，出现这种大批青年无处安排的危机，只是暂时现象，以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切自然就会好起来，更多的干部则只图敷衍塞责于一时，根本不关心以后怎样。

青年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有这样几方面，第一是无人关心和过问，把他们混同于普通农民，一些村干部，将他们视为多余的人物和负担，任凭他们在农村苦闷彷徨。1955 年 7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纠正不关心在乡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现象》，提到他们接到不少回乡青年的来信，反映团组织对他们关心不够，有的甚至不管。如山西省潞安县鹿家庄的 5 个高小毕业生谈到：

回村后人们瞧不起我们，团组织不管我们，连家长也不满意我们。想为大伙办事，得到的却是冷淡。去年做人口登记工作，李文安一不小心，表格填得不够清楚，社里会计就说："凭你这两下，还想当记工员！"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可是怎样学到，我们没办法。今年社里技术员们听过八九次农业技术传授，我们"没资格"，连一次也没有听。回村上快一年啦，村上团支部没找我们谈谈心。我们还要问问团潞安县委的同志们，听说团县委共有十八九个干部，团县委机关经常住着五六个人，可是一年啦，我们很少见过他们的面。我们村附近乡住着两个县委的同志，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就是来也是转一转就走了，从来没问过我们的事情。今年这半年乡里团总支收到县委送来的十二三份指示、通知和号召，七八份通报和材料，可竟没有一份是谈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的。奇怪呀，团县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黑龙江巴彦县宝山村高小毕业生冯树斌、湖南省衡阳县麓山乡 5 个高小毕业生等也都写信说，因为没人管，很多人就到处去找工作，有的人还被荒诞色情小说毒害了。这些来信都要求团组织更多地关心这些回乡青年，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帮助和支持他们。

第 17 节：四一条可行的道路(3)

第三，劳动报酬不合理。吉林省舒兰县东兴村东隆农业社高小毕业生杨树春、朱显忠写信说，今年春耕倒粪，队长高玉田分配他们倒一堆粪(实际是一天倒不完的活)，答应给 5 分，因两人劳动热情很高，中午也没休息，到下午 5 点多就倒完了。可是到晚上评分时，队长却说他们不守劳动纪律，天不黑就回家，给评了 2 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第四，农村干部素质差，回乡青年本身期望值又过高，加上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多种因素，常与干部乃至农民发生矛盾，不仅不能如预想的那样受到重视，甚至处处受到冷淡打击。在杨道纬采写的《三里沟村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这样苦恼？》一文中提到：山东蓬莱县绪谷乡三里沟村共有回乡青年 22 人，其中初中毕业生 7 人，高小毕业生 15 人，现已有 8 人出外。这些青年人都是从 1953 年起陆续毕业回乡的，当时的理想有三条，第一条当农业技术员；第二条当劳动能手；第三条当拖拉机手。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非常高涨，1954 年积极组织民校，把村里文娱工作搞得很活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慢慢苦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村里、社里不使用我们。"乡长姜恒芝说，青年人没有实际经验，工作上办法少，起作用不大，选干部时总是选不上。现在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当干部的，连原来在初级社当记工员的三个知识青年在转高级社后，村干部也不让他们当了。他们还提到，知识青年给干部提意见，受到干部的无理指责。如去年冬天社里不和社员商量，就指定郑富当生产队长，郑富工作上有很多缺点，社员都不同意，知识青年向乡里、县里提意见，要求民主选举，提出乡干部管社不民主、办民校不解决经费等问题，乡干部反而批评青年"太调皮，不服从领导"。加上青年们组织自学小组却因无人过问而垮台，入团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问题，很多青年不再安心务农，而是盲目跑出去找工作。

这些问题，事实上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在本质上是与文化、与知识对立的，它往往通过对知识青年的反感、歧视、排挤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当时那种美化劳动人民的气氛下，满腔热情的青年对此不可能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宣传上过于强调农村对知识和知识青年的渴求，而淡化甚至回避农村存在的落后顽固的习惯势力，尤其使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与迷茫。事实上，这种旧势力本来也不是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所能对付得了的，徐建春、吕根泽和吕玉兰那种一回乡就被推选为互助组长、合作社长的情况，并不能说就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知识青年若真要在农村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作强大后盾，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一些地区的领导是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并曾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委发出《关于积极吸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必须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文件规定：

1?训练各乡办社干部和各种业务技术人员时，必须适当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训练。在进行全乡办社规划时，应把本乡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组问题同时进行安排，领导他们协助乡人委会进行有关合作化运动与各种政令宣传、群众识字教育、业余文娱活动等，不使他们投闲置散。

第 18 节：四一条可行的道路(4)

2?各普通中学应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增加学生的农业基本科学知识。

3?各地农业技术指导站和农业技术学校、银行和其他财经机关、人民医院和医务机关、文化馆和文艺团体，应有计划派遣业务知识较有修养的干部，主动、认真地协助训练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经常和他们联系，使他们迅速成为有用人才《中国青年报》，1955 年 10 月 5 日。。

这类指示，若能在各地切实贯彻，会收到很大效果，但影响这些规定贯彻下去的因素实在太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很多党、团组织和地方领导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而且在解放之初，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农民，有强烈的农民观念和意识，他们并不认为这支力量有多么可贵，包括较高层的领导中也有人如此，所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才要呼吁说："我们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强调要做好回乡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工作，不仅因为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是国家安置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办法，也就是他们的主要出路，而且由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合作化运动中，迫切地需要着他们"《中国青年报》，1955 年 10 月 5 日。。

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是一个整体。虽然土改以后不再在青年中划分阶级成分，但每个人身上却都是打上阶级烙印的。青年回乡后，要与自己的家庭在一道生活，出身和成分问题就比在城市中更为突出。

解放初期，能够从初中、高小毕业的贫农、下中农子弟并不很多，而在土地改革的硝烟尚未散尽的农村，地富子女回乡的境遇显然是颇为尴尬的。地富分子是否能够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地富子女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在 1954 年已被很尖锐地提出来《中国青年》答读者问《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回乡后能否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中国青年》，1954 年第 18 期。，一两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据《中国青年》杂志载：

有一位在团区委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现在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中，有一些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我们感到很不好办：不明白这些青年能不能入社，因为近几年来对地主和富农，一般是坚决不接收的；也不明白是不是能让他们当民校教师，虽然现在扫盲的民师很缺乏；更不明白团的组织是不是也要去帮助和教育他们；有的基层团组织对其中有些是青年团员，思想很不通，说他们家是地主，富农，怎么能入团呢？"

须知这封信的发表，已经是 1956 年初了严如平：《不要歧视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中国青年》，1956 年第 2 期。。

对于搞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从原则来说，他们可以入社。可是我国农村原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地进行生产和过活，这就使他们入社的问题和家庭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青年》的答复是颇为含混的，说地富子女入社，"原则上说是可以的。由于有一些文化知识，对开展组内、社内文化教育和改进农业技术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不免要牵连到他家中其他成员是否也要参加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寻求解决办法"，"被雇用是个妥善办法，暂时不能加入，应以正确态度对待"。所谓"被雇用"，其歧视之意已很明显。而"应以正确态度对待"，简直就是一种应付，可以想见地富出身的青年看到这种答复会作何感想。

第 19 节：四一条可行的道路(5)

195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

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12 页。。

勉强可用来当文化教员，却仍未明确答复是否可以让他们入社的问题，地富子女在农村的处境可知。这种歧视和不信任，后来日趋恶化，基本上是被与地富本身同等看待。他们在家乡很难再谈什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其千方百计逃避还乡也就是必然的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自 1955 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辍学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在 1956 年初达到高潮。据 1956 年初教育部的初步统计，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 510 万人，初中生达 15 万人，其中如广西省 1955 年小学学生比 1953 年减少 24 万；黑龙江省小学在校学生退学 12 万人以上，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10％；辽宁省十个县市中学生退学休学 9499 人。据当时的教育部长张奚若的讲话，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 50％以上，而且仍在发展。他认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必须迅速制止这种现象，否则就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妨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实现，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教育部长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并见《人民日报》社论：《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人民日报》，1956 年 3 月 30 日。

张奚若认为，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其原因，据他的分析，一是动员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计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 1956 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辍学风。

张奚若的讲话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据教育部当年 7 月的统计，退学风在河北、江苏、黑龙江等 15 个省市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河北省公立小学减少了 30 万学生，福建大田县有七分之一学生流动。

这是人们尤其是农民对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做法的一次沉默的抵制。既然读书之后仍然要握锄把，何必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送子弟上学呢？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情况让普通百姓感到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遇上一次城市招工的机会，或者遇上合作社有可待填补的干部名额，谁又肯将其白白放过呢？谁能知道赶上自己毕业那年形势会是什么样呢？说到底，还是难以接受读了书再去当农民的事实。

第 20 节：四一条可行的道路(6)

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反应是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即使认识到了，他们也只是将它归结为资产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并决心从此与

这种传统观念展开斗争。

好在 1956 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又一次冒进，使这一切矛盾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又开始盲目招收职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 1956 年 9 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 224 万，其中 76 万余来自农村。到当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已达 2473 万，比 1949 年增加了 3 倍多，不少单位招收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增加的职工。这对于那些对互助合作运动热情大大减退的农村知识青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有文化，在招工中有着比一般农村青年更有利的条件，这使他们纷纷丢下锄把重新涌入城市。而这年城市工人、干部进行的评级加薪，造成了城市职工与农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更加剧了回乡青年的不满情绪和向城市涌动的浪潮。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的过热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从来都是同步的。1956 年，大中学校招生数量也突然增加。据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 年初中毕业生一共是 787073 人，而当年高中计划招收新生 366120 人，中专招生 421596 人，初中毕业生即使全部升学也不能满额，只能动员前几届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报考，教育部还特别规定，不得限制已经在农业合作社担任了负责干部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的工作，可由村中的高小毕业生接任，这不仅使从 1954 年开始的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的工作遭到瓦解，也为 1957 年再度开始的动员工作造成强大的阻力。

但是，大幕毕竟已经拉开了，而且开场戏看来还唱得不坏，这使中央坚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这次动员还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

第 21 节：一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1)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随着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在全国的普遍深入展开，"知识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专用名词，取代了以往常用的"中小学毕业生"、"青年学生"等说法。

自从国家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之日起，"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就开始有了明确的限定，它特指原来持有城市户口，下乡时享受国家给予的安置费待遇的青年学生。从下乡前的身份说，它包括了应届毕业生和以往毕业后未能在城市就业的"社会青年"；从上山下乡的去向说，则包括了到国营农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新社员，以及到生产建设兵团和边疆务农场的以往的"支边青年"。

过去所常常使用的"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词，已经被"回乡知识青年"代替，"知青"与"回乡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既然不享受国家的任何照顾，它的概念就宽泛多了。

与 50 年代的"中小学毕业生"相比，知识青年的文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高中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年龄却有所下降，应届毕业生基本都在 15 岁到 20 岁之间，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中形形色色的家庭。

知识青年，从此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册。但还要指出的是，在十年动乱之前，它还不是一代人的代名词，它的人数和影响，都还是相当有限的。

一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即使是"文革"期间下乡插过队的人，也有很多并不知晓"文革"前就有过知青和上山下乡，但是，只要向他们提起邢燕子和侯隽，他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看来，知青还真是早就有了。

知青典型并不"典型"，他们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优秀的人物，但知青这一群体却的确是因他们而闻名。

我们前面已多次叙述过这些先进人物，但典型已成为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则是 60 年代中央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之后的事。

从知识青年中物色先进典型作为榜样，已经是动员知青下乡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三年灾害时期再次动员知青下乡时，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对动员工作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63 年 10 月周总理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以后，团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 50 到 100 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 年 10 月 23 日。

可见，这种"以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在他们已是轻车熟路。典型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不仅不为人们所讳言，而且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就曾明确提出：

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中国青年》，1965 年第 14 期。

这已经把树立典型的作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树立典型的具体操作这时也已系统化，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来发现典型，阐扬它的重大意义；第二步是发现之后，立即深入下去，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反复推广，使之在广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响。50 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徐建春和 60 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这样被反复宣传而树立起来的。直到"文革"以后，每当动员知青下乡时，各种宣传媒介都要将她们再次抬出来。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了。

从 1963 年开始，树立典型的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甚至"文革"期间树立的典型，其广泛性和家喻户晓的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时期典型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开花"，几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每一类型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典型被树立，被各种宣传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一个经全局性的周密部署而形成的知青先进群体。十年动乱期间树立知青典型的活动，则因缺乏这样有效的运作而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难以对典型加以反复推广、反复宣传，后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阴谋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树立起来的如"白卷先生"张铁生，彼时再想造成 60 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 22 节：一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2)

应该承认的是，先进典型中很多人，下乡前就是学校的好学生，或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或是班级和共青团的学生干部，所以在学生和青年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听党的话，心甘情愿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品质。每次动员上山下乡，各地党团组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选这样的学生，动员他们带头。作为一批下乡青年中的骨干，他们是听话的，很多人就此自愿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在从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三好学生"和团干部。他们往往还未离开城市，就已被树立为先进典型，被宣传为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样。由于他们原来所具有的威信，也因为他们确实有高于一般下乡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所以这样的典型，对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

但是他们自己，却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因为绝大多数典型并未能如邢燕子、侯隽那样闻名全国，他们下乡以后，往往就混同于普通知青，经历着与普通知青并无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难。所不同的，只是与其他知青相比，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

宣传先进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早在 50 年代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采用定期召开回乡知青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做法，使各级领导得以听取回乡知青从下面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也为各自居住于偏僻乡村的知青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形式。后来一些地方利用这个机会表彰先进知青，结果发现比起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更能扩大宣传面，也更易引起上级的重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谈到，早在 50 年代，吉林省在宣传吕根泽这个全国典型时，便同时在该省 13 个县培养了 185 个先进人物，并为此而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举作为先进经验公开推广之后，各省纷纷仿效。1954 年、1955 年前后，山东、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其中湖南召开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的回乡知青代表有 250 人，当时的全国著名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还是省)的邓祚荣和广东省的杨明汉等纷纷写信向大会祝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1954 年 12 月共青团中央组织北京、天津和黑龙江等地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垦荒，翌年黑龙江省就召开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以作为对这一影响到全国的垦荒运动的一次检阅。在 1955 年 9 月，徐建春等 14 名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在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动员回乡生产的青年们投入扫盲等活动中去。1957 年，中央关于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刚一作出，河北省就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为此发去了贺信，这些做法，造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动和感召作用，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

1963 年团中央在全国大规模宣传知青先进典型的同时，也再次运用了这一宣传形式。团中央青农部工作组在"农村知识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这表明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是很好的宣传。他们还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是 1964 年的"五四"青年节时，召开一次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来未得实施。但想将规模和声势搞得越大越好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第 23 节：一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3)

此后，各省纷纷召开了旨在造成动员声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一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必然到会并且讲话，各路先进知青代表云集省会，介绍经验，老典型

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热闹的背后，浮夸、虚假、形式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除了作为动员知青下乡的一种宣传之外，也成为各级领导向上级表示对此项工作之重视并进而表功的方式。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因此而被掩盖了。

从 1963 年到 1966 年的上半年，各类报刊上对此类会议的报道层出不穷，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了关于这一阶段各省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可参见刘小萌、定宜庄等编撰的《中国知青事典》有关条目，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新的先进典型往往通过这种大会被"打出"，已经出名的则通过参加大会而增加知名度。这种大会是知青明星的活动舞台，知青明星的参与也为大会增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做法，被作为成功经验传下来，一直沿袭到"文革"期间知青大规模下乡之时，并最终成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厌恶。

第 24 节：二青春无悔(1)

二青春无悔

我们在这里先介绍当年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两个人物：董加耕和侯隽，这是中国知青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笔。

（一）侯隽

她和邢燕子，是知识青年典型中保持令名最长久，因而知名度也最高的两个人。

侯隽，1962 年于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少女时代她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想，当时党号召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她受邢燕子、王培珍等榜样的鼓舞，决心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她在农村无亲无故，便与一个同学一道，下到了那个同学的老家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从我们前面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那时的城市知青，绝大多数是因各种原因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而且基本上被集体安排在城市近郊的国营农场，下乡插队的试点，在外省刚刚开始，在北京还未提上日程，她是真的走在时代前面了。

虽然与她同时代的青年，都具有热情浪漫、满怀革命激情的特点，但就在这代人中，她也要算是最热情浪漫的一个。因为作为一个品学兼优而且家庭条件优越的高中毕业生，她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可是却将这一主要是为安置那些在城市无法安排的人的政策，当成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就身体力行之了。作家黄宗英将采写她的报告文学冠以《特别的姑娘》之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她的这段历史，曾被以她署名的文章和各种宣传媒介，在十余年间反复地讲述、渲染，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但今天读来，却仍然饶有兴味。

她下乡后的遭遇，是几乎每个下乡知青都曾经历过的，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她那个同伴在窦家桥的"家"，其实是一间在土改时分得的空屋，没有人住，也没有一件农具，做饭还得现搭锅台。女伴很快就离她而去。艰苦，尤其是难耐的孤独，使她也动过离开的念头。她曾想到国营农场去，那也是支援农业，不算当"逃兵"。但她下乡的这个县实在是个"宝地"，全国著名的邢燕子和最早的"铁姑娘"张秀敏都出在这里，也因此而不断吸引着记者、作家的目光。就在她感到最无助的时候，著名电影演员也兼作家的黄宗英来到这里。她本是来采访邢燕子和"铁姑娘"的，听人说到侯隽，就到她的小屋与她同住了几日。回京后，她将此事讲给了周恩来，我们在上一章说过，此时正值 1963 年夏，周恩来刚好在筹划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而且拟将安置方向从国营农场改到农村插队落户之时，他立即看到了树

立侯隽这一典型的意义。1963 年 7 月 13 日，《中国青年报》以《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的姑娘"》为题刊发了报道，仅仅几天以后的 7 月 19 日，共青团天津地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的活动。7 月 23 日，黄宗英与另一作者合写的《特别的姑娘》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紧接着，全国各大报也都纷纷发表了报道和评论，这些评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如《光明日报》评论所说：

(在侯隽下乡的)短短一年里，回答了为许多初高中学生思想上共同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国营农场的人数，比起人民公社生产队来总是少数，因此，要靠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家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或是组织起来从事边沿地带的垦殖生产。侯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比较艰苦的，但正因为艰苦，也更好地锻炼了人。《光明日报》，1963 年 8 月 19 日。

这便是宣传侯隽的特别意义所在。

侯隽毕竟是北京的高中生，其文化素质与邢燕子、张秀敏等高小毕业的农村青年不可同日而语，她也因此受到当时到天津考察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特别的关怀。周扬于 1964 年 3 月间几次专程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宝坻、遵化等县农村，邀请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四十多人进行座谈，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上山下乡对消灭"三大差别"的意义，号召青年们"做农民的新一代，也做知识分子的新一代"。这个号召，无疑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周扬同志就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作重要讲话》，《天津日报》，1964 年 3 月 15 日。。

此行中周扬还专门访问了侯隽的家，与她进行了交谈。"文革"开始，周扬成为刘少奇在文化界设置的"黑爪牙"后，侯隽曾多次回忆起这场谈话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刘少奇和他的爪牙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主意……周扬对我说："把你们这些人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的。这个广阔的天地不只是产粮食、出经济作物、出工业原料的地方，也是出各种干部、出各种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学者、作家都不是出在通都大邑，而是出在穷乡僻壤。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应当出更多的人才么?"

"你与工农结合，又经过了实践，有资本，比我们强，就把你的亲身经历写一写，就是一本好小说嘛"……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些话不是味，完全违背毛主席教导--我没理周扬那一套鬼话。侯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汇报》，1968 年 5 月 14 日。

周扬拉我上他们把持的旧清华，妄图中断我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干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我坚决不去。《坚持乡村，不断革命--侯隽在甘肃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甘肃日报》，1975 年 7 月 9 日。

我坚决回答：从下乡那天起，我就不打算当文学家了……难道办民校、革命文化站、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都不重要，只有写小说重要吗?侯隽：《我们决不上中国赫鲁晓夫的当》，《人民日报》，1967 年 6 月 23 日。

虽然与周扬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大意恐怕不差。周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基本上遵循了刘少奇 1957 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他们期望通过这一运动培养出一些人才。周扬毕竟是文人，刘少奇所想的人才，更多的是县长、省长、中央委员，是干部，周扬想到的，则是文学家，是学者。他们的想法，与毛泽东当时所要培养

的革命接班人相比，是有些"不对味"。事实上，这作为解决城市剩余人口的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固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再进一步，说到期望知青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只好凭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其实谁都心中无数。

侯隽名声大噪是在"文革"期间，她的活动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相终始，能做到这点的知青典型只有她和邢燕子两人。1976 年她曾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说过很多过头话，但也向上级反映过知青的不少真实情况，并为他们奔走呼吁。无论如何，她的名字已经与那个时代，与"知青"二字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一种象征。

第 25 节：二青春无悔(2)

（二）董加耕

董加耕的光芒曾一度盖过了邢、侯两人以及所有其他知青典型，但"文革"一开始，就暗淡下去了。

董加耕是回乡知青。他原名董嘉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 年夏高中毕业，他在升学志愿书上填写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加耕"，回到了家乡。他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贫农后代，在中学就入了党，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农村青年中甚属难得。在当时高校招生强调政治成分的情况下，他本来很有把握进入大学并进而成为农村青年所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的，他却能主动放弃这一切，因此，从他下乡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在他下乡一年后的 1962 年，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就以《目标始终如一--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还乡前后》为题，报道了他的回乡经过，但这时他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董加耕名声大振是在 1963 年下半年，也就是中央制定了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以后。在是年 11 月团中央于苏州召开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汇报会议上，江苏省汇报了董加耕的情况并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重视。此时回乡知识青年中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回乡知青总数的 6%左右，是思想波动最大的一部分人，团中央急于在回乡的高中生中树立新的标兵人物，董加耕便应运而生了。

从 1964 年年初开始，先是《中国青年报》，然后是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都不惜篇幅对他加以大肆报道，其规格甚至连 1960 年对邢燕子的宣传也无法相比。他的务农日记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杂志上全文刊载，那个时代特有的铿锵语句顿时就响彻了全国：

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解放前，第一线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

体力劳动是一座不朽的熔炉，我是一块矿石，一定要炼成不锈之钢。

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称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是勇敢的革命先锋，说他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道路。《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人民日报》，1964 年 3 月 20 日。

董加耕作为知青典型的巅峰，是在这一年的 12 月 26 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 70 岁生日，

破例设了三桌便宴，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圈定，董加耕和邢燕子分坐在毛的左右。毛泽东在从 1955 年直到"文革"爆发之间的十余年间，对已经颇具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迄未置一词，即使是这次便宴，他也没有哪怕一句话直接谈及此事，但按照当时的习惯，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董加耕和邢燕子本人最大的赞许和鼓励了。

对董加耕的宣传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几个月内就收到数百封信。

知识青年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不可否认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真诚。当时江西省赣州四中有个名叫赵恒错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班长、共青团员、四好(三好之上再加劳动好)学生，他与三个同班同学熊强年、宋柏林、刘捷民分别改名为赵恒耕、熊长耕、宋志耕和刘永耕，组成"四耕小组"，将他们四人的照片寄给董加耕，并且提出"学加耕，比加耕，四耕赶一耕"的口号，放弃高考，到离开市区三百多里的山区插队务农。这种做法，在当年曾风行一时。

第 26 节：二青春无悔(3)

董加耕自己也曾谈到，当一切已经结束的二十多年之后，一次他出差住进常州的一家旅馆，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后围过来，他们说他们都当过知青，都是学习他的榜样才下乡的，这使他感慨万端。

"文革"爆发，他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县组织了"拔黑旗"战斗队，矛头都是指向他的。县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编了一本《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广为散发。这些批判，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自愿下乡，到底有没有私人动机?他们说他其实是大学迷，只是几次未达到目的，才想出这么个哗众取宠的主意。

如今再来判断这些揭发材料的真伪，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即使他曾真的梦寐以求想上大学，即使他曾有过所谓的个人动机，也无可厚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在当时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衡量模范人物的标准，如今看来在概念上就存在着矛盾。但在当时，这些揭发的确使他备受磨难，这颗夺目的知青明星一下子就殒落了。

董加耕和侯隽尽管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与后来"文革"期间知青被"大拨轰"到农村，毫无自己选择余地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也许只有他们，才可以谈得上是"青春无悔"。从他们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于选择了这条道路，也的确"无悔"。1986 年，当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最后一场返城风波的时候，山西曾派出一个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组成的"志在四方"汇报团，到京、津等地巡回讲演。一位中央首长在接见他们时对知青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作出的几句肯定评价，曾使侯隽"高兴异常，奔走相告"《访老知青侯隽》，《新疆青年》，1986 年第 9 期。。董加耕对往事的评价则更理论化一些，他说："当年一些知识青年志愿到群众中去干事业这是可以的，只是后来一阵风，就把事情搞坏了，凡事都怕走极端。"他进而阐述说，当年的上山下乡有 4 个区分，第一是"文革"前部分青年出于自愿到农村干一番事业和"文革"中的"一刀切"、"一刀红"亦即一律下乡应当区分；第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培养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培植的人应予以区分；第三是"文革"中说错话、办错事和主动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人应予以区分；第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积极工作还是消极怠工也应有所区分。台恩普：《往事历历三十年--董加耕访问记》，《青春岁月》，1991 年第 6 期。他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和心情。

主动选择这条道路的青年虽少，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像董加耕和侯隽一样，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怀着为祖国贡献青春的美好理想，他们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中最优秀的一批人。

最具代表性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南京 72 贤人"，指的是 72 名自愿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务农的高中毕业生群体。

1964 年年初，江苏省将董加耕这一先进典型推向了全国，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大张旗鼓的学习董加耕的运动，在高、初中学生中间造成了很大影响。南京市六中、十一中、南师附中等学校的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考虑到当时高中毕业生中下乡务农的人数还不多的事实，决心开风气之先，放弃升学考试，直接报名到农村插队务农。此举得到南京市以及江苏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震动。

第 27 节：二青春无悔(4)

这 72 个青年中很多是当时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些是干部子女，六中的蒋才琴出身革命家庭，自己每年暑假都回到老家泰兴去参加农业劳动，看到很多回乡青年不安心，总想往城里跑，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人，遂产生了下乡务农的想法。她说自己不考大学并不是单纯的决心，而是革命。还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子女，如黄桂玉，父亲是大学教授，她说："我家祖辈几代都是书香门第，如今我要去种田，就从我这一代起，用汗水来谱写劳动人民的家谱。"又如方环，父亲是南京航空学院教师，母亲是中学教导主任，她的哥哥已经于 1961 年下乡，这次她要放弃高考，家里本来不同意，希望她能先考大学，但她态度十分坚决。也有一些工人子弟，如蒋贵勤，本来想接父亲的班当铁路工人，经再三考虑后，认为到农村去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于是决心下乡。此外，他们中还有归国华侨。

这些青年从决心下乡务农之日起，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了临时学习班，抓紧一切机会开展自觉的"练兵"活动，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张光祖每天早晨挑上一担砖块上学，晚上再挑回家，20 多天下来，已能从开始的 70 斤，达到 110 斤。方环每天早晨和中午挑水围着房屋绕圈子，有同学笑话她，她脸不红，气不喘。李双银带上两个同学到农村的外婆家，整天练习栽山芋、车水。还有些人练习赤脚走路、爬山。

8 月 29 日，江苏省召开规模空前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 72 个尚未下乡的中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十分令人瞩目。9 月 12 日，他们与其他知识青年共 733 名一起，动身前往苏北的江宁、盱眙等县插队，南京市为他们召开了盛大的欢送大会，会上他们的代表蒋才琴、王作霈，以及家长代表方环之母、顾小抗之父等人作了发言。

下乡后，这"七十二贤"以学校为单位被分别编入集体户，成为各户中的骨干。

第 28 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1)

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从 1962-1966 年"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规模虽远远无法与"文革"以后相比，但仅就它动员了将近百万人这一数字来看，就已绝不是如今天有些人所以为的"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了。这支百万大军的主体，是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于此点，中央曾有过明确的规定，1963 年年初中央文件称：

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学生是指 1961 年以来毕业没升学就业而又具备下放条件的；闲散人员是指历年精简下来没得到安置的职工和 1960 年毕业未升学就业的学

生，家庭妇女(男女双方下放者例外)等其他人员不包括在内。

安置对象应限于家居大城市的精简职工和学生。大中城市的界限，暂按经国务院批准设市的 17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不够 10 万人口的工矿区为标准，这个范围，不能扩大。《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批转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的报告和落实的安置计划》，1963 年 2 月 8 日。

可见，作为安置对象的知青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应届毕业的学生，另一类，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曾经论述，后来也间有提及的社会青年。而无论是哪一类，他们与"文革"时期大批下乡的知青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只是城市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在有相当数量的人可以升入大学，还有一部分人可以留城就业的前提下，下乡知青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属于被城市"抛弃"的、位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像上一节所述那些能够升学而自愿下乡务农的人，只是极少数。

与 50 年代相比，这时的年轻人，心头已经平添几分压抑，虽然他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却依照出身不同而被划成几等。这一情况在宣传知青典型时已很明显，人们很少注意 50 年代知青典型的家庭出身，没人去理会徐建春、吕根泽的父母是否是贫下中农。但 1964 年以后就不同了，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弟，采取的是不同的宣传方式，甚至有些知青典型就是因出身有代表性而被树立的。所以我们在论述当时知识青年的构成时，也不得不将他们的出身考虑在内，甚至部分地以出身作为划分他们类别的依据。

（一）干部子女

在当时的宣传中，干部子女的概念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括了高级干部，也包括一般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他们中很多人在未能考上高一级学校时，也加入了这支下乡知青的队伍。早在 1963 年就有报道："(在知青中)有元帅的孙女，有将军、老红军、部长、省长、市长、市委书记的子女，有"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孙女。"《下乡上山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中国青年》，1963 年第 23 期。以后则为数更多。

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子弟，主要还是指的高干子女。

"文革"以前，高干，按规定是十三级以上干部，以下则为一般干部，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当时绝大多数生活在北京。

"文革"前上山下乡的高干子女典型，最著名的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之子万伯翱。

万伯翱 1962 年于北京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此时国家已经开始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也已经有一批中学毕业生被安置到近郊区国营农场，这些农场离城都较近，条件相对说也比较好。但他的父亲万里却认为儿子需要离开家，离开父母，到更远些的地方去，一切从头学起。于是，1962 年 9 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下到河南西华国营黄泛区农场的园艺场，参加农业生产。后来著名剧作家曹禺曾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说："1962 年他被父亲送到河南农村锻炼，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吴欢：《京城一少》，《北京晚报》，1994 年 4 月 4 日。说是"第一人"并不准确，但他作为北京最早到外地农场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又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可算得是开风气之先的人。

1963 年 9 月，《中国青年报》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报道了此事，提到万伯翱通过一年的锻炼，尝到了劳动的辛苦。同年 11 月，万伯翱在该报发表给青年朋

友的信《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1964 年 9 月 22 日，他又在《河南日报》发表文章《到生活的激流中去》。1965 年 4 月，该报又刊登了万里给儿子的信《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和万伯翱给父亲的回信《用双手去为人民造福》。在这些文章中，都提到他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炼，思想上得到了升华，从而更加了解和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等。同时，特别提到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尤其是春节时不准他回京，要他留在农场与农民一起过年等事，在社会上和青年中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万伯翱后曾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杂志副总编辑，有多部电影、电视剧问世，著有文集《三十春秋》。

第 29 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2)

干部子弟的下乡目的也是形形色色，一些是出于无奈，因为"干部带头"是动员知青下乡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有不少干部，怀着"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没有错"的信念，真心送子女下乡锻炼，如 1965 年到"北大荒"，曾被树立为知青典型的某某回忆说，他的当司长的父亲确实认为，毛主席都把儿子送到朝鲜前线并在那里牺牲，自己响应中央号召送子下乡义不容辞；但在 1964 年以后，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这时已有些干部子女，怀着一种使命感自觉下乡，就如"文革"期间第一批主动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文革"期间这样自觉下乡的，不仅有高干子弟，还有一些曾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一般中学生，但在"文革"前，这类人还只是为数甚少的先驱。

这里说的使命感，与上述邢燕子、侯隽等人那种响应号召、"为党分忧"的单纯的革命热情是不尽相同的。当时的年轻人个个高喊要做革命接班人，对一般青年来说，这不过是个泛泛的口号，而对高干子弟来说，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内容。1964 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对王海容、毛远新几次发表抨击"旧教育制度"的谈话，这些谈话早在"文革"前，就已在高干子弟中广为流传，他们开始厌恶"旧学校的那一套制度"，其中一些对学校的课程不感兴趣，成绩平平，而埋头于马列主义的理论，热衷于讨论各种现实问题，这明显是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表率的。一名干部子弟评论这批人时说：

有一批人是真正具有干部子弟色彩的。他们也学各种各样的知识，但就是在知识结构根本改变之后，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最终是要到政治舞台上管事的……后来他们果真也成了各方面比较活跃的人物。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中国知青泪》，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这是高干子弟中素质最高的一批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自觉地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准备，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要能够吃苦，要与人民打成一片，虽然他们最终的目标远不是到此为止。

一些家长也是抱着这一目的送子女下乡的。典型的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小农在北京人大附中读书时就入了党，1965 年高中毕业时，学校已决定将他保送到高级党校深造，陈伯达却坚持提出要他到农村去锻炼，陈小农遂于当年 7 月随北京首批去内蒙古自治区集体插队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到临河县狼山公社落户。据当时负责此事的区安置办公室同志回忆，临行时陈伯达曾命国务院办公厅出面，与负责此事的干部约法三章，一是不准让他接待外宾，二是不准对他夹道欢迎，三是与其他知青一视同仁。与他同去的同学们说，他不爱讲话，但劳动肯干，极能吃苦。有文章说他一到公社，就被任命为副书记，是不确切的，他不过是县知青办的联络员。"文革"开始不久他便回城，"文革"结束后有人撰文说，陈回京后到国防科委

工作，其父又安排他去华北某工厂锻炼，准备以后委以重任，可见一直是沿着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思路进行的。只是陈伯达不久即倒台了。

（二）一般的"红五类"子女

"红五类"这个词是"文革"期间才出现的，我们将它提前用在这里，是因为它能最准确地概括我们下面要描述的一类青年。

第 30 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3)

从概念上说，"红五类"子女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我们将一般干部的子女也包括在这类人之内。这些人，本应该在人民中占大多数，可是实际上，由于当时搞的阶级划分总以"宁左勿右"为原则，总要搞得"纯而又纯"，所以真正达到所谓"根正苗红"标准的，至少在城市中，只是少数。按照当时的宣传，他们将来是要接班的，而他们的家长，也应该在知青家长中起带头作用。所以，带头送子女下乡的革命家长典型，就常常出现在这些人中间。这些家长中，有的是自觉这样做的；也有的是迫于压力；更有一些，则是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一过，已经无法得知其本来真相了。

在他们中间，当年最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赵耘。他的父亲，是天津市的一个处长。

赵耘是 1957 年最早到农村落户的那批城市中学生之一。在天津十三中读书时就已经入党。初中毕业后与天津市首批自愿下乡的 100 余名初中毕业生一道，下到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共产主义之路"高级社(即后来的天津市东郊区军粮城公社)落户。当时对他的宣传特别强调说，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他，将他的名字改为"耘"，取"不重金银重耕耘"之意。当年与他一同下乡的中学生中，有好几名都是处长或其他干部的子弟。

他时时以一个干部子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几年后，当上级准备将这批下乡青年安排去当小学教师时，他也曾犹豫过。是留下来还是和别人一起去?去有去的好处，他最不愿意做饭，这一去就可以吃食堂了，再说做小学教师不也是党需要的吗，也还是留在农村，怎么能算逃兵呢?可是他又想，临来时和父亲谈过话，表示既然过来了，就一辈子干农业了，我是自觉自愿来农村的，现在我又想了些什么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安心在农村待了下来。并与一同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李秀敏结了婚。

1962 年春，赵耘转到苗街三队任生产队长，有的社员听说他父亲是天津的一个处长，恨不能借他这个关系多给队里办点事，如搞点化肥、机器之类，都被赵耘一一回绝。据他说："我初当队长时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不懂生产，没想到迎头碰上的是阶级斗争。我反复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不满，说我是政治队长。有人乘我到区里开会的机会，在乱稻草里裹上稻子，打算搞瞒产私分，被我发现了。我马上向大队党总支作了汇报。"有些社员因他反映情况而骂他是"奸细"。1962 年前后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瞒产私分"其实是农民对上面一些极左做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也往往是被人为夸大甚至制造出来的。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凭着在学校学来的一套大道理，在农村横冲直撞，与"落后势力"开展坚决斗争，而当时被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宣传，无疑对青年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激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骨干、充当先锋，结果与农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的事例是很多的。这也是"文革"爆发后很多知青在农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此机会达到个人目的，而置农民疾苦于不顾的人。

赵耘看到和他一起下乡的伙伴，有的初来时不习惯，后来开始适应了乡村生活，拿上了

工分。他们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小天地，盖了新房、置了家具，买了无线电和自行车，开始安于热炕头的小日子。赵耘感到很痛心，尽管有人有意识地和他疏远，他却主动去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重新树立革命理想。

第31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4)

1964年，赵耘已在农村落户7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农业战线上的28面红旗之一，从此赵耘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和《天津日报》等报纸都曾以大量篇幅报道他的事迹。《天津日报》以《赵耘到了农村以后》为题发表对他的长篇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说：

他终于以革命思想战胜了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落后思想。不仅不为某些迷恋于小安乐窝生活的人所感动，而且，一些同来的伙伴在思想上的变化使他感到痛心，他主动帮助他们重温旧志，鼓舞他们继续前进。他不断地从农民身上吸取有益的营养，而对于那些落后的思想和习俗却并不妥协。他这种勇于革命、坚持革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学习的。《天津日报》，1964年1月17日。

《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他的文章《要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时所加的编者按说得更为明确：

这又是一个和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典型……赵耘和周明山，同是从学校走上农业战线，同是后来当了群众爱戴的党支部书记。所不同的是，周明山在农村长大，赵耘是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赵耘经过7年的刻苦锻炼和改造，也由城里来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田秀才"《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周明山是与赵耘几乎同时，在同一背景下被推出的知青典型，是山西省绛县南柳大队的回乡知青，更准确地说是个青年农民，因为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参见《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对周明山的报道。。

在农村参与"四清"运动，参与整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也往往是他们，结果便是"文革"以后在农村的无法立足。他们为自己的热情和盲目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三）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子女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已经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而只是指当时所谓"没有问题"的那些人。社会名流，包括民主人士、著名演员等等。

只是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时，人们仿佛才明白，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其实都是劳动。他们一致的对立面，应该是剥削才对。可是在当时，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却被错误地扩大化、绝对化起来，甚至成为对立的两个概念，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倒与剥削者，与不劳而获成了一体。按当时的宣传调子来说，最厌恶劳动，最轻视劳动人民的，不是剥削阶级，反而是同样也在从事劳动的知识分子。

社会上存在这种看法，其实渊源有自，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与做官，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确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但问题在于历史已进入20世纪，接受民主、科学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士大夫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已被切断，不再存在滋生"官僚士大夫"这一阶层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硬要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混为一谈，这或者是观念上的落后，或者是别有目的，就不在我们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们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一方面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不仅高于一般百姓，甚至也高于一般干部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是被改造对象，毛泽东动辄就让他们"洗澡"、"脱裤子割尾巴"，使他们动辄得咎，战战兢兢。而他们的子女，处境比他们本人更糟些，他们往往被当作资产阶级子女对待，比他们的父辈承受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娇生惯养"，"清高自大"、"只专不红"几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普遍存在着要背叛家庭的意识，其中一些人"与工农结合"，做普通劳动者的愿望，比一般青年更为自觉和迫切，这是"文革"前知识分子子女的一个特点。

第 32 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5)

这些人的子女，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的确占据优势，所以考不上学的人数，相比其他子女要少些，在"文革"前便已上山下乡的是很少数，但社会上既然认为他们能够参加体力劳动最为难得，所以在 60 年代初，对这些知识分子子弟下乡的宣传，曾一度是舆论的热点。

北京最早树立的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知青典型，是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的儿子侯方兴。侯方兴于 1962 年初中毕业，与百余名同学一起分到位于京郊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当时年仅 16 岁。侯教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的儿子能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在宣传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一年后侯教授夫妇在报刊上发表了名为《喜看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一年》的短文，与后来那些充满革命辞藻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是相当平实的，只是以父母的口吻谈到，孩子当初报名，主要还是出于个人兴趣，短短几个月，却从贪玩的孩子变成了自觉的劳动者。《中国青年报》，1963 年 10 月 12 日；另见《送儿子支援农业最前线》，《北京日报》，1963 年 5 月 10 日。

如果说对侯方兴的宣传，更多强调的是教授送子下乡这一主题的话，那么与此同时甚至更早的陈嘉鲲，更多的则是宣传他本人。陈嘉鲲也是教授之子，他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锡祺，据说他本来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学习历史。陈嘉鲲 1961 年于广州市六中高中毕业后却未考上大学。当年 9 月，他随广州市"大跃进"之后最早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到中山县的平沙农场落户，他最初在青年队劳动，后来到畜牧队饲养奶牛，两年间没有怨言，不怕脏累，干得很有成绩。一个著名教授之子当了最为人所不屑的平凡的饲养员，这是个大有文章可做的题目，各报曾以《来自书香门第的新农民--教授的儿子陈嘉鲲落户农村》、《教授之家新"秀才"--记落户平沙农场的高中毕业生陈嘉鲲》等为题对他进行报道，陈嘉鲲一下子就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1963 年 7 月 30 日；《羊城晚报》，1963 年 7 月 22 日。

不过，除了侯隽以外，他们都没能成为全国级的知青明星。1964 年以后，更是连陈嘉鲲这样等级的典型也未曾树立过，这显然是因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在宣传导向上所作的调整。即使是对周恩来亲手树立的侯隽，也曾有人以她父亲有些"问题"为由，对大张旗鼓地宣扬她，提出过不同意见，更何况别人了。

（四）普通市民的子女

我们按照当时青年的出身来讨论知青的结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情况不可能按照出身划分，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普通市民子女。

"文革"前的下乡知青中，占据大多数的，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又没有门路在城市就业的普通市民的子女，其中包括国营企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小工商业主的子女，当然也不乏"红五类"。他们也有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热情，但总的来说，却既少干部子弟的使命感，也少知识分子子女的浪漫，他们下乡的动机大多是很实际的。

最普遍的，是家庭生活困难，急于为家庭减轻负担。这类青年有的未考上学，有的则因家庭情况本来就没打算升学，甚至提前退学了。在"文革"前，他们是各地动员下乡的重点。成都市 1962 年开始进行下乡插队试点时，首先挑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觉悟高的，还有就是家庭有困难的。据重庆市 1964 年所做的统计，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自愿下乡的青年，占自愿下乡青年的 60％，他们把下乡作为一条就业出路。一般来说，他们到农村后，不像知识分子子女那样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也能够吃苦，但当所挣工分不仅不足以支持家里，而且难以养活自己时，他们的不满就非常强烈，往往倒流回城去寻找其他生计。

第 33 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6)

另一种，是家庭关系不好，希望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如 1965 年从北京赴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某队插队的 16 名知青中，就有 3 人家中是继母，其中一个女生，从小寄养在外地，上中学才回到北京，学习跟不上，又说一口方言，继母对她百般歧视，无奈初中毕业后就去插队了。其实，就是在上山下乡的高干子弟中，也有很多与家庭存在这类问题有关系。

此外一些人虽然也在学校读过书，实际什么也未学进去，升学既不可能，在城市也难就业，除了下乡别无出路，他们之称为知青，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五）因种种原因失足或有各种毛病的社会青年以及工读学校学生等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学校出来几年后仍未找到出路的社会青年。从 1963 年以后到"文化革命"开始之前，社会青年一直是城市安置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被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主力。虽然总的来说，他们基本上也是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是知识青年的一部分，但是与在校学生相比，也有明显区别。他们离开学校后又几经"淘汰"，一般来说各方面素质较差，回到街道以后，又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有不少人沾染上不良习气，已不像刚从学校出来的应届毕业生那样单纯。还有一些是因出路茫茫，有不满情绪，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这些"道德败坏"者在社会青年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如据广西南宁市统计，占社会青年总数的 18％左右，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是。再者，由于社会青年的范围并无明确的界定，社会上经常将一些复杂的成分，如劳改释放犯等与社会青年混为一谈，更是大大败坏了他们的声誉。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谈到，1962 年重新开始动员城市知青下乡时，就有很多这样的青年被动员甚至强行送下乡。尽管 1963 年团中央在苏州召开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汇报会时就曾特别提到，这项工作在开始时还是搞得纯一点好，以使这条路越走越宽。1964 年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在一次讲话中也强调，最近两年动员时要特别注意一下质量，品德太坏的可暂不下去，这些人农民极不欢迎，也把城市知识青年的名誉搞坏了。但是，我们上面也分析过，不让这些人下乡，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本是城市所最不能容忍的一类人，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又送到哪里去呢?虽然上面一再强调不要有"甩包袱"的思想，然而事实上想尽快将他们打发下乡的，决不仅限于下面负责具体工作的干部。

1964 年北京组织第一批知青去宁夏参加农垦，当时有干部为了把这类青年尽快"呼噜"下去，所以要下面进行政审时尽量简单。为了顺利地将这些人送下乡，许多地方不惜欺骗接收单位。1965 年北京送一批知青到内蒙古临河县插队落户时，为了将一批工读学校学生掺杂进去，便不准临河县来接收知青的同志翻阅档案，告诉人家这些学生是半工半读的，当地同志看到这些青年身体健壮，去了能干活，非常满意，并不知其中有些是京城著名的流氓集团成员。结果，当年 11 月当地就向北京退还 50 余人，回来后这些人都被送交了公安局，在

当地造成很坏的影响。

天津市也存在同样问题。1964 年该市组织大批社会知青到河北省宝坻等县集体插队，曾被作为一项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但即使如此，这支两千余人的队伍中，混杂进流氓、惯窃、反革命分子和劳改释放犯共 70 余人，占这批知青总数 2300 名的 3%。这些人在农村表现仍不好，弄得很多社员不敢敞着门下地，下乡女青年晚上不敢出门，有两个下乡两天就被天津公安部门抓回去了，还有两个下乡不几天就用铁锹打架，群众和青年都很不满意。

总之，许多大城市采取这种做法，将本应自己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推给了接收知青的地方，加剧了城乡矛盾，尤其是其中很多并无多高文化，称为"知青"实在勉强。他们下乡后，虽也有勤劳肯干的，但少数人的偷鸡摸狗、寻衅闹事，损坏了知青的名声，这种良莠不分的结果，使满怀革命热情的纯洁的青年学生感到寒心，更使农民误认为凡下乡者都是有问题的，是坏分子，在一些地区恶化了其他下乡知青的处境，也加大了以后动员知青下乡的难度。

（六）出身不好的青年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

上述的第四、五、六种人，构成了"文革"前城市下乡知青的主体，也是与"文革"期间下乡知青在构成上的主要区别。

第 34 节：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1)

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第三章曾经提到，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青年的现象，早在 50 年代就已存在，无论升学还是就业，工农和干部子女都有优先的权利，但当时人们还将此视为政权初建时期的一个暂时现象，国家也曾试图纠正这一问题。但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却使形势急转直下了。

大学招生开始注重政治成分，理由如下：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高等学校学生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右派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映了以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存在着贯彻阶级路线不够、注意新生政治条件不够的严重缺点，要求今后大力改进。同时从对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要求来看，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平均要花五六千元，也应该慎重选择培养对象。宋诚：《高三同学怎样对待升学和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8 年第 8 期。

不过，这时所谓的成分，还主要是指本人的成分而言，加上自 1958 年以后大学招生规模连续三年迅速扩大，更是把这一问题掩盖了。

大学之门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逐渐关闭，是从三年灾害以后开始的。1961 年，当大中学校进行大规模精简的时候，教育部曾正式发出通知："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认真改变过去降格以求，不顾质量，勉强凑数的现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9 页。。"虽然只限于师范院校，却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当年 8 月，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指出各地、各高等学校在招生工作中仍存在对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区别对待，对学生本人的进步表现注意不够，一些学校所规定的机密专业数量太大、范围太广，过分限制了资产阶级子女入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97 页。。可见这一时期高校招生中，已存在着对出身的强调，存在着对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歧视了。不过，从政策来说，这时大学所明确

拒收的，还主要是"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子女，矛头尚未扩大到、至少是中央还不愿让矛头扩大到一般所谓的"资产阶级子女"的范围。

1962 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命题，提出为了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在阶级成分好、思想觉悟高的青年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原则，与之相对而言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便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当成必须严加防范的主要危险。这种看法，在 1964 年以后，还被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第 35 节：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2)

1964 年 5 月，团中央某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修正主义在青年中间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怀着阶级报复思想的"五类分子"子女，一个是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不经过艰苦劳动，有了点书本知识，就认为有了"私人资本"，自以为高人一等，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另一位领导干部也宣称，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同我们争夺青年，这一斗争尖锐激烈地在各个方面进行着，最直接的就是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他们的子女。我国现有资产阶级分子 100 多万人，以平均一个资本家生 4 个子女计，全国就有 400 多万个资产阶级子女，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有一个子女接班，就会出现 100 万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会扩大阵地。这位领导还说，我们过去几年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认识不足，把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只简单地看成是对现在老一代的改造，没充分看到资产阶级思想还要传宗接代，还要争夺下一代以至下几代。他还对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作了一个估计，说他们是"两头小，中间大"，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仅占 20％。这些讲话，当时是没有公开的胡克实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64 年 5 月 30 日。。

自 60 年代开始，青年升学和就业时，就必须通过政审。这些解放时尚未成年的学生，自然谈不上什么历史问题。所谓政审，审的其实就是出身。每个青年的档案上，都根据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就根据这条来招人，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写上"不宜录取"，那么无论成绩多么优秀，也只有落榜一途。不幸的是，"文革"前的高考并不公布考分，上述规定也只在内部掌握，落榜青年并不知道自己没考上大学的真正原因，有的还在继续用功，期望下一年能够榜上有名，直至几次失败之后，才不得已而走上下乡之路。

即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出身不同，也有不同的动员口号，如天津市团委书记的动员讲话：

希望劳动人民出身的家长带头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使自己的后一代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剥削阶级出身的家长认清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应该下决心从自己的后一代改变门风，使子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知识青年们，走革命化道路！》，《天津日报》，1964 年 5 月 10 日。。

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背叛剥削阶级，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是值得赞扬的革命行动。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应该为在自己家庭里出现了第一代新型劳动者而感到高兴。

加上一些具体执行政策的干部因惟恐沾上袒护"出身不好"青年的嫌疑，不惜将所谓"剥

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范围一再扩大，最初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后来加上资本家子女、历史不清白分子的子女，再后来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还有民主党派、富裕中农甚至一般职员的后代。最初只是指直系子女，后来扩大到孙子孙女、侄儿侄女以及其他亲属。在有些地区甚至"左"到凡亲属中有一人成分不好，那么即使这个青年的父母是"红五类"，他也会被视为不可靠。尤其不公正的是，直至"文革"结束之后，在很多地区，出身和成分都是混淆不分的，许多干部认定出身就是成分，成分就是出身，或者将出身看作成分，将成分看作出身，不明白每次填表时何以会设有"出身"与"成分"两栏。奇怪的是，对于这个在当时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从来没人予以认真的说明和纠正。很多高级领导人在对青年讲话时也总是强调："我们是：一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表现。"显然也把出身和成分混为一谈。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终使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实质上变成了和他们老子一样的阶级敌人。他们成为准专政对象，成为先天的罪人，以至到"文革"时，"狗崽子"这种侮辱性的称呼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之上。

第 36 节：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3)

歧视剥削阶级子女的现象在各地的迅速冒头，使中央认为有必要在政策上作出解释和调整，1965 年 7 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看望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时，曾有过如下一段重要谈话：

……

周总理接着一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 年第 16 期。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本着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为了宣传这一政策，团中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树立了一批勇于改造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姗玲。

第 37 节：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4)

鱼姗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在香港。1962 年她从上海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父母几次三番要她回香港读几年外语，但她认为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愿意到香港去。她曾回忆说，在去新疆前的那一年除夕，姐姐为她准备了丰富的饭菜，但她一点也吃不下："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十分空虚，为自己的生活过得毫无意义而痛哭起来……"1963 年 6 月，她决定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家里知道后曾竭力劝阻，她母亲特地赶到上海，对她说："考不取大学也不要紧，只要你不到外地去吃苦，家里就是养你一辈子也可以……"她想，妈妈是爱我的，但母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她不愿走"离开党、离开革命，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的死胡同，终于冲破家庭重重阻力，来到塔里木的农一师胜利十七场参加劳动。她克服了生活过不惯、劳动吃不消等困难，到新疆几个月之后，她曾作出总结说：

我深深地感到，听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变化……劳动使我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鱼姗玲：《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中国青年》，1964 年第 11 期。

几乎所有升学落榜的青年，都有过她曾有的苦闷。"文革"前上海这批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说，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心底仍残存着昔日那种优越感，他们一向是将到外地劳动视为畏途的，更何况是遥远的新疆。不仅是他们，就是一般的上海市民，也都是一谈"新疆"就色变的。作为第一批踏上这条艰苦道路的青年，鱼姗玲的确不易，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到疆仅短短几个月，还未及品尝到人生的另一面，她心里充满自豪和喜悦，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年，周总理在新疆发表讲话以后，鱼姗玲这一典型，其意义已不比从前，而迅速升级了。她不久入了党，在当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改造得最有成效的标志。8 月 23 日，《中国青年报》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决跟党干革命--鱼姗玲改造思想进步快光荣加入共产党》为题，对她进行了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她被团中央树立为全国的知识青年典型。

鱼姗玲后来的道路并不平坦。"文革"爆发，她又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她所在的农场，一度只剩她一个女知青，但她咬牙坚持下来，"文革"结束后中央于 1979 年召开最后一次知青座谈会时，她还是 33 名代表之一鱼姗玲所在的连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最偏远的农垦十四团场九连，到 1979 年为止，她在那里已经生活了 16 年。她"文革"时被打成"黑典型"，遭到批判，排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当时垦区内武斗严重，生产停顿，生活困难，知青们纷纷返回上海，伙房也关闭了，她顿顿吃包谷馍馍就凉水，却不肯回上海。棉花该收了，她动员职工去收。1979 年有记者去时，她已重新担任九连的副指导员，虽有孩子拖累，身体非常瘦弱，却主动要求兼任学校的英语教师，但她所在的单位却仍不同意将她登报，说她"文革"时犯过错误，影响不好。那年 2 月，她所在团场的知青曾集会要求返城，有人劝她当上访团团长，被她"严辞拒绝"了。参见：《她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新疆青年》，1979 年第 4 期；《鱼姗玲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人民日报》，1979 年 5 月 23 日。。

第 38 节：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5)

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入党、当模范的事例，确实打动过相当多单纯的、向往革命的青年的心，但这毕竟只是他们中极少数的几个人。

且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命题本身的荒谬性，仅就这个前提下引申出的这一言论来看，就是漏洞百出的。首先，尽管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极力否认，但它确实是建立在十分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之上的。当时和后来的事实早已证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同样表现在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身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选择人生道路时，决定的力量都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绝不可能是早已陈旧不堪的"父死子继"。其次，尽一切可能将各个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中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是一个政权具有自信心、具有生气的标志，何况是对甘愿追随自己的朝气勃勃的广大青年，更没有要排斥、冷落的道理。再者，人为地将社会分成等级，在历史已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期，其反动、落后和不合潮流，已不必详说了。而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即觉得老子抛头颅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该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的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

结果是，在这种政策之下，别的青年尚可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几乎是除了下乡别无选择的。绝大多数青年在下乡前都有过鱼姗玲所曾有过的那种空虚、悲观的精神状况，如一位家长所说：

儿子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沾染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高中没毕业就休学，早晨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床，放下饭碗就出去，在外边胡吃乱花，逛到深夜才回家，我成天为他的出路发愁朱洛筠：《我儿子走上了光明大道》，《天津日报》，1965 年 7 月 1 日。。

直到将他送往边疆，这位母亲才算松了口气。

在"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这类所谓"剥削阶级子女"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1962 年秋天成都组织的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中，有半数以上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1966 年 2 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据一个女知青回忆："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夏晴：《抹不去的岁月》，《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1963 年上海动员知青去新疆，在近 2 万名赴疆青年中有近 2000 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据上海市团委的报告，其中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很好的。虽然当时上海市委提出对资产阶级子女以教育为主，不勉强动员，但在大学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不下乡就只能去港澳或留在家中当"寄生虫"的情况下，许多爱国的、满

怀理想的青年，还是毅然走上了支边的艰苦道路，其中很多至今留在那里。

他们与一般社会青年不同，有不少在校时品学兼优，不乏像遇罗克那样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曾有负责知青工作的安置办公室干部回忆说，"文革"前每送一批青年下乡时，其中最出众的几个，往往就是这类人。他们很多人是抱着替父母"赎罪"的想法下乡的，但在乡下所受的歧视，往往比在学校时更为严重。

"文革"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第 39 节：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6)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 年双双被划成右派，当时遇罗克 15 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 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报高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报考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学生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遇罗克。后来有人查看了教育部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操行是中，而未予录取。

遇罗克此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决定边准备功课，边参加工作。他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1961 年春节前夕，他下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成为北京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他被社员选为记工员，与社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他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1962 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应考，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到旧伤口上，使他备觉疼痛和惶惑。

1964 年初，他因病离开农村。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固定职业。无论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但没人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正是因多年来为出身问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不公遭遇，使他在"文革"时大胆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至今读来，仍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止。而文章中声声血泪的控诉，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 年纪实》第 3 卷，华夏出版社 1986 年版。

文章提到，每年大学招生完毕，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他尤其提到街道居委会的问题，说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

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历年积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出身压死人"，一点不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 年 1 月 18 日。

第 40 节：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7)

与鱼姗玲相比，遇罗克的经历可能更为典型。

到 1966 年为止，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一百余万人，这是一个以社会青年占多数，以普通市民子女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上所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在升学、城市就业中几被"淘汰"。虽然也有出类拔萃者，但从整体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来看，与"文革"期间的"老三届"知青，自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上所受注意的程度，与后者更是无法相比。

但是，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毕竟是形成了，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国家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尽快融入、消失于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谁也没有想到，要做到这点，竟如此地难。

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就可能是别的什么。1964 年以前上山下乡还未被作为长期性的任务时，很多地方的知青在下乡一两年后便回城或在当地分配了工作；1964 年以后，也仍然无法断然地堵住这个口子。在"文革"前，知青回城的途径，很大一部分属于自发"倒流"，一些人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回到城市当临时工，或者做小买卖，甚至"投机倒把"。也有些人因疾病等原因，通过正当手续回城，但仍找不到正式工作，重新成为社会青年。

在当地分配当工人、当教师的，为数也不少，也有少数青年入党，被提拔做了当地干部。1965 年以后，表现特别突出的部分青年典型，也有被保送上大学的。结果是，不断地动员新的知青上山下乡，又不断有老的知青从乡下回城，川流不息的流动，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付诸流水。这是个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

第 41 节：一谁改造谁？(1)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周恩来曾经设想，要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进行 15 年。他大概料想不到在他讲话后仅仅几年，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安置工作脱离了原来设想的轨道。但也许是巧合吧，从他讲这番话的 1963 年算起，15 年后就是 1978 年--我们知道，这正是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走向高潮，中央即将下决心把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如此说来，这场运动果然进行了 15 年。

"文革"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的结束，并不是如周恩来当年预期的那样，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控制了人口的发展。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切变化，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按照原来的方案实施，它就真的能进行下去而且得到成功吗?

事情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尽管这一愿望有时是非常良好的。到"文革"爆发前夕的 1966 年春，不仅安置城市知青工作的各种问题已日渐显露，农村回乡知青中出现的问题也令人颇感不安。上山下乡的动员，已经初现难以进行下去之虞。

一谁改造谁?

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大背景，也就是说，指导这一工作的理论是否正确、可行；二类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一般来说，知识青年可以分为两类，即家在城镇的下乡知青和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在下乡知青中，又因去向不同，可分为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和到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农场以及兵团的两类。他们由于地位不同，境遇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当然，就其问题的根本性质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前面已经多次分析过，解放后一次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质性的原因都是经济问题，具体说就是人口与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应归结于决策上的失误，这里所说的失误指两种，一种是指导性的：如计划经济使城市就业门路越来越窄、对农村人口的长期禁锢等；另一种是政策性的，如解放初期的片面学习苏联，盲目发展重工业，更如 1958 年的"大跃进"。但还有一些，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如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等问题。这里且不说"大跃进"以后，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下，已找不到比精简城市人口更迅速有效的缓解危机的办法，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格局无从更动的前提下，想通过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他们寻找一条广阔的就业出路，这一方案至少从动机来说，也还是积极的；而通过组织在城市找不到任何出路的部分青年上山下乡，来探索这一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更是无可指摘之举。至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每一次动员知青下乡，都要从意识形态上开路，不过是解放以来一切行动都要如此的习惯性做法。

问题在于 1964 年以后，安置工作被涂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第七章谈到过，从这时起，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被作为一场改造一代人的政治运动，作为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必经之路。基本理论是：知识青年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在现阶段主要是与农民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是与贫农下中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消灭"三大差别"，而这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然途径。

这个理论看起来冠冕堂皇，但知识青年只要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立刻会产生与这一理论相悖的各种疑问，这常常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危机，结果必然是信仰根基的动摇。

（一）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

上述一整套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知识青年若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农民相结合。1967 年 12 月，毛泽东更将这一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叫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回乡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农村后，最感困惑、最难以接受的，往往就是这一点。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向农民学习什么?"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说：

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多么深刻了。要

提高农民的觉悟真是不简单的事哪!

这封信写于 1958 年初。显然，1964 年以后，报刊上是不会再公开发表这样直率的文字了。但即使后来树立的知青典型，也仍然存在这一问题。黑龙江省的知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随便拿队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小块荒地里打转转等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自私、落后、保守"，和我在小说里、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

第 42 节：一谁改造谁？(2)

不必再多举例子，因为每个下乡知青，都有过同样的体验。

既然证明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革命、更进步，是让知识青年向农民学习、与农民结合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就非解决不可。对于上述的前一封信，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回复的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农民的确是有缺点的,但是,你把农民的缺点过于夸大了,你在上面所列举的有些缺点，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不是存在的更严重吗?何况，农民虽然有缺点，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生产者，是自食其力的人，是为人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劳动者和生产者正是农民最大的特点，他们的优点是：诚恳、朴实、敦厚、勤劳。你应该首先学习农民身上这些最主要的品质。谭启龙：《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 年第 1 期。

这是 1958 年的说法。再看 1966 年初的：

一些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从道理上也知道农民群众很伟大，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到了农村以后，却又觉得农民自私、落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农民。农民，主要是占农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他们在旧社会受苦最深，因此，在农村中，他们最革命，他们最听党的教导，他们热爱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为什么有些农村知识青年看不到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呢?胡建良同志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是个思想感情问题。在你还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以前，总是容易看到一些表面的、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你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和广大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才会真正了解他们，对他们可贵的优秀品质，就能看得清了……胡建良：《我向老贫农学习了什么?》一文编后记：《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关键》，《中国青年》，1966 年第 6 期。

上述两段话中回答的三个问题，正是解放以后始终存在于理论上的几个误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所以他们最有阶级觉悟，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事实上，这是把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后所产生的"感恩"思想片面地拔高了。

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能代替马列主义觉悟，何况这种所谓阶级感情，常常也只是宣传中一厢情愿的说法。只是在当时，谁要敢对这种论调产生怀疑，马上就会被扣上"思想感情有

问题"甚至"立场有问题"的帽子。这是其一。

其二，农民是劳动者。这话固然不错，劳动者、劳动，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它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农民的对立面而言的，农民是劳动者，所以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农民学习，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劳动者吗?难道只有农民所从事的那种直接劳动、简单劳动才是劳动，才值得赞美，而同样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所需要的间接劳动、复杂劳动、文化性劳动就不是劳动，就应该遭受排斥和无情的践踏吗?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典型表现。

其三，将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农民意识，与农民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混为一谈。潜台词是：农民自私，知识分子就不自私吗?可是农民身上所有的优点，知识分子又哪里具备呢?

第 43 节：一谁改造谁？(3)

将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宣传工作上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农民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也反过来加深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敌意，人为地扩大了双方间的隔阂，这与"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已经是背道而驰的了。这便产生了理论上的一大漏洞。

上山下乡知青，便处于这种隔阂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反而成为必须甩掉的包袱，必须改造的罪过。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

（二）怎样与农民结合?

"结合"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么样才算是结合了?用当时常用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和农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了，可是农民的政治立场与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而且，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和农民一样，就算是结合了吗?那就是每天出工、收工，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哪个知青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女知青更是担心会像农村妇女一样，围着锅台转上一生。

一个 1965 年下乡，在农村度过十余年的知青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认为知识青年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要想在农村有所作为，就要与农民融为一体，可是知识青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与农民融为一体，"这的确是很多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知识青年都曾经历过的苦恼。这里有知青自身的原因，但农民对知青的戒备、排斥心理，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农民和农村干部，对于读过书的人，哪怕他原来就是自己本乡本土的子弟，也怀着相当深的疑忌心理，这种隔阂有利害关系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其深刻的程度远非单纯热情的知识青年所能想像。如果说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对秀才们多少还存在某种敬畏，还不敢过分加以侵害的话，对于知青，就连这一层顾虑也不存在了。

从切身利益上考虑，农民和社队干部当然不欢迎知青回乡，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收入，又要多添上几张嘴，他们认为这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是国家揩生产队的油"。不少队干部担心知青有文化，比自己强，会抢了自己的乌纱帽。即使没有存此念头，也担心知青不好管，"回乡干部架子大，回乡学生不听话，回乡军人管不下"。上面的例子也说到了，知青对农民尤其对干部的很多做法看不惯，爱提意见，当时又正值"四清"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很怕自己瞒产私分或假公济私的举动被揭发。

知识青年看不惯农民，农民同样也看不惯知识青年，不仅看不惯青年的乱提意见，也看不惯青年的"说话咬文嚼字"、"拿腔作调"、"臭要面子"、"穷讲卫生"等等。他们出于本能，感觉到知识青年与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对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从来怀着一种偏见，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这种偏见也起了某种助长作用。一面动员知青回乡，急切地希望他们在农村安心扎根，一面又在宣传中有意无意地为二者间的矛盾加温，这种南辕北辙的事，在那个年代太多了。

再者，即使有少数知青自觉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农村中强大的家族、宗族势力，也未必就能见容于他们。这种宗族势力在解放后虽然屡遭打击，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非同族的异姓农民尚且要受排挤，又何况知青。

第 44 节：一谁改造谁？(4)

许多知青的热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冷却了，但他们也因此而真正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一过程中成熟起来。

（三）在学校学得的文化知识有什么用?

这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在农村能否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与前一个问题一样，它也贯穿于知青运动的始终。国家对这一问题并非不重视，1964 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特别强调说，怎样使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有关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后备骨干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知识青年十分关心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用上体力，又用上文化科学知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确实看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又真正大有可为时，才能牢固地把根扎在农村。

这的确是知青能否在农村巩固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才会被人们一喊再喊。但是，喊口号是一回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除了一般所谓的要领导重视以外，还必须具备几个前提：首先，必须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文化，使知识青年能够用先进的文明去影响和改造农民；其次，在农村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农村感到有学习文化、引进人才的需要；第三，即便如此，也仍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培养人才、保证他们发挥作用的制度。可惜的是，这三点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都是不具备的。

上面我们讲到，解放后一系列运动的矛头，总是瞄准知识分子，总是将他们作为工农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改造对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对文化、对文明的排斥与敌视。处于这种大气候下的知识青年，一下乡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无法调整自己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接受农民的改造，是把自己本来具有的优势，把自己在学校学得的文化作为被改造甚至被抛掉的对象，他们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特长，又拿什么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第二，从解放直到"文革"结束，我国农村一直在个体小农经济的落后状况下徘徊，一锹一锄的生产方式确实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找不到用武之地。我们在第二章分析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教训时提到，当时已经有人认为，在目前还只能用锄头挖土的情况下，组织过多的知识青年参加垦荒是不适宜的。我们还提到，这条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结果是，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于下乡知青中。1964 年董加耕的事迹见报，曾经在青年中引发一场讨论，焦点便

是，像这样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下乡，是不是太可惜了。有下乡知青说：

即使在这广阔的农村天地之间，也觉得有些狭窄了，真是荒废了年华，虚度了光阴。我对农业的贡献不大。请想，我一样和社员锄地、推车，就无所谓谁的贡献大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受了我们生产队条件的限制。我们用的农具，就是锄、镰、锨、镢四大件，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那就谈不上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干下去，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

锄地还用得着直角、钝角吗?拉粪还用得着碱酸盐吗?就是把农业的一套技术学会，原来学的书本知识又生疏了，也是得不偿失。海涛：《我也感到"有力无处使"》，《新华日报》，1964 年 12 月 24 日。

第 45 节：一谁改造谁？(5)

这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央文件虽然要求各地党团组织不要把知青当成一般的劳动力使用，而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特长，但在农村生产力如此低下的背景之下，又从何发挥呢?

第三，虽然称为知识青年，实际上文化程度最高也只不过高中毕业，有的只是高小毕业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无论是农作物的栽培和品种改良，还是农业机械的制造和改进，都难以胜任。即使如防病治病、担任中小学教师，也不是凡读过中学，有了一些基础知识，就能够像当时宣传媒介所宣扬的那样干出名堂来的。要想真的在农村有所作为，他们的知识太不够了，他们需要再受培训，再学习提高，但当时的农村，大多数却没有为他们创造这一条件。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十分尴尬之处，倒是那些大学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中专毕业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由此说来，让知识青年下乡去当农民，从发挥作用一面来说，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知青典型的经历为例来进行探讨，他的名字叫柳昌银。

柳昌银是 1957 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万宝人民公社新兴大队参加农业生产的。他从小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家里条件艰苦，所以很小就下地帮母亲干活，逐渐对水稻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上高二时，一场霜把社员辛辛苦苦种的稻子全毁掉了，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本来他是个好学生，学校已经有了将他保送上大学的意向，但他等不及，他恨不能立刻回到家乡，去培育能够在无霜期就成熟的稻子。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劳动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就这样，主要不是因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而是怀着改造水稻品种的理想，他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据当时的报道说，他第二年就培育成功了耐寒、早熟、高产的"万宝十一号"水稻良种。为了使培育出的良种更有适应性，他主动离开条件较好的家乡，到位于山区的昌图去进行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万宝地区将他的良种推广开来，使水稻的平均亩产上升到 400 多斤。

柳昌银因此而成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他于 1962 年入党，1964 年出席了共青团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曾一度以"长白山下"种子迷""的形象名扬全国。

"种子迷"这一称呼对他来说实在是恰如其分的，据曾经先后为他写过 9 篇报道的女作家在 30 年之后回忆说，"文革"期间他曾屡遭磨难，他精心培育的良种都被烧毁，他几乎发疯，

但这一切过去之后，他一如既往地仍然倾心于他的良种试验，但他没有著作，没有职称，没有人肯承认他。他属于"鬼迷心窍"的那类人，是神人。她说，写柳昌银，贯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她也与柳昌银成了共过患难的朋友。但她也承认，柳昌银的这一段人生道路，是一个悲剧。此段叙述根据 1992 年 9 月笔者与女作家何鸣雁的谈话记录。

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执著，他的才干，他的研究成果，却只适用于家乡的局部地区，甚至在局部地区也未能得到公认。他终于没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农业专家，也就没能为家乡的水稻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是他一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人的，他们太相信"卑贱者最聪明"、"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等教导了，不知道许多专业知识，其实是多少代人不断努力探索、实践得来的智慧结晶，以为不必经过正规的、理论的、科学的专业学习，就可以凭"土知识"、"土办法"创造出前人所未有的成果，这只能是自欺欺人。自学不是不能成才，但是盲目自学而无专业的正确指导，则成不了才。正是在这一点上，十多年的片面宣传，使一大批青年走上歧途，这也是多年来形成的，至今未曾认真清算过的一个误区。

这里当然毫无指责柳昌银之意。这一代知青中，有那么多人像柳昌银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抛洒到了家乡的土地上。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当时的国家能够更注重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农村能够像如今这样开放和流动，如果社会对文化、对知识分子能够有比较公正的态度，这些知识青年所挥洒的生命和汗水，就不会白白流淌，而会得到比他们实际所得更大、更多的收获。

第 46 节：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1)

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我们上面分析了在指导上山下乡工作的理论上存在的诸多误区。不过，在"文革"之前，当一切尚处于开始阶段的时候，实质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在具体操作上的。

从动员安置知青工作一开始，各个环节上的问题便随之产生。

首先就是城市干部在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时采取强迫、欺骗手段的问题。早在 1964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针对这一问题明确表示："有的地方，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等知识青年思想酝酿成熟，就匆匆忙忙地把他们送下乡去，引起了不良后果，这是值得今后注意的。""过去有的地方，用物质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到处许愿，又不能兑现。结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给以后的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麻烦，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中央还一再强调对于知青下乡，"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

可矛盾在于，国家对于每年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是有明确计划的，而真正自愿下乡的知青，又只是少数，完全靠其觉悟，靠其自愿，根本无法达到国家要求的人数；而我们上面谈过，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又是地方干部所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加上每年任务压下来时，不仅时间紧迫，无暇细细动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有硬性要求，还经常要求地方"只能超过，不能减少"，这使所谓的"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是一句空谈，地方各级组织为完成任务，只能不择手段。

强迫是不太能够行得通的，最简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引诱"，包括物质上和前途上的两种：

过去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动员，而是用皮鞋、皮箱、被褥，用升官发财，用发展入党、入团来诱惑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2月20日。

"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多夸张不实，但以物质利益，或以入党入团来动员知青下乡的做法，的确比比皆是。知青下乡后发现受了欺骗，会感到极其愤怒，所以"文革"一爆发，就有众多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向把他们"骗下乡的"干部发泄怨气，大造其反。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这些干部们除此之外，又能以什么方法，把大批的知识青年动员下乡呢?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下乡以后。当然，如果在农村的处境大致顺遂的话，上面的前一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文革"前，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是各类农场。

1962年以后，最早也是最大量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地方，是国营的农、林、牧、渔场，以及大量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农场，这些农场的知识青年并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农民的包围之中，怎样与农民相处、怎样在农村发挥作用的问题，也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突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上述关于知青工作中管理体制上的、领导素质上的诸多弊病，往往因农场知青的相对集中而突出地暴露出来，就像"文革"期间矛盾的爆发之处总是在生产建设兵团一样。

第47节：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2) txt小説下載|www.txteb.cn

我们这里先按时间顺序，举出几个实例：

（一）云南橄榄坝农场

这是1963年由当地团组织向团中央作的汇报。

1961年和1962年两年，该农场先后吸收了两批85名青年，占全场职工总数的2?6％。这些青年都是没考取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是由云南省农垦厅统一安排，从昆明市动员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5岁，最大的也只有19岁。初来时，都把到农场当作就业之路、安家之所，还是比较安心的，对农场也比较满意。

到农场后，他们大部分被安排在生产队参加体力劳动。日子一久，因无人过问，住房破漏，已有五分之四的人迫切要求回家，半数以上的人正式提出申请，三人私自逃跑；有的向外写信，说农场坏话，要家长出面干涉，叫老同学不要再来。有个大学教授得悉农场的混乱情况和不让他女儿回家之事，已找到省委统战部去告状要人。这些青年虽然暂时被农场用不给转户口的办法硬留了下来，但根本无心劳动，随时借机发泄不满情绪，不服从队长分配，找岔子和队长吵嘴顶牛，经常装病旷工。农场是按劳动日计算工资，有人从家里要钱维持生活，手头有钱就干脆什么都不干，去集市上闲逛，或搞个竹筏子到澜沧江上游泳。3月初，有两人为一件小事动刀殴打，一个手臂被刺穿，送公安局处理。有人听说内地有人经这儿越境，也想试试，有4人以游泳为名企图到缅甸闯一闯，被边防哨截住，才未实现，还有个别男青年在女青年集体宿舍过宿。还发生过一人吞服安眠药自杀事件。

该团组织的汇报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农场来负。农场把这些青年看成是包袱，埋怨上级为什么把他们搞到农场来。团组织不健全，下面支部根本就没人管。农场负责人不考虑他们年纪小，就和成年人一样要求，哪怕累倒了起不了床，领导也不及时解决。知青们住的是竹架的草棚，一刮大风就倒，一下雨就漏水。大部分职工到农场是带家属安家的，可以自己改善伙食，知识青年收工却没人管，还得自己买菜做饭。他们不会安排生

活，一领到工资就很快花掉，然后就常喝"玻璃汤"(即清水汤)。居住分散，没有一定的生活管理制度，甚至病倒好几天领导都不知道。他们很少能看到报纸杂志，除了一个半月看一次电影，没有其他文化生活。知青旷工，农场干部采取扣工资、扣米的方法来惩办，常常引起不满和顶牛。有的工人讽刺他们是来劳改的，干部不仅不去制止，反而附和。有个姓梁的知青与卫生所女青年谈恋爱，经常旷工，卫生所负责人就发动群众斗争女青年，不让她和梁在一起，梁感到恋爱无望，觉得在农场没前途，回家没出路(其母改嫁，对他不管)，结果自杀身死。很多青年说："我们是被骗来的，在这里尽干些杂活，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前途，呆下去也是白白浪费青春。"《橄榄坝农场的知识青年普遍要求回家另谋出路》,《团的情况》,1963 年第 1 期。

（二）河北省唐山市柏各庄农场粗暴对待下乡知识青年

这个农场在 1963 年 5 月以前，曾接收了 1402 名唐山市的知识青年到场参加生产劳动。农场在对待下乡青年的工作上存在不少问题：

1?大会批判，拳打脚踢

农场有些干部对下乡青年歧视、讽刺，说他们是"白面书生"、"小姐"、"为吃大米来的"。解决思想问题，方法简单粗暴，动辄采取大会批判、辩论的方法，有的甚至拳打脚踢。例如，三分场四队郭玉池(团支部委员)与一个工人闹不团结，队干部硬说郭受坏人指使打击积极分子，召开了三次团支委会、三次团员大会批判他的思想，结果郭玉池没要团的关系就离场回家了。他离开农场时对一同来农场的青年袁慧琴说："劳动再苦也能受得了，可是这种辩论受不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三分场四队张国才，因与班长口角，队干部就开大会辩论他，并且把他捆绑起来，用脚踢他。有些青年说："我们见到书记、队长就害怕，有意见也不敢提。"

第 48 节：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3)

2?扣压口粮、私拆家信

1963 年 7 月，工人李五奎家中打来电报说他父亲病重，让他请假回家。这封电报在队干部手中压了 5 天，以后批准给他 4 天假。他到家第四天，父亲因患结核性脑炎住了医院，医生要家属看守，因家中无人，便由他看守两个半月。回农场时从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医院开了三张证明信，交给生产队支部书记，说明超过假期未归的理由。可是队干部不看证明信，硬是决定不发给超假期间的口粮。还有的队干部私拆工人的家信。

3?漠视健康

女青年在经期，有的队干部仍叫坚持下水劳动，可以安排一些轻活的也不给安排。她们反映，在女工中约有 80％以上的人有妇女病，有的得了关节炎。农场对病号照顾也不够。四分场二队王秀芝，有妇女病、关节炎，右腿麻木，总场医院诊断后叫她每天坚持针灸，但生产队不准假。三分场四队女工张淑兰在 1962 年得了肾炎，在总场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时给一个月假，但只休息了半个月，生产队干部就叫上班了，还说她是装病。

4?女知识青年被逼婚

1963 年 6 月，天津市有 12 名女青年到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翌年春节时，其中有 3 名回津，坚决表示不愿再回农场。市团委和市妇联的干部访问了她们。她们说，主要是嫌那里男职工逼婚、骗婚；劳动定额高，工资收入低；干部不民主，作风很生硬；劳动保护差。下面是她们被逼婚、骗婚的经过：女知青李淑莲，19 岁，1963 年 6 月到七分场三队落户后，表现很好，担任小组长。12 月，该队四班长李成忠(党员)对她说："小李，你看人家都结婚

了，你不眼红吗?我给你介绍我的干弟弟李全祥，今年 25 岁，在十分场工作，家中只有一老母，你进门就当家。"李淑莲不同意，两天后又有几个人给她"介绍"对象。李淑莲被纠缠得没法，勉强同意和李全祥结婚。婚后，男方要她把户口迁到十分场，并说："十分场有活你就去做临时工，没活就去家侍候我母亲，工资不能给娘家寄。"李淑莲不同意，说："我是来支援农业的，不是当家庭妇女的。"不久她要求离婚，并要求调到别的分场。女知青王丽珠，年方 16 岁，在七分场二队队长丁树春的包揽下，和班长崔凤友结了婚。婚后两人不和，男方对王丽珠说，"女人就是男人的玩意儿，就得听男人的摆布。"并把她捆起来，锁在屋里。她也坚决要求离婚。女知青郭伟燕，16 岁，也是由于该场男青工用各种方法围攻她，逼她结婚，吓得她不愿再回场。郭伟燕的母亲说："我女儿是去支援农业，不是去那儿找对象的，他们这样污辱妇女，我们的孩子不能去啦。"她们反映，这个队给女青年介绍对象成风，有时一介绍就是四五个，不同意就进行"谈话"，形成变相逼婚。

结果到 1963 年 10 月底，来农场的这批知青中，经批准或自动返回城市的已达 961 人，占总数的 68?5％。留下的青年中，也有许多人不安心在农场劳动。

（三）北京延庆农场发生严重污辱下乡女青年事件

北京市延庆农场女工李×，是 1963 年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她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家庭阻拦，毅然到农场参加劳动，表现很好。1963 年 10 月 15 日，因偶感风寒，头晕发烧。农场会计吴成禄(地主子弟)、炊事员刘宝庭借口说她得了"邪病"，纠合本场工人王从正、孙全然，在 15 日凌晨 2 时闯进女宿舍，把李×从床上拽起，强行给她"辟邪"。吴成禄、孙全然把她的两臂拧在背后，王从正搂着她的腰，刘宝庭挥舞尖刀，大吼大叫，逼她承认是"鬼神附体"，还用 4?3 厘米的钢针在她的头、颈、手指尖等处乱扎，有的指尖被扎了四五针，有的针扎上去十几分钟才拔出。在这样横暴的折磨面前，李×严厉斥责吴成禄："我是共青团员，根本不相信鬼神，决不向你们妥协。你是共青团干部(小组长)，为什么搞迷信活动?"吴成禄竟又指使刘宝庭脱李×的衣服、乳罩、裤子，并乱摸乱抓她的乳房，腋窝和大腿。李×当时曾哀告他们不要这样污辱她，说："我是个姑娘，你们这样污辱我，以后叫我怎么见人?"但他们依然不听，一直胡闹到凌晨 4 点多钟。他们走后，李×立即昏倒，以后十几天下不了床，经医生诊断，已患"反应性神经症"。和李×同住一宿舍的其他五名女知识青年，目睹此事，曾出面制止，但刘宝庭竟威胁说："以后也这样整治你们。"此事在全场职工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个情况，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吴成禄、刘宝庭两犯已被逮捕起来。

第 49 节：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4)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到，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青年应有的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女青年尤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领导，这里有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如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但是问题如此集中，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首先，这源于农场干部对知识青年的整体看法，这种看法也就是当时社会上对知青的看法。在政治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都相对较好的青年或进入大学或应征入伍或留在城市就业之后，下乡和到农场的青年总会给人一种"被淘汰"的印象，这是无论怎样宣传都无法掩盖的事实。于是，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环境下，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干部，会将这些青年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来加以歧视；下乡青年本身所混杂进的工读学校学生甚至在社会上沾染了劣迹的流氓小偷等人，更使农场干部和职工加深对他们的偏见，他们都认为这些青年是城里不要的"渣滓"，北京一些农场就公然称这些青年为"渣儿"。他们对于城市将这些包袱甩给他们非常反感，这股怨气当然就宣泄到知青身上。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下乡知青都被户口和粮食关系严格控制着，对于农场再不满意，真要离开，也有诸多顾虑，用上述例子中干部的话说，就是反正想跑也跑不了。这使当地干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对于知识青年享有的是至高无上的、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他们可以对知青为所欲为。一旦认识到这点，后果就很可怕，动辄扣青年的工资、口粮，随意打骂知青，开批判会，甚至污辱女青年一类事件，便如上述那样层出不穷。本来，在这里，国家的政策、法律是应起到制约作用的，但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知识青年却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农场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农场干部对知青所享有的权力，往往超过人民公社、生产队干部，问题的出现往往便更明显、更集中；这一问题，到"文革"后知识青年大批到农场(当时多已改成兵团)去时，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唯一能对这些干部的做法起到制约作用的，是中央文件，事实上当时的知青和家长，也都将希望寄托在"中央说话"上。"文革"前，中央已经就农场干部迫害知青问题专门发出过两个文件，也可见问题发展的严重性了。

1964 年 5 月 9 日，也就是中央开始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的时候，鉴于农场所暴露的问题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直接阻碍了对于知青下乡的继续动员，中共中央特地批转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即如上述)，批示说：

请大家看看这四份材料。这些材料讲的都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后遭到歧视、打击、污辱等粗暴对待的问题。这些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影响很坏。据了解，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很值得重视。知识青年下乡和回乡是加强农业建设，实行农村文化革命的重大措施，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重要道路。这条道路刚刚开辟，阻力很大，全党应加强领导。对于知识青年下乡的行动应当积极支持。《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的批示》，1964 年 5 月 9 日。

批示还提出了四项解决措施：

第 50 节：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5)

1?对于来自习惯势力的阻挠，应予说服教育。

2?对于那些官僚主义分子的压制、报复、打击行为应当严肃处理。

3?对于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应当依法严加制裁。

4?必须迅速加强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批示并要求有关的领导机关，对于团中央所发的四件案例，认真地加以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的办法和结果报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还决定将以上典型案例和中央批示下发 2 万余份，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是很大的。

本着这一文件的精神，1964 年 10 月，农垦部特地发布了《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规定中承认，据各地反映，有不少农场发生了歧视、刁难、捆绑、打骂、扣工资、扣饭、诱婚、逼婚甚至奸污下场青年的不法行为，严重地破坏着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上山运动，摧残着青年们的身心健康，给党的农垦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不良政治影响。该部表示要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严肃处理，并且特规定了以下几条纪律：

1?要对下场青年一视同仁。对女青年在住房、劳动保护方面加强管理。任何人都不准对下场青年歧视、排斥或刁难，违者应给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

2?对下场青年的缺点应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不应简单从事。对他们犯有严重错误，需要给以适当纪律处分的，必须经农场党委讨论决定。任何人都不得对下场青年擅自停餐、饿饭、扣发工资或拘禁，更不许捆绑、打骂或施加其他变相体罚，违者除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或斗争外，还要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行政纪律或法律处分。

3?必须贯彻婚姻政策，开展晚婚教育。青年下场后，任何人都不准给他们强行介绍对象，更不准诱婚，骗婚或逼婚，如有违犯，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应给予纪律处分，特别严重的应依法论处。

4?必须加强法制观念，尊重下场青年的民主权利。不准扣压，私拆下场青年的来往信件、电报，非法搜查人身衣物，不准阻挠越级反映情况或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违者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给予法律处分。对由于虐待、迫害造成人身残疾、死亡或强奸女青年的违法乱纪分子，不论资历高低，职位大小，都必须严肃处理，不得姑息迁就，情节严重的应依法严惩。如系地、富、反、坏分子，更须加重治罪。《农垦部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1964 年 10 月 21 日。

这是迄今可以见到的"文革"前对于这类问题最具体、最严厉的一份纪律规定，它对于那些为所欲为的农场干部，无疑是有震慑威力的，但它毕竟不是法规，而且下面一旦具体执行，就有松有紧了。

从 1965 年农垦部党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湖南省湘阴杨林寨、江永县回龙圩、铜山岭、桃川等 4 个农场歧视、虐待和侮辱下乡青年的严重问题的检查报告来看，这一规定并未能有效制止该部所属农场中此类犯罪事件的发生。当时中央对此问题所作的批示说：

农垦部这个检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严重违法乱纪、干部压迫、剥削青年，对下乡青年生活漠不关心。这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如果不把这些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整好，那么，这些农场的领导，就永远会同贫下中农、同下乡劳动的青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就不会办好社会主义农场。

第 51 节：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6)

批示还要求各地把所属农场的工作都检查一次，对这类违法乱纪的行为，应在查实后严肃处理《中共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湖南有些农场干部迫害下乡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1965 年 5 月 20 日。。

从这份批示看，即使是中央，对下面干部的这些作为，也没有明确认为是在犯罪，而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既然严重违法乱纪、压迫剥削青年的行为，都只不过是"官僚主义"，至多也不过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话，那么干部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农垦部对于这类问题，还是重视的。它所属的国营农场，毕竟属于"王法"可以管得到的地方，而在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地方农场，问题则更为严重。即使在中央有关文件发布之后，仍然是"尚未引起领导重视"。按照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 1965 年 4 月向中

央作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既不上报，也不检查处理。还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严重污辱和迫害下乡青年的案件，不告不理，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议认为，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可见，在其他有些地方，问题可能比农垦部所属各国营农场更严重。

这类问题在农村生产队也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除了像农场一样对知青政治上歧视之外，主要表现在与社员同工不同酬、劳动强度大和女青年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几个方面。亦即如当时中央文件所指出的，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劳动"底分"过低，加之生产队派工不合理，同工不同酬，生活不能自给；有些年少体弱的青年，因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而影响健康，特别是有些水田地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女青年患妇女病，甚至发生死亡事故。这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农民的物质生活在当时已经十分贫困，但有些地区的知青，甚至达不到一般农民的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不愿知青分沾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城里人"的一种敌视心理。有的地方对知青在劳动上要求过急过高，甚至专派重活给他们干，理由便是"让他们尝尝当农民的味道"。据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如陕西扶风县黄浦公社 89%的回乡青年口粮都比一般社员低，而且质量差。又如不少地方给知青的自留地分得很少甚至不分，有的地方按社员一分五、知青一分的标准分配自留地，甚至如安徽肥东县电站大队从 1963 年冬到 1964 年春回乡的 4 名知青，到 5 月还没分到自留地。还有很多地方的知青，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住到生产队的办公室或仓库甚至马棚里。

插队女知青与农场女知青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央文件谈到：

现在，有不少下乡青年，尤其是女青年，早婚的很多，对他们的进步、劳动影响很大。应该加强晚婚节育的教育。有的地方发生过逼婚、骗婚、污辱妇女的现象，应当及时处理，并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类问题。《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1964 年 4 月 24 日。

如果说国营农场尚有国家的纪律管束的话，对于农民，则连这点约束都难以奏效，事实上直到"文革"以后，对于下乡插队知青的处境，始终无人能拿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总之，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为了能够将这场运动顺利地、长期地进行下去，国家就十分重视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但是始终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种种政治、经济的大原则的制约之外，关键在于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知青无法将保护自己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只能企盼于"上面"的眷顾，即靠得到中央的注意和中央发布文件。而中央即使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再大，做法再严厉，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阵风。大风刮过，依然故我，这已是多年来干部群众都习以为常的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结果便是知青的状况，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文革"期间这类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直至中央不得不采取将几名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以平民愤的方式，却仍然无法杜绝，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 52 节：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7)

"四清"运动的开展，使知青在农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

1963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后的 1964 年 9 月，中央又发布有关这次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规定这次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在农村引起巨大震荡的"四清"运动，下乡知识青年也受到这场运动的深刻影响。许多工作组将农村中组织阶级队伍等一系列做法运用到知青身上，结果，第一是使一部分青年被作为运动的依靠对象，参与了对当地干部的斗争和冲击，恶化了与干部与社员的关系，甚至到了难以在当地立足的地步；第二是使相当多出身不好或有一些不良习惯的知青，被当作阶级敌人和被整顿清理的对象，遭到打击；第三，它也使知青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恶化了。

我们这里引几个当年四川知青的回忆为例：

1964 年 4 月从成都下到四川省会理县鹿厂公社的知青回忆说，当年收完大春后，县里来了知青整顿工作组，把鹿厂公社 209 个知青统统集中在公社进行整顿。七整八整，有个 14 岁的小知青被整得魂飞魄散，哭着交代了曾偷砍生产队的包谷秆吃，还偷盖公章私自开条子到公社割肉吃的"罪行"，然后在身上一无钱、二无粮的情况下，横越大渡河，竖攀万丛山，历时一个月，硬是一步一拖回了成都黄新生：《杨瓜娃儿》，《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工作组还将知青按照出身不同划成三六九等，1964 年从四川合州下乡的知青回忆说：

知青农场办起没到一年，便驻进了四清工作组。于是，农场一百几十号知青顿时分了等级，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立马有了区分，对红、黑两类出身的知青召开了内容及形式都不同的会。

工作组长是位湖北佬，复员军官，说起话来声震屋瓦。他的口头禅是"枪打出头鸟"，每说此话时，二目放光如手电筒般四射，使人心惊胆寒。依了这位工作组长的分等划类，我们农场里便有了一个应予诛灭的黑帮，这个黑帮由 27 名黑五类子女构成，为首者便是其父解放前曾任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的何姓知青，被定为农场最大之黑堡垒，由工作组长组织知青围而攻之。戴克学：《老知青文革读书梦》，《龙门阵》，1993 年第 4 期。

更有甚者，1963 年 10 月，曾有 300 多名成都知识青年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叙永县后山茶场落户，一年以后，省、地、县三级的"四清"工作组进驻茶场，不知出于什么背景和动机，便将这批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的知青"娃娃"当成了妄图变天的阶级敌人：

县委工作组长，一位姓王的局长有一次对二队的同学们训话，竟说："不怕你们这些成都娃娃，你们休想变天！我们有监狱、警察、军队，还有飞机、坦克、大炮。"接着，背靠背的揭发、检举、批判会陆续开始了。

很长很长时间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动用那么多人，无缘无故地来对付这几百名种茶的少年，扼杀他们青春的梦想，把他们之中的数十人，直接投入罪犯和贱民的地位，饱受人格的屈辱，丧失青春、幸福、健康，乃至生命。而谁都知道，确定不移地知道，这些人是无罪的！余下的两百多人，无疑也饱受惊吓，紧接着又带着受伤的心灵，接受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周永严：《下乡周年祭》，《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53 节：三回乡知青的处境(1)

三回乡知青的处境

与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受过学校教育，然后一样上山下乡的农村青年，也就是"回乡知青"，人数始终多于城市知青。虽然他们并未被国家划入安置工作的范围之内，对于动员他们回乡，

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长期工作以后，也几乎不再成为问题。但他们回乡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惑，从性质上说，与城市青年是一样的。这里之所以将他们专门列为一节，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也存在一些特殊问题。

虽然国家自1954年起就大力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但回乡知青数目的迅速增长，是在1960年以后。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青年回乡的走向可以用上下波动的曲线表示的话，60 年代以后则一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了。这当然是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紧密相关的。

1958 年《户口管理条例》的实施，城乡间裂痕的扩大与加深，都大大减少了农村到城市谋求职业的可能性。甚至原先许多农村女青年通过嫁给城里人而改变自己身份的出路，此时也被基本堵死。因为即使与城里人结婚，也极难改变原来的农村户口，而且如果母亲是农村户口，孩子即使是在城里出生，户口也要随母亲一方，并且会随之遇到诸如没有粮食副食供应、无法在城市入学等一系列困难。

于是，农村青年想要成为城里人亦即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便只剩下三个，一是参军，二是当干部，此外就是读书、升学。只要读到中专、大学毕业，自然就可以由国家将工作包下来，当然也就获得了城市户口。而参军，大多数人复员后仍需回乡，提干只是极少数政治条件好的人才能得到的机会，而且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可见，考中专、读大学，是农村青年实现自己当城里人、挣工资并进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选择，也是当时农村青年的家长最大的愿望。为此，许多父母不惜节衣缩食，卖猪卖粮，送子女到学校去，而当这些子女苦读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后，又回到家乡种地时，其父母的失望、愤懑和对这个事实的不能接受，都是不难想像的。

可是，对农村子弟来说，走读书这条路，到60年代以后也越来越艰难了。在第六章谈到过，国家于1960年作出规定，为了保证农村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不断补充农村劳动力，此后必须在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中给农村留下一定的比例，不要全部升学。按这个比例规定，能够升学的农村中小学生只有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学生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从农村考入大专和中专的学生，在学校停办后也被一律要求回乡，而这时数量特别多的还有几乎全部停办的农业中学的学生。这都造成愈来愈多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不得不回乡生产的局面。

据团中央1962年统计，全国农村已有高小以上知识青年近3000万人，大体上在1亿农村青年中，4个人中有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生。1964年，全国知识青年总数达4000余万，其中城镇下乡知青仅几十万，在知青总人数中仅仅是一个零头，其余的，都是回乡知青。再举几个具体数字：据北京市的统计，到1962年底，参加郊区农业生产的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回乡知青达11万余，约占郊区农村青年总人数的1／3；上海市川沙县统计，自1957年到 1964 年期间，陆续落户、回乡的知青达 52000 余人，占全县农村青年总人数的 2／3以上，占全县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以上，有的公社70％以上的农活是由青年干的。在河北省宝坻县，至1963年底，全县回乡知识青年总数达15000人，占农村青年总数的36％。在教育事业特别发达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解放后陆续从中小学和大学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到60年代初已达7万，占全州农业第一线青年劳动力总数的85％。再有，广西召开回乡知青积代会时提到，到1963年为止，几年来全区回乡知青已达上百万。1964年广东省报道，近3年有56万多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如果从1958年算起，回乡知青总数已

达 76 万人。而据同年湖南省的统计，全省回乡知青人数更多达 300 余万。

第 54 节：三回乡知青的处境(2)

与 50 年代相比，回乡知青群体的构成，也已经有了可观的变化，不仅有高小、初中毕业生、肄业生，而且包括了高中生，甚至因病或其他原因退学辍学的大学生；不仅包括正规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也包括从 1958 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批涌出的民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农业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因学校停办而返乡、随父母精简而回乡的学生等等。由于回乡知青与农民一样，不存在户口、城市供应和日后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算不算回乡知青，也就毋须像对城市下乡知青一样，有那么细致的规定和明确的界限。

作为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并多少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青年，回乡知青在农村人口比例中的增长，对于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国家对此也寄予厚望，即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

这不但对于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不但对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决不是一项临时的措施，而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要认真做好的工作；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并不只是要他们起增加劳动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他们起增加革命力量的作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65 年 5 月 5 日。。

广大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直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添了大量的后备技术力量，为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增添了力量。他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做出贡献，不仅要继承老一辈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学会和掌握新的技术，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农民。

这个评价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但与"文革"后主要将知青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再教育"理论相比，对知青在农村所起作用，期望仍是较高的。

这是些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他们与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一是回到自己家乡，一是离开家乡到农村去，而更在于前者是农民子弟，后者则是城市干部、工人及市民子女，二者间存在着身份上的区别。具体地说，就是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待遇问题。这一区别源于解放后一直存在且一度扩大的城乡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是五六十年代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且不谈这个理论是否成立，事实上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因种种措施的实施，而成为几乎无法填平的鸿沟。于是，回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中的大多数便只能重复他们那些未曾进过校门的父兄的命运，他们与 60 年代全国的农民一样，被牢牢地禁锢在家乡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难有离开的可能。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本应该使他们成为农村中一支最先进、最有生气的力量，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回乡本应该极大地促进贫困愚昧的农村面貌的改进，但在 60 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排斥知识、排斥文明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被抵消，他们的青春和理想也被贫穷落后的农村所吞噬了。

第 55 节：三回乡知青的处境(3)

与城市下乡知青相比，回乡知识青年对于农村的环境更易适应，又因有家庭和亲戚的帮

助，往往能够获得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尤其是如果家庭在当地较有势力，则招工、提干、入党，都可以较他人优先，这是一些回乡知青的有利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有利条件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比城市的外来知青更不利的因素。诸如，正因为环境更为熟悉，回乡后所受到的家庭、亲戚、朋友的冷眼、奚落和歧视就更难以承受，所以每当动员中小学生上山下乡时，总有农村的知青提出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最好是到边疆垦荒一类要求。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常使青年陷入其间而难以摆脱，如果家庭在该村没有势力尤其若是地富子女，处境就更糟糕了。

当然，回乡知青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与城市下乡知青共同的。但回乡知青更少得到上级单位的重视和关心，在有些文化不太发达地区，他们单枪匹马，比有同学一起下乡的城市知青更显孤独，这使他们在遇到困难和产生思想苦闷时，更难于化解。尤其是比起城市知青来，他们更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希望。只是他们往往在经历了几年的情绪起伏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与自己父兄一样的普通农民，再不奢言抱负和理想，加之他们居住分散，一般不会像城市下乡知青那样，一遇机会，就发泄出来甚至激起事端，因而也就不太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山东省莱阳一中的一个回乡知青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是颇有代表性的：

自接到没考取大学的通知书后，每天无精打采，又急、又愁、又恨、又苦闷、又吃不下饭。前几天我到县人委去过，我县没有工作分配，我在家里真是坐立不安，真把我急坏了，焦躁坏了。现在人家考上学校的人多幸福啊，愉快啊，进步又多大啊！而我却在家蹲着，干上了农业劳动。由于长期求学，庄稼活十分生，身体非常弱，干起活来十分吃力。通过这几个月，我感到农业社的劳动真不轻，劳动强度真大，天天起早拉晚地到田野劳动，简直把我累得有些瘫痪了，全身痛，腿也麻木了，腰杆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实在抗不了。而这又不是干一天两天，好家伙，而是要干上它几年几十年。别人不知怎样，我可尝够了。熬到高中毕业，多不容易啊！当了 12 年学生，又硬逼着推粪登山，参加农业生产。想到这里，气得我脑子有些胀痛，好像要炸开似的。

在家不仅抗不了那样大的劳动强度，而且也受不了群众舆论的讽刺、打击。我母亲和我哥哥也常气我，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我下庄稼地干活。因为我上了这 6 年中学也不容易啊！全是我哥哥省吃俭用供给我的，现在我哥哥那里困难也不少，家里没烧的，也没钱买，拾吧?又没有时间。

我天天想，倘一直这样干下去，能学点什么哪?能有什么进步呢?将来能成个什么样的人哪?

你来信还批评我，说我悲观失望，发牢骚，不满，我坚决不接受。青年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哪一个不想在黄金的青春时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是充满理想并一时不停地向正确道路前进的人，不愿白白度过一生而愿给祖国增光的人。但是国家不给我适当的工作，这怎能不使我因为不能为祖国工作而感到十分失望，悲伤呢?倘若国家给我工作，给我一件有出息的工作，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将欢天喜地为祖国工作，为祖国献出所学的知识，并以创造性的劳动来推动革命前进。

第 56 节：三回乡知青的处境(4)

现在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在家里没有一点学习时间，原来学的东西也会忘尽了的，这就浪费了 6 年中学教育。这多么可惜，多么伤心，又多么残酷啊！

老师，倘叫我这样下去，脑子会生锈的。

敬爱的老师，我真过不惯这种生活，我请求您，哀求您，望您费心地叫学校给我找一个工作吧!

这封信虽然是 1958 年写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后的苦恼，同样反映在 60 年代的回乡知青身上《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 年第 1 期。。据 1962 年团中央青农部的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回乡知青，仅占回乡知青总数的 30％左右，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活艰苦、劳动过于劳累之外，深感在农村"没前途"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三年灾害之后的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十分短暂的恢复阶段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困扰，农民普遍的生产积极性尚且无从发挥，知青个人的才干、他们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又何来用武之地?尽管各种宣传机构一再宣传农村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并树立一系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知青典型，但这些典型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大多数知青都能具备，何况有些典型本来就是人为树立的结果。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对农村的现实往往比城市下乡知青更了解，许多人在考不上学，知道自己只有回乡生产一途时，就已十分消沉，回乡之后的现实更使他们失望。这种现实虽然是回乡和下乡知青所共同面临的，但在城市知青尚且被动员下乡的情况下，回乡知青明知自己进城的可能愈加渺茫，尤其是女青年，唯恐会"围着锅台转一辈子"，因而更为悲观。

除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外，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与农民难免发生种种矛盾冲突。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些，属于知青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对农民的理解，对周围环境期望过高，因而做出过激行动，甚至不自觉地为极左路线充当了马前卒，导致了自己与农民的对立。如据当时报道，经常有青年因对队上干部和社员私分粮食、做投机买卖不满而提出批评，遭到干部的报复。还有报道说安徽宿县有个知青，父亲是铁匠，由公社工厂下放回到农村自由营业，他回乡后就和父亲一起干，对父亲看人议价、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不满，常和父亲发生口角，很害怕自己将来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今天来看就未必全是农民一方的不是，至少需做一些具体分析。还有一些，是因农民本身存在的种种落后性，以及农村干部的作风不正引起的。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各种因素错综纠结在一起。1964 年团中央青农部曾在辽宁省盖平县九垄地公社古家子大队对回乡知青的情况进行过一次调查，是很有普遍性的：

这个大队到 1962 年为止，共有 96 名知识青年回乡，其中高小以上 84 名，初中、高中 17 名。知青们爱提意见，对不合理的开荒、劳力分配不当和党团工作都提过意见。1962 年 1 月，知青又和队里闹了一场"大字报风波"。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队里有 13 户人家纺草绳，其中 9 名是干部。他们用的草是队里以每斤 1?5 角卖的，纺成绳后，每斤的议价是 3 角，一天可挣 20 来元，而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挣 1 元。不少社员背后有意见。念过 8 年书的于耀江气不过，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草是集体的，不能只肥了几户，建议队里提高草价，说纺草绳过高的利润就是剥削，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大队办公室墙上。队干部很恼怒，说："你乱提什么?若不叫共产党领导早就揍你了。滚出去！你一年才挣 800 分，你没有提意见的资格。"说着就往外推。高中毕业生刘福全看到不公，也写了一张。第四天高中毕业生伊正和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表示支持。于耀江不服，又贴出了两张。一时间满墙都是大字报。党支部连续三天找他们，说大胆提意见是好的，但意见提的不切实际。青年不服气，党支书烦了，说他们是"钻空子"、"攻击"、"臭理论"。党支部说是团支部发动的，叫团支部做了检讨。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于耀江也算接受了教训，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咱这个四棱木头算从圆眼钻出来了。

第 57 节：三回乡知青的处境(5)

这个队的团支部举办业余技校，要求青年都参加，初中以上青年有意见，说都学过，有这工夫不如学点别的。有 5 名知青想考大学或高中，一般都在业余时间看书。于耀江张罗三四年了，加上身体不好，1960 年没挣到 800 分，1961 年挣了 800 分，1962 年就挣到 2700 分了。他已打算能考上就升学，考不上就安心劳动。有的青年要求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党支部同意了，说，学就学吧，不叫学也不安心干。学了一个多月，有的知青看挣分太少，又上全班了。党支部认为，只要家庭同意，就该支持，考不上，过一两年自然就会安下心来《关于古家子大队知识青年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团的情况》，1964 年第 11 期。。

这个大队党支部对于青年虽然谈不上进行教育，但还是非常宽容的。还有更多社队干部连这样的水平也达不到，那些地区的回乡知青，处境还要更糟。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了知青的家庭出身问题及其这一问题对他们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这里还有必要对家在农村的地富子女的处境问题特别提上一句。当时的"黑五类"所指为"地富反坏右"而"地富"居其首，50 年代时他们能否加入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社，就曾成为过一个问题，60 年代尤其是"四清"之后，他们的处境之恶劣已不难想像，如果说在"文革"前的大中城市，对待这些子女，尚有"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政策多少进行一些约束的话，那么在农村中，就连这样一个形式上的约束也没有了。

60 年代以后，大学校门实质上已经对农村地主富农子女关闭。虽然"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任何文件明文禁止地主富农子女上大学，却是当时的既成事实。这些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度有所披露，其中曾引起过震动的，是钱宗仁(1942-1985 年)的经历。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勤奋好学，却因出身富农而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后来只身到新疆谋生，成为实验林场一名职工。"文革"期间被批斗并遣送回原籍，1974 年落实政策回到新疆阿克苏。他天分甚高，刻苦自学过高等数学等诸多课程，并达到了一定水平。他长达 20 年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一位到当地采访的女作家，她于 1984 年写出报告文学《胡杨泪》《胡杨泪》，《文汇月刊》，1984 年第 4 期。，提出"左"的思想埋没人才和摧残人才等在当时算是非常尖锐的问题，钱宗仁的事迹由此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此后仅仅一年(1985)，他就患肝癌去世，时年 41 岁。

钱宗仁一生行迹，我们这里不拟多费篇幅，只想根据钱宗仁的自述和几篇曾公开发表过的证明文件，叙述他当年不得入学的经过，这些出自当事人之手的文件，应该是基本可信的上述材料均见于朱正编：《不要忘记钱宗仁》，海南出版社 1995 年版。。

钱宗仁于 1962 年第一次报考大学，据他在《冤屈集一身，丹心有谁识--一个自学青年的经历自述》中回忆："我的高考成绩特别优秀，据说列全省前 10 名中。清华大学录取小组正准备录取我，王寿松(注：钱所在的湘乡二中党支部副书记)赶到招生办公室，将我的政审结论改为"不宜录取"加盖公章，要回材料，最终被淘汰。"

1963 年他再次参加高考，据证明材料：

第 58 节：三回乡知青的处境(6)

湘乡县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焦仲付(1983 年 3 月 22 日)："(钱宗仁)1963 年考取哈尔滨

工业大学，该员 8 月份接到通知后，9 月即应入学，由于该大队已开展面上四清，蹲点的公社副书记×××即向该大队的干部打招呼，不让签发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因该员家庭出身富农，钱再三请求，未予解决，只好空手赴哈工大……"

浒洲大队(1982 年 3 月 31 日)："钱宗仁住我大队第二生产队，富农成分，本人系地富子女，于 1962 年在湘乡二中高中部毕业，1963 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时我地正在开展农村面上四清运动，由于当时极左路线影响，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四清工作队认为，地富子女不能上大学，加之其父钱福乔那时表现不好，所以就未发迁移证，拒绝了他上大学的机会。"

钱宗仁空手到哈工大，三个月后终被送回。

1964 年第三次考大学，据钱宗仁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材料(据遗稿排印)："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了，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宗仁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些勉励的话，但一经讨论，觉得不对，说他若上成学，不就说明公社以前都做错了吗，现在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害得钱宗仁满怀希望地准备了几个月，没有拿到准考证。"

钱宗仁由于学习成绩特别出色，曾深得教师和一些干部的同情，所以才会有考取大学再被退回等一系列波折，至于一般地富子女，早在学校政审那一关，基本上就已经以"不宜录取"为由而被淘汰出局了。

在学校的青年对于未来多少会抱有憧憬和希望，回到农村便一切终成泡影。"四清"之后回乡的地富子女，是被当地干部和农民与地富同等看待的。有些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抱怨说，回乡后，当地不让他们担任生产队干部，甚至有的队干部只让他们参加地富分子会议。有的党支部不准团员与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结婚，回乡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对象，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山东有个 1956 年即已入团的地富子弟向团报写信反映说，回乡后团组织开会从来不通知他，他因此而十分苦恼。湖南衡阳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也说："我是地主出身，回乡后队里把我和父亲同等对待，不让四类分子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这岂不是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吗?回乡后这不让我参加那不准我进去，等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锁住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无味凄然"，"我想不通，因为再好再忠心的人，转弯抹角都可能找到一个什么亲族是反人民的"。《回乡知识青年的要求》，《团的情况》，1964 年第 11 期。山西和顺县青年牛成贵一度盲目外流，回乡后别人分全年口粮 260 斤，小片荒地补助粮 40 斤，只给他 190 斤。一次他下地干活，社员将一穗玉米放在他筐里，队长硬说是他偷的，在社员大会上斗争他，牛成贵感到走投无路，上吊自杀。

由于对出路感到茫然，也有知青铤而走险。如 1961 年 10 月，湖北鄂城太和柯家地区曾破获一个"中国民主党太和地区反共司令部"，成员 20 名中，就有青年 19 人，其中有 9 名是回乡知青。

1963 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委向中央的汇报中也提到，回乡知青中"已有少数人搞投机倒把，和反革命分子瞎胡混，参加或组织反动组织。在知青中已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的反革命分子"。《中共广西自治区省委关于召开全区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请示报告》，《团的情况》，1963 年第 14 期。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回乡知青的工作，但在强调阶级斗争、扼杀农民一切发家致富积极性和个人创造性的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回乡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现实是无法扭转的。

1964 年以后，为动员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几乎将下乡知青的一切都由国家包办起来，诸如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等，回乡知青则都与此无缘。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知青造成不小的影响。下乡知青虽已离开城市，却仍认为国家应该为他们负责，而回乡的农民子弟，却从此成为彻底的农民，同是下乡，感觉上却低人一等，这也导致回乡知青与下到当地的城市知青的矛盾。尤其是80年代末国家做出凡1962年以后下乡的知青一律计算工龄的规定之后，那些最终因升学、当兵等途径，凭借自己不懈努力而成为城里人的回乡知青们，却因自己当年是农民而不能与下乡知青一样计算下乡的工龄，他们往往比同龄、同届的同事们在工龄上少出几年，并因此在福利补助、提职晋级和分配住房等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吃亏，他们会不满地发问：我们哪一点不如你们?难道就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的确，人们在谈到五六十年代因出身造成的不平等时，往往忽视了工农之间，也就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第 59 节：一余波(1)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1966 年 6 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突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概莫能外。可是，当"文革"前的几乎一切制度，尤其是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一切制度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而被打倒之后，唯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却从整体上被肯定下来。

知识青年们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抗争，他们的呼声立即就被"文革"中兴起的其他狂潮淹没了，很少受人重视，几乎无人倾听，更少有人记起。但是，从这些呼声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它被如此漠视这一现象本身，也颇为发人深省。

一余波

"文革"狂飙于 1966 年 6 月份的突起，并未使国家一切工作的运行立即中断，在全国，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来说，由于 1966 年的安置计划在上半年迄未达标，所以一度反而十分抓紧，尤其是刚刚着手建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一直在各大城市积极地进行着招收知青的工作。

不仅在受"文革"大潮波及较晚较少的地区，原有的知青安置工作还在按照惯性延续，即使在风暴的中心北京，组建华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也还在进行。"文革"的爆发一度使青年的革命狂热发展到极致，也曾将知青安置工作推上一个高潮，虽然这个高潮为时极其短暂，但也足以改变几万人一生的命运了。

天津市动员知青到甘肃农建师屯垦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在"文革"爆发的 6 月，就有 600 多名知青奔赴甘肃，市委提出的口号是让这些青年"以实际行动回击反革命黑帮的罪行"《知识青年听毛主席的话走革命的道路》，《天津日报》，1966 年 6 月 11 日。。两天之后，又有 600 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宁夏十三师。当月，还有 800 多名知青前往新疆。7 月底，又有一批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开赴甘肃的武威和张掖，其中有些是尚未从中学毕业的在校生，小的年仅十四五岁。到此时为止，该市动员到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已达 10500 人《天津日报》，1966 年 8 月 2 日。。直到 12 月，仍有一批天津知青被送往甘肃，其中以社

会青年居多。

第 60 节：一余波(2)

1966 年夏季，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刮起了"破四旧"等极左风潮，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城市中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采取行动，将他们从城市"遣返回乡"。他们的子弟，有的跟随父母下乡，也有的则被红卫兵以"上山下乡"为借口，从城市清理出去。如广州市就曾在这一年的 9 月将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遣往农村，这批人后来还以他们下乡的时间为名，成立了一个叫"66-9"的造反组织。北京则于是年将清河、团河、天堂河等劳改农场的 4400 多人迁往新疆，其中有劳教所的少年犯 800 多人，这与广州下乡青年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将"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是相同的。这是"文革"初始阶段的一种特殊的上山下乡形式，其中与父母一道被"遣返"的知青，从全国范围来看，为数颇巨，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此后的形势发展越来越混乱，被"揪出来"的干部和群众也越来越多，已有一批青年自愿下乡，是希望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风港，还有些出身不好或父母挨整的青年渴望换一个环境，在农村或边疆向人们证实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在当年 11 月动员几千名社会青年前往新组建的华北建设兵团时，就有不少青年抱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到山西以后(华北建设兵团最初设在山西北部)环境相对于北京，的确平静得多。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也持续到 1966 年底，在 9 月到 10 月之间，有为数不少的知青被送往崇明县的新海、东方红、红旗等国营农场。此外，河南省于 1966 年 11 月也动员了一批知青去西藏军区的军垦农场。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已经开始，原来的下乡知青已经开始波动，其中一部分已经动身返城了。

这是"文革"前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余波，它最终平息于 1967 年上海"一月风暴"引发的夺权风，夺权导致各级党政机构职能的瘫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安置办公室也随之名存实亡了。

第 61 节：二返城风潮(1)

二返城风潮

1966 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城市敲锣打鼓欢送又一批知青下乡或支边的同时，已经有些下乡知青陆续返城了。

（一）参加"大串连"

动荡始于"大串连"。1966 年 9 月 5 日，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这使串连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和必要的经济保证，标志着"大串连"这个"文革"中参与者最广泛、为社会造成震荡最强烈的运动的正式开始。

中央发动这场大串连的最初动机，是想借助这一形势，将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但大火一旦在全国熊熊燃起，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播火者的一厢情愿发展，火苗一下子就窜向了那些中央绝对不想让其燃到的角落。

知青问题就是这样的角落。

串连的参加者很快就从大中学校的师生扩展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仍带着学生气的知识青年，也是热情的参与者。

最初，他们与在校学生一样，是出于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热情与好奇而投入进去的。毛泽东既然说，每个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知识青年当然也不能例外。最早动起来的是在大城市郊区插队的北京、天津等地知青，他们信息最灵，而且插队不比在农场，少有纪律的约束。他们想到城市去了解究竟。有些离校仅一两年的知青，想回母校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与那些留在学校的同学一道，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除了单纯的革命热情之外，与当地干部社员的矛盾，尤其是与"四清"工作组的矛盾，往往是导致知青起来造反或返城的直接原因。

许多知青最初曾与当地社员或农场职工一道投入到了当地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结果或是触怒了当地的有权有势者，或是因过激行动触怒了当地群众。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有的还渊源有自，矛盾冲突从"四清"就已开始，其中一类情况是，一些知青的处境与自身政治条件较好，于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革命，眼里不揉沙子，不断向当地干部和社员发难，反对"三自一包"，反对"瞒产私分"，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遭致地方干部和社员的反感，有的在"四清"中就与工作组站在一起整过当地干部，也有的被工作组作为新鲜血液、依靠对象，在当地干部被打倒后上台如 1965 年、1966 年两年到上海市郊金山县某大队插队落户的 50 多名知青中，有的一下乡就担任了政治队长、团总支副书记等职，结果"文革"一爆发，就遭到当地群众的批斗。参见《活跃在广阔天地里的一支突击力量》，《文汇报》，1968 年 9 月 10 日。，"文革"开始，被整干部和社员将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他们被逼无奈，只好回城。

也有的地方情况恰恰相反，如我们在上一章谈过的那样，知青因出身不好，早在"四清"时就已被工作组划到阶级队伍之外，"文革"爆发后更进而受到当地贫下中农组织"贫协"的排挤。如 1965 年从北京到内蒙古临河插队的几个女知青说，队里"有人借口我们出身不好，不让贫下中农与我们接近，甚至把知识青年在社会上担任的职务全部取消"。即使有的知青出身并不属于"黑五类"，但他们毕竟是从"修正主义的旧学校"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既然"文化大革命"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旧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那么从这种"黑校"、"大染缸"里出来的，当然不会是好人，当然要受贫下中农的管教和批判；再加上前面多次谈到过，有些城市将一些有小偷小摸等毛病的社会青年甚至劳教分子混入知青中一起送下乡，这一切已经导致了知青在农村地位的下降，一逢"文革"这种特殊环境，潜在的矛盾便一下子形成冲突，农民对知青的歧视、反感便无所控制地发泄出来了。有些地方一贯将知青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对待，"文革"爆发后更是有恃无恐，如湖南零陵地区有个公社在 1967 年初张贴一份布告，宣称春节期间，凡地富反坏右与上山下乡知青未经允许一律不得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交由贫下中农批斗；广东增城县一个生产大队每召开群众大会，都要宣布知青和"五类分子"一律不得参加；1965 年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参加建设的上海知青，到场不久就赶上场里"大抓阶级斗争"，一大批知青竟被农场公然开除回沪。这类纯因政治原因产生的矛盾，与当时整天高喊的与工农结合口号，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尖锐的讽刺。知青在农村既然无法再待下去，又适逢"大串连"这样难得的时机，便纷纷回城去"闹革命"了。

也有的知青并未立即返城，而是在当地扯旗造反，四川合江的插队知青曾这样叙述他们当年的那段经历：

离我们不远的北碚境内，几所大学里都闹起来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红卫兵在北碚街上撒传单，贴大字报，搞大辩论，搞得不亦乐乎。我们农场

有知青去北碚，捡回一些传单传阅后，摩拳擦掌，意欲起来造反了。工作组见此，意欲拉拢部分知青，便急忙刷出大标语：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一面表态支持原来为工作组最卖力的几个知青成立红卫兵，意欲操纵农场的红卫兵组织。但事态不但没照这位湖北佬的意思发展下去，而且连农场里原先那几个工作组的贴心豆瓣--打斗知青和农场当权派(场长和指导员)的打手对工作组也倒戈相向了。工作组见情况不妙，便连夜烧毁材料，摸黑逃下山去……

第 62 节：二返城风潮(2)

此时农场知青已迅速成立了一支有好几十人的红卫兵队伍……几天后，在草街地区，以我们知青农场造反团为首，串联当地各工矿单位的造反组织数千人开了大会，成立了草街地区联合造反司令部，我们农场知青刘某任总指挥……之后，知青造反团就离开草街，浩浩荡荡开进县城，参加县里更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去了。时在 1966 年秋。戴克学：《老知青文革读书梦》，《龙门阵》，1993 年第 4 期。

可见造反最初的动机，是与工作组的矛盾，像这类情况在当时是很多的。

还有大批的知青动机更为简单，他们对"文革"、对造反并无兴趣，与当地干部也谈不上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不过是借此"千载难逢"的时机，免费乘车回家而已。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那些刚刚下乡不久的知青身上。再说中国的农村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角落，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在处处都像上述地区那样严重。到甘肃的天津知青回忆说："(到甘肃后)每天就是开沟、挖大、小渠，平整土地，下过雪也让干活，用镐刨冰土，有些人受不了了，就开始嚷"回城闹革命"，跑回了家。一开始连里干部还派人去追"逃兵"，后来干脆就不管了。"有的地方两派互斗，下乡不久的知青成了局外人，工分口粮一切无人理睬，也只有回城一途。

还有的知青，参与了当地的群众组织，因为他们毕竟是城里人，见过世面，与仍然在城里的同学、家长，保持着各种联系，比当地人能听到更多的"小道消息"笔者当年曾在河北省宝坻县一个从天津高中毕业后到那里插队的知青炕头，见到厚厚一叠北京各大学的油印小报，据他说，都是他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寄给他的，这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某派能否取胜的关键。，这些知青因此而在群众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有的互相进行串连，有的则以这种身份进驻到城市，在城市设立了"联络站"。

各地农场或农村人民公社对知青的态度，同样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对知青已经无暇顾及；有的摸不准中央到底持什么态度，唯恐知青将火烧到自己身上，而有意放纵甚至动员知青回城。城市的当权派，因未得到中央的明确表态，也不知对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才好，只能以支持群众造反的总方针笼统待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总之，当时敢于劝止或"阻挠"群众进行"革命串连"的领导，是极其罕见的。

这种支持，当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许多地方的知青，合法地取得了与在校师生一样的串连待遇。例如当中央于 1966 年 11 月 16 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通知》时，广西自治区的"党委群众接待站"就曾拟定了一个计划，规定凡学校师生、下乡知青，或机关干部参加长征串连的，每人每月都由自治区补助 7 元人民币和 45 斤粮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再如插队知青相当集中的上海郊区金山县，曾从地方财政中一次签发"串连费"50 多万元；很多地区发给知青路费，予以各种方便，如据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知青说，"文革"一开始，当地的"一小撮走资派"就煽动知青回城串联，还发给每人 300 块

钱，让他们回城另找工作。这些钱，正如中央所要求，都是从国家或地方财政中开支的。

最甚的是新疆。新疆为参加"大串连"的师生和群众所发放的补助都堪称优厚，并不是仅仅对知青才是如此，乌鲁木齐市有中学生描述当时情形说：

第 63 节：二返城风潮(3)

从去年(即 1966 年)12 月开始，新疆地区出发的长征队很多，尤其今年以来更多。不少地区给长征队发了许多东西，如上好的皮大衣、皮帽、鞋、棉衣、棉裤、水壶、裹腿、手电筒及各种补助费等。由于长征人数很多，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设有接待站，每个接待站各有几十床以至上百床新棉被等，并派专人接待……有的地方接待不了那么多人，就想办法用汽车送往别处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六六・八八"战斗队造反长征队：《打回老家来，就地闹革命》，《新疆日报》，1967 年 1 月 17 日。。

很难想像远离家乡的上海知青能抵御这种声势和诱惑。

满怀献身热情的上海知青到新疆之后，才发现边疆并非尽如《军垦战歌》描述的那般如诗如画，他们抱怨说，兵团的劳动非常繁重，到摘棉花的时节，每人每天要完成定额 100 多公斤；有的师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根本不适宜开垦，结果苦苦干了几年，却发不出工资；兵团中有的干部对知青十分粗暴，甚至私设公堂，有 40 多种刑法；女知青的人身安全、婚姻自由得不到保证，有的人竟公然提出"兵团姑娘对内不对外"的口号，很多知青感到后悔，想方设法要回上海去。"文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最初是极力阻止知青串连出走的，据驻在南疆喀什的农三师知青回忆说，当时兵团领导在沿路设卡，查验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谁也走不了，但当"大串连"风潮终于掀起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抵挡了。1966 年底，他们发出了一个《处理支边青年回原籍搞文化大革命的四点指示》，据当时报刊的批判，这个指示"煽动支边青年离开新疆回原籍，还勒令回原籍搞文化大革命的青年统统把户口带回家去"《新疆日报》，1967 年 2 月 1 日。。

从《新疆日报》后来刊登的一些批判稿所透露的情况，可以窥见这场返城风的凶猛程度：

阿克苏丰收农场七连"革命造反团"的部分支边青年说："地委利用了部分群众的革命热情，开证明，给路费，给皮大衣和毡筒，放走了大批支边青年。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见到如此容易外出，以为中央有了指示，于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走了，仅元月 1 日至 5 日的 5 天内，地委就给我们农场要外出的人发放经费 2 万多元。大批人一走，有的连只剩了二三十人，各连负责人一个个跑到阿克苏，饱食终日，消闲无事，地委的问题也无人去追了……"《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打退经济主义的猖狂进攻--致全疆支边青年的一封信》，《新疆日报》，1967 年 1 月 19 日。

新疆八一农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说："畜牧厅农场有 380 名支边青年，这次外出"串连"和"告状"的就有 253 人(其中有 31 人是不告而去的)。农场的当权派给他们发路费和生活费(补助费)共计 27000 元。农田九队原有 80 人，现仅剩十几人，生产完全停顿。这是经过畜牧厅某副厅长、自治区党委农工部某副部长层层请示，最后由自治区副主席田仲批准走的。再如水利厅牧区水利队 400 人仅剩 80 人了。有的单位连锅炉工、炊事员都走了……一些人领上串连装备后把钱花了，甚至戴上新买的手表，穿上新衣新鞋，回家"养神"去了。"《无情揭露经济主义，坚决打倒经济主义》，《新疆日报》，1967 年 1 月 19 日。

1966 年 9 月才到新疆的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说："去年 11 月初，走资派非法批准我厂 291 名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返沪，美其名曰"恢复学生身份，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内开支车费 16200 余元；行李费 19500 余元，伙食补助费 1800 余元……(后来)仍继续允许我厂 57 名上海支边社会青年带职回沪串连，发给串连费 4400 元，至今未返回。在东方红高炉劳动的 113 名上海青年已走了 73 名。《揭穿煽动支边青年回沪的大阴谋》,《新疆日报》, 1967 年 2 月 1 日。

第 64 节：二返城风潮(4)

本来是由中央正式发文件发起和允准的一场运动，在控制不了的时候，就又归咎为"走资派"别有用心的捣乱，这是"文革"时期司空见惯的做法。

这场知青返城风，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不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他许多国营农场和农村，也因大批知青的离去，而使生产几乎陷于瘫痪。如浙江温州市永强区龙湾公社金岙大队部分下乡知青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文革"开始后，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精简安置办公室的老爷们蒙蔽部分青年，为他们大迁户口，让他们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又签发大批支票，开出大批证明，使青年大批外出。目前整个温州市的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已经寥寥无几。上海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崇明县各农村和国营农场也纷纷告急，说因大批知青和工人离开岗位，使大批棉花至今无法入库，大批水稻急需脱粒，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工作严重脱节，等等。

当然，因"大串连"失控而引起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绝不仅限于知青的返城。早在 1966 年 11 月，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大串连"正式开始后的两个月，中央就已意识到对这一做法必须有所限制，规定从 11 月 21 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这也就是说，国家不再为到处串连的群众提供免费运输了。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在 12 月 20 日以前必须返回原地，从 12 月 21 日起乘车不再免费。但这些限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之，在这场运动刚刚兴起，大批知青或投身运动，或随着"大串连"之风返城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单纯和盲目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明确提出任何与知青自身利益有关的要求。

（二）知青的组织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情况和目的，知青大规模返城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现出对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一种无言的不满和抗议，而随着返城知青的越聚越多，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他们最初、最直接的发泄对象是各级安置办公室，连中央安置办也未得幸免。早在"文革"爆发不久的 1966 年八九月间，从广西等地赴京的 70 多名下乡知青，就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

"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青年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占据办公室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又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在上访

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6 页。。"

具体负责安置工作的各地的街道干部更是首当其冲，知青认为自己是被这些干部骗到农村去的。如很多地区的知青批判安置办的干部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欺骗他们下乡，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干吧，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是省长、市长、书记、妇女主任……"要不就"某某农村是鱼米之乡，吃的全是大米饭，又有鱼，有肉，有电灯，有瓦房……是个极富裕的地方"，还组织青年去参观，给青年大摆酒席，灌输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毒素，等等。他们斗争这些干部，大多只是为出出气。在"文革"最动荡的两年中，各大中城市的街道、里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闹得最凶的，当推到新疆兵团的上海知青。

第 65 节：二返城风潮(5)

1966 年底，刘少奇的问题在全国公开，他被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当时最习惯的思路，他所做的一切，都该被"批倒批臭"，那么他奉行最力、发表讲话也最多的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教育制度"，当然也要列在狠批之列。就在这时，知青中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人意识到了，这可能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决策归咎于刘少奇，从而予以彻底否定，那么，他们回城的希望也许就不再是梦想了。知青的反抗，由此而深入了一步，其标志，就是成立了大量独立的组织，提出了知青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组织一度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知青是按下乡地区组织的，如上海到黄山茶林场的知青组织了"抗大造反兵团"，要回沪造市委和农垦局的反；也有的则基于共同利益，如有个组织叫"六--一、二、三"，参加者是广州市 1961 年至 1963 年的下乡知识青年，这是较早响应号召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由于当时这一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中央对具体措施并无一致要求，所以当时以陶铸为首的广州市委曾允许他们在农村劳动 2 年至 4 年以后，俟国家形势好转，予以回城安排工作的机会，为此还发给每个下乡青年一张日后准许回城落户口的"户口保留证"。1963 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工作作为 15 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允诺落空了，这引起这批青年的强烈不满，他们也希望凭借自己较为特殊的条件，从一般知青中区分出来，得到些特殊的照顾。前面提到的"六六--九"，也属于这类组织。很多地方的知青家长也组织起来，不仅在城市活动，还到知青下乡的地方去进行串连，如上海知青的家长就曾组织"支边青年家长代表团"，到新疆兵团的农一师"点火"。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城市，知青和家长还举行了全市性的集会示威，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知青的迫害。

有的知青组织积极到农村知青中去发展势力，并在城市中设立造反总部。他们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批判"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揭发控诉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揭露那些名噪一时的先进知青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文革"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有些因此而一蹶不振，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些知青组织的本来目的，其实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城"，是在城市安排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事实上，十余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虽然惊天动地，提出的要求也不外乎此。但是，越是这种很低也很实际的要求，就越是与当时的大环境不合拍，也就越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知青们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否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返城"唯一的、必要的前提。而否定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由刘少奇提出来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

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自1966年下半年开始，大量知青云集北京。当年年底广州市的知识青年到国务院，要求中央给予他们回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农业部和农垦局的有关领导接待了他们，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67年初，广州又有知识青年到京，专为来批判中央负责安置工作的谭震林；湖南长沙知青派出"汇报团"，拟向中央汇报湖南下乡知青的情况；上海到新疆支边的青年也纷纷前往京城，并着手筹办全国性的"农村地区革命知青总部"。

第66节：二返城风潮(6)

5月，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人举行集会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迫害，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静坐活动，广东及南方一些省城知青的返城活动，也是从此时起至六七月份，又一次达到高潮的。

知青们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对知青下乡后真实情况的披露，在社会上，尤其是有知青下乡的家长心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和反响。

（三）参与地方"文革"

很多知青都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文革"。尤其是1967年春季到夏季，当"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以后，各地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又有不少知青参与其中。知青们年轻，无家口拖累，很多人因处境的不如意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欲，这都是容易为人所用的因素。据说仅广州市，就有百余名知青死于这种武斗之中；而武汉市在一次知青与"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突中，知青一次就被打死十余人。但是，尽管有很多材料和当时人的回忆，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或过于简略，或仅是一面之词，或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由于无法核实，这里几乎没有哪一件可以拿来列举，如据说宁夏十三师的北京、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但我们既无法查实其准确人数，也无法找到较为翔实的文字记载，轶闻传说难得入史，这里便只能从略了。

可以证实的是，全国兴起武斗的第一声枪声，就是从知青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响起的，当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愕然震惊了，时间是1967年1月26日。

石河子是建设兵团农8师的驻地。农八师在"文革"爆发前的1964年到1966年3年间，共接收从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前来的知青2700余名，人数远不能与农一、二、三师相比，但这个新兴城市是兵团总部所在地，驻有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以及工二师、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6年底，北京和其他城市就有红卫兵到这里频繁串连，上海支边青年的家长也到此来串连点火，使它成为新疆地区风暴的中心。

从1967年1月开始，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车二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夺权，从1月17日至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8个单位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造反派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独立团支援，独立团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被造反派夺去枪支弹药若干。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部分部队调进师部，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又进行枪战。双方共打死24人，伤74人。

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军区认为是镇压歹徒，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是一起镇压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文件，作出对新疆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等 12 项决定。结果是有 1000 多人被株连，6 人被逼死，几十人伤残，农八师 216 名团级干部，靠边被斗的就有 165 人，占总数的 76?3％，直到 1979 年才被平反参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农八师垦区志·石河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2-203 页等。。据说曾经有知青多方调查，想了解事情真相，结果被打成反革命，直到 1979 年尚未正式平反《风刮不倒的红柳--记支边青年袁明》，《新疆青年》，1979 年第 2 期。。

在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间，据国外观察家宣称，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已达 120 万，仅广州就有 3 万知青回城，约占知青总数的 2／3。但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到华北兵团去的北京知青、到甘肃兵团去的天津知青都谈到，当时"回城闹革命"只是出身好的青年的专利。出身不好的，有的不敢折腾，有的在城市的家已经被抄，父母被斗、被关，回城也没什么意思；还有很多本来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或家庭关系不和而下乡的，更有不少本来就是没家的孤儿，回城也没有活路。很多人一直留在当地，有的认为因此而免去了"文革"的折腾，像躲进避风港，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总之，就"回城风"而言，南方比北方刮得厉害些，尤以广州、上海、湖南为甚。

第 67 节：三反对经济主义(1)

三反对经济主义

从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初，不仅城市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大量农村青年以及农民，也都在"立即取消城乡差别"的要求之下，成批地涌入城市。卷入这股浪潮的，还有要求转正的临时工、合同工，三年灾害时期被动员下乡或支援"三线"建设的内地、城市工人等，中央将这股浪潮，统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据揭发，这股浪潮的兴起，是由于江青的暗示与鼓励。但实际上，这正是解放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各种后遗症的一次总爆发。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不是这一类问题。这些人四处建立群众组织和联络站的活动，不仅使已经十分混乱的城市更加混乱，而尤为严重的是，他们的矛头所向和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当时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完全不合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制止这一倾向的继续发展。

知青的活动也被划入经济主义范围而加以制止。事实上，早在 1966 年底，经济主义的浪头还未涌现的时候，中央对于知青的各种做法就已有所警觉，尤其当他们越闹越甚，竟至要建立全国性知青组织的时候，中央已经感到了真正的危险。周恩来敏锐地看出了，这类组织和他们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足以使中央苦心经营多年的安置工作毁于一旦，而无论革命如何发展，上层领导如何变换，大批城市青年不到农村去，又能到哪里去呢？对于知青的组织必须取缔，对他们的要求必须回绝。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到农村去。

1966 年 11 月 27 日，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有人问到他能否建立全国性组织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很策略的，只是说，现在还是串连时期，就是全市的组织看来也只是部分的组织，这样的时期要经过一个时期，一派不能自命地代表全市，更多的意见现在不好提。12 月，尚未被"揪出来"的国务院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则劝告知青不要成立全国性的

组织，他说，你们的总部就是全国安置工作办公室，还有总理办公室，是总理任命的，你们能取代他们?实际上，你们这些人决不可能控制一百多万人。他的劝告，当然被知青当成了耳旁风。而此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也已经被一批又一批心怀怨愤的知青们连砸带打，搞得一片狼藉。

知青的活动，知青在城市建立的一切组织，都被作为经济主义的内容之一，划入打击的范围之内。

第 68 节：三反对经济主义(2)

1967 年 1 月 18 日，周恩来等人接见首都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提到北京有一些冒充欺骗人的全国性组织，他们的目的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要限令他们投降，宣布他们的组织是反动组织。他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全国性组织，就包括了知识青年成立的组织在内。22 日，在接见各地驻京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指责各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玩弄经济主义，用一种恶劣的手法，就是发钱、发车票，收买人心，鼓动人上北京，把矛盾上交，对中央施加压力，使得大批合同工、临时工退出工厂，下乡知青大批上京。他要求这些人尽快返回原地，同时强调，现在各个革命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机构的条件还不成熟，建立和参加这些机构的人员也应该回到本地去进行革命斗争。26 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工青妇等系统革命造反派时，有人提出希望中央发通知，宣布全国性组织为非法，周恩来又一次强调，我根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造反组织，全国性的组织我们都没有承认。2 月 1 日，他又敦促人"回去检查一下，任何全国性的联络站都不能成立"。

各地都开始取缔知青在城市的组织，并动员知青回乡闹革命。

上海在"文革"中一直扮演着独特的、先锋的角色。尤其是"一月风暴"之后，更成为全国造反派的表率，加之上海在"文革"前跨省安置的知青人数最多，仅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就达九万余人，"文革"一开始，就有几万知青返回上海，他们所描述的兵团生活实况，他们的情绪和痛苦，已经成为该市一个牵动了千家万户的敏感社会问题，要解决知青问题，首先而且必须从上海着手，而上海那些刚刚夺了权的踌躇满志的造反派，也正需找到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开始了。

第一步，是将"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知识青年发泄的不满和提出的种种要求，一概归结为是"走资派"为干扰运动的大方向所大搞的经济主义的阴谋，知青返城是受到了走资派的煽动。就像我们上面讲到新疆知青的返回上海，被归咎于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恶意煽动一样。

1967 年 1 月 18 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坚持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的正确方向》，说：经济主义的一个恶毒做法，就是煽动前几年下放或支援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人和支边青年回到上海，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还煽动支援边疆建设的家属，离开工作岗位，上北京告状，或挑动他们去斗争里弄干部。这样做，造成了一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直接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应该造反，应该揭发，应该批判，应该改正，但不要离开生产岗位。这篇社论还强调说，到农村去的大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接着是在报刊上大肆宣扬这一精神如何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据《文汇报》报道，社论发表的第二天一早，就有数百名静安区的革命家长结队到该报社门前报喜，支持社论观点，并表示要教育子女坚守边疆的生产岗位。据他们说，旧上海市委在支疆工作中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用物质刺激、欺骗、压服等手法动员青年去新疆，以致在人民群众中留

下了恶劣的印象。前些日子上海广大支疆青年的革命家长造了他们的反，使他们大为惊慌，于是煽动和批准部分家长离开工作岗位去新疆访亲，提出支疆青年几年"服役"期满也应"复员"回上海等不合理的要求。如今，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启示下，该区广大革命家长的革命组织--静安区支疆青年革命家长造反总部，已经提出了"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动员青年回疆。

第 69 节：三反对经济主义(3)

1967 年 1 月 25 日，"上海市支疆青年革命家长造反司令部"也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支持这篇社论，题目是《坚决支持青年在边疆革命一辈子》，控诉上海市委与新疆兵团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对支边青年进行欺骗、腐蚀和摧残，以经济挂帅、物质刺激来代替政治挂帅。"文革"开始后，他们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制造白色恐怖，对知识青年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迫害。2 月底，上海市虹口区支疆革命家属造反队总部赴疆调查团在《文汇报》发表《坚守生产岗位，就地大闹革命--致支疆革命青年的公开信》，说新疆的走资派大搞独立王国，挑拨新老职工的关系，还给支边青年乱开证明，乱发路费，使大批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可是大家都走了，走资派由谁来整呢?

1 月 29 日，上海和外地驻沪的 33 个革命组织发出《紧急通告》，要求知识青年坚守生产岗位，同贫下中农一起就地大闹革命。2 月 9 日，上海又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坚决走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正确道路--告上山下乡支边革命青年书》，声称少数走资派煽动青年倒流城市，任意安排工作岗位，肆意变更所有制关系，制造矛盾。这次大会，粉碎了他们的一次新反扑。大会还郑重宣布，这类签字，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针对支疆青年和家长将一肚子怨气都撒到街道干部身上的问题。2 月 9 日，上海工总司等 23 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了《关于街道里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通告》，警告知青们不要把事态扩大。同日，《文汇报》也发表了《斗争里弄干部，大方向就是错了》的社论。

与上海的行动相呼应，新疆也开始采取措施，由于当时新疆自治区尚无上海那样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一切通令只能以革命造反组织的名义发出，无论声势造得多么浩大，也只是声势而已。1 月 20 日，以新疆革命职工第一造反司令部为首的 27 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勒令自治区下属的各级当权派必须暂停办理一切出疆串连(包括徒步串连)的手续，停发外出串连物资，并立即追回未出发人员的出疆手续、串连费用以及一切借用的物资《新疆日报》，1967 年 1 月 20 日。。2 月 5 日，新疆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呼吁》："凡是受党内走资派蒙蔽、离开生产岗位流向城市和内地的社员、国营农场职工和支边青壮年，应立即返回原地，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参加农业生产。支边青年要扎根边疆，建设边疆，革命到底。同时，反对任何人拦截汽车，堵塞交通，严禁一切组织用任何借口开车到农村去胡乱拉人……"

在此前后，一些由上海知识青年组成的团体也不断地发出紧急呼吁书、公开信，要知青们坚守岗位，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参见《新疆日报》，1967 年 1 月 19 日、20 日、2 月 14 日等。，农垦部的革命造反委员会也发出紧急呼吁，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体人员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二?一一"决定，所有外出串联的职工和知识青年，要立即返回本单位；安置在国营农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安心农场的生产建设，要坚决揭露一小撮走资派玩弄的"矛盾上交"的把戏。但这些呼吁既然并无权力做后盾，也只是呼吁而已。

与此同时，江苏、浙江、贵州、宁夏、黑龙江等省的革命造反团体，也都发出了类似的《紧急通告》，敦促前几年已经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心农业生产，积极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听信坏人的挑动和欺骗，盲目流入城镇，以免使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如宁夏以"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第二号通令，其中提到："一、财经大权，一律由革命造反派掌管，严禁乱批条子，乱许愿"。又及："一、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镇。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当权派擅自决定供应粮食的规定立即作废"。《宁夏日报》，1967 年 2 月 5 日。

第 70 节：三反对经济主义(4)

这些都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各地返城知青和家长对此并未予以多少理解，更谈不上支持。实质性的是第二步，1967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同日，还下发了《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全文如下：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广大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已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小部分人，以种种藉口长期在城市逗留。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

二、有些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影响，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他们回到本单位认真检查，勇于改错……

三、还要出外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惩办。

四、对于安置工作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五、前几年精简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的安置问题，也应按上述第三条的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此通知可在农村和城镇张贴。

这一通告与差不多同时发出的要求外出串连的学校师生返校参加军训和"复课闹革命"等措施一起，表示了中央决定将这场运动限制到一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秩序的意愿。点火的目的已经达到，不能再让火漫无边际地乱烧下去了。

北京的军管会宣布了一批非法组织的名单，一个全国性知青组织也被列入其中，这标志着对知青组织采取行动的正式开始。

在上海，通知下达的第二天，市革命委员会就对该市的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等组织发出了紧急通告，要求凡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的单独组织与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的联络站应立即停止活动，并要求有关单位停止对这些组织的物质、资

金供应。从即日起，清查这些组织的所有财产和资金。其银行存款也由人民银行冻结，停止支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转移、隐匿、挪用、私分。然后，由公安机关出面，取缔了"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等组织。知青的返城活动，由此进入低谷。

在自上而下严厉镇压知青组织的同时，各地都着手进行了遣返知青回农村和边疆的工作。2 月 20 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以通栏大标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刊载了黑龙江"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上海下乡知识青年革命造反总部"以及山东单县谢集公社 56 名知识青年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

第 71 节：三反对经济主义(5)

煽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地离开生产岗位，涌到城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又一种形式。这一阴谋诡计已经被彻底揭穿了，许多受蒙蔽的知识青年坚决表示：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革命造反派应当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他们这一革命行动。当前，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兴起，春耕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在这关键时刻，知识青年更应该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守岗位，坚持战斗。已离开农村的要迅速返回，杀它一个回马枪。

1 月底，上海市曾举行了成立华东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委员会的誓师大会。据说，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下达之后，该组织即宣布撤销设在上海及华东各地的全部机构，以便使其人员一个不留地返回农村。自 2 月起，在沪的华东地区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农村的已达 8000 多人。其中如上海农业建设队和黄山茶林场等地有 1000 余名知青返回。此外，据《文汇报》报道，自 2 月中旬起支疆青年中也有人开始陆续返回新疆。如 2 月 16 日，闸北区的天目西路和汉中两个街道就欢送了 5 个回疆青年；20 日，南市区也有 5 个青年回疆。3 月 5 日，南汇区 140 名支疆返沪青年从上海起程，他们都是 1966 年才从上海赴疆的。仅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数字就可看出，实际返疆的青年是微乎其微的。

四川省动手较晚，3 月 2 日，该省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提出，凡外出串连或到县、专区、省和赴京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立即回到本地区，本社队，所有农业劳动力，都要坚守岗位，不得随意离开。3 月 15 日，该省又以生产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动员目前尚在外地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迅速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尚在外地、外单位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 3 月 20 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学习、生产劳动；二、要求各级生产委员会、各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各接待单位，对目前尚未返回本单位的上述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复地向他们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动员他们尽快返回；三、交通运输部门应妥善安排运力，帮助旅程较远的上述人员解决乘车乘船问题《四川日报》，1967 年 3 月 15 日。。"

从这一通告也可看出，该省对知青采取的措施并未如上海那样严厉，事实上，当时全国的情况是极不平衡的，还有许多省市，甚至连四川这样的官样文章也没有做。

第 72 节：四"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

四"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1967 年春季到夏季，"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各地日益升级的大规模流血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大多数知青仍然滞留在城市，也有些

曾迫于年初的形势而返回农村，但从当时几乎空无一物的报纸上也透露出，农村的混乱使他们无法立足，有的知识青年一返回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有的被取消了自留地和口粮，他们只有再次回城这一条路。在上海、四川等城市，有部分社会青年"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在市内安排了工作，更引起不少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思想波动。很多城市中的知青组织本来就未因一次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而得到彻底清理，至此就又一次趋向活跃了。据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 6 月 29 日向国务院的报告："5 月以来，下乡青年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 40 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在中央各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为首串连 700 人，将于 7 月 3 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 7 月份大批来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1 页。。

中央再次采取了行动。

1967 年 7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全面阐述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这是"文革"期间中央关于知青问题所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社论，它表明了，尽管"文化革命"已经将"文革"前 17 年的几乎一切方针政策都予以了否定，但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刘少奇确实插手甚多的政策，却采取了坚定不移的立场，这使已经下乡，并将这次"文革"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的"老知青"，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这篇社论首先赞扬知青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革命"中，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他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成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战士。然后进入正题：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散布大量毒素，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生意经，到处封官许愿……他们对起来造他们反的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迫害，特别恶毒的是挑拨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的关系，采取欺骗利诱、甚至克扣口粮等毒辣手段，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

文章敦促一切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文章还教导知识青年说，应该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有些人回去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应该从全局出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城市中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他们，绝不许走资派经任何借口对重返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进行打击报复。

社论发表之后，再无任何知青组织和个人敢于公然提出回城要求了。

中央继续行动。10 月 8 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回城知青立即解散设在城镇的知青团体和联络点，不准城市的群众组织接收知青为成员。同时，这个通知也要求各地改变对知青的恶劣态度，强调下乡知青与当地社员、工人应该享

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得降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得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也不得将他们赶回城镇。在秋收时一定要安排好知青的口粮，对他们的住房也应予以适当解决。

各地对中央这一精神立即作出响应。9 月 8 日，江苏省军管会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动员逗留城镇的下乡、支边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下放人员返回农村、边疆的通知》《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10 月 8 日的中央文件下达后，四川省则由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出面，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参加的有宜宾、凉山、自贡等 11 个专区、州、市的有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代表，讨论贯彻中共中央 10 月 8 日紧急通知的精神，动员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要求各地对知青不得歧视，不得压低工分，不得因观点分歧而刁难、迫害或撵知青回城镇，还强调知青即使被打成反革命的，也应返回农村，就地平反。会议发出了《给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文革"一开始，就有知青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也有一些知青已经"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公开信将这些账都算在了四川省委和李井泉身上。同时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强调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7 页。。

第 73 节：四"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2)

11 月 24 日，周恩来再次强调，对返城知青问题，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他说，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为了将青年尽快动员回边疆和农村，在 1967 年，上海等地的接待单位曾采取过为支疆青年代购直达车船票的办法见《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边疆建设的职工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问题给上海市革委会后勤组的复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自己能够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由接待单位代购直达车船票。所需费用，如果本人归还有困难，可由所在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证明，由接待单位报销，1967 年 2 月 27 日。"，结果有的知青钻了这个空子，或利用公费多次往返于新疆和上海之间，或将车船票私自倒卖，然后仍然滞留上海。还有的以为在新疆的同伴带东西为名，骗取支边青年家长的财物。因此到 1967 年 11 月，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各地都停止了这种做法，要求返疆知青凡能自己解决的，一律自己解决。

知青的返城行动和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事实上至此已经失败了。即使有的组织还不肯立刻解散，他们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但是，在社会仍处于大动乱的形势下，任何通告也不可能真正奏效，绝大多数知青并没有立刻返乡。直至 1967 年底，当"文革"期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已经开始酝酿上山下乡的时候，仍有不少"文革"前的老知青在城市游荡，他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农村。如上海闸北区新疆路街道干部称："我们街道前几年中支边青年受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煽动，不少人返回上海，至今不归，有的人已经成了十足的逍遥派"。这些知青自己，则有的仍不服气："动员我们支援新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想再拖拖看，"我们是要回去的，但是要再等待一段时间"；还有的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现在准备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有一些则找借口，说是要留在上海，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以便回去更好地战斗。据说，他们中有人已被一些坏人带上了邪路，沾染上了流氓阿飞习气；有的家长纵容子女在沪逍遥，要子女寻找对象结婚，幻想在上海安排工作。

第 74 节：五返城风的平息(1)

五返城风的平息

1968 年，中央又一次对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因为由红卫兵席卷起的新一轮上山下乡大潮已开始进入高潮，"老知青"留城不归，已明显是"逆潮流而动"了。

仍有些组织不甘心失败，典型的如湖南的"省无联"(全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据当时文章批判说，这个组织是由三种反动力量组成的，一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和陶铸的黑爪牙，一种是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一种，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文章说："他们与全国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妄图在湖南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宣传，有行动，有反动"纲领"的"《湖南日报》社论：《精神抖擞，心明眼亮，彻底摧毁"省无联"》，《湖南日报》，1968 年 2 月 3 日。。这个组织印发名为《衰亡中国》的刊物，提出上山下乡是"修正主义运动"的观点，还号召继续革命，建立非官僚机构的公社。从他们的纲领来看，这是个极左派的组织。

当时中央提到，对这个组织提出的纲领必须批判，因为这个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和学生中，特别是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有影响，有些知青进入了这个组织。1968 年 1 月这个组织被取缔，《衰亡中国》也被列为反动刊物。

2 月 2 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三口军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讲话，强调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上山下乡，不仅要动员青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他说，有些青年乱说还要回到城市，不想下乡上山，说下乡是刘少奇的黑线，那是错的，连我们机关都要做(下乡上山的）准备。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在当时的情境下，上山下乡已经是大势所趋。

广州市从 1 月份就着手这项工作了。1 月 19 日，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协商小组联合发表了《致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所以对于策动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定要采取专政措施。信中要求至今仍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根据去年 10 月 8 日中央文件精神，立即主动地撤销各种组织，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吸收下乡知青参加，还要求知青家长不要再组织什么家长造反组织《南方日报》，1968 年 1 月 29 日。。

上海市是动员知青返回农村、边疆的任务最艰巨的城市，从 1967 年初开始打击经济主义开始，动员工作就迄未停息。这一攻势一直持续到年底，也就是新一代的知青即"文革"期间的在校中学生也几乎下乡殆尽时才告终止。

2 月 23 日，《文汇报》在报道支疆返沪青年回疆一事时发表编者按，说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示要坚持支援边疆、支援农业、支援内地的革命大方向。文章说：

盲目返沪的支边青年们：你们受骗了，应当反戈一击，"杀"回新疆去。如果有人硬要拖住你们的腿，唆使你们赖在上海，那么，必须擦亮眼睛看一看，他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的家长都要以革命为重，教育返沪的子女立即返回新疆，如果再把他们拖在身边，实际是把子女拖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是害了他们。

25 日，该报又进而发表答读者问，把知青下乡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赫鲁

晓夫"刘少奇和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身上。针对有的青年"我们返疆若受到歧视和打击报复怎么办"的问题，该报轻飘飘地回答说："相信广大群众会正确对待的，决不能因为害怕打击就不返回原地。"有的青年问，支边青年如果不愿意返回新疆，是否可以到江西、安徽等地的乡下务农，回答是否定的。该报一再强调，中央的有关通知和通告已经明确规定，坚决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在断绝他们回城之念的同时，警告各群众组织不准拉他们参加什么"小分队"、"联络站"的活动。

除了造成浩大的宣传攻势之外，找出一些特别活跃或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坏分子"，予以严厉的镇压，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街道里弄干部一直首当其冲。虽然从上年年初开始，上海市革委会就一再制止知青们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但看来收效甚微，这些人还是不断遭到批斗甚至殴打。如普陀区的"部分革命群众"提到："今年以来，发生好几起殴打里弄干部的事件，有时挑动一些觉悟较差的支疆青年家长出场挑衅，有时唆使一些流氓阿飞充当打手。有个里委会的党员生产主任在最近半个月内竟连续 4 次被打"《警惕坏人再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里弄干部》，《文汇报》，1968 年 3 月 25 日。。广州也存在类似现象，一些知青"冲击街道革委会，绑架、殴打革命干部"《南方日报》，1968 年 8 月 22 日。。

第 75 节：五返城风的平息(2)

上海市从 5 月底开始，就又一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先是在各街道里弄召开斗争大会，如徐汇区枫林路街道曾连开两个斗争大会，斗争一个"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据说这个坏家伙在历史上就曾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祖父是个被管制分子，哥哥也被政府镇压，所以他对党和政府有刻骨的仇恨。"文革"中他打着造反旗号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印发了大量反动传单，造谣说街道和里弄干部动员一个青年到新疆去，可以捞到 800 元到 1000 元的钞票；一个家长还揭发他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曾经诬蔑造谣，说我的儿子在新疆被活活钉死在木板上，急得我们精神失常，影响了生产。不久我的儿子从新疆寄来了家信，说他在新疆一切都很好，我们才识破这个坏家伙的真面目。"《坚决打击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文汇报》，1968 年 5 月 26 日。

面对家长的不满和压力，该市革委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文汇报》曾借一位支边青年的口揭发她的父亲破坏她上山下乡的罪行：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文革期间混入"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静安区愚园路街道造反队，煽动受蒙蔽的群众殴斗里弄干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于去年 10 月返沪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停止活动后，他龟缩家门，伪装老实，背后恶毒谩骂里弄干部，要我耐心等待，到文革后期想法留在上海……还要我跟丈夫离婚……《威胁利诱全不怕，"杀"回新疆干革命--支疆返沪青年何爱之与反动家长一刀两断》，《文汇报》，1968 年 6 月 21 日。

在如此反复宣传，反复向"坏人"施加压力的同时，上海市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于 6 月 7 日凌晨"发动强大攻势"，将"一小撮一贯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支援内地、支援边疆、支援农业工作的罪犯"一并逮捕。据说，这一小撮人中，有些是混杂在群众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制造事端，煽动闹事，纠集歹徒殴打准备返回农村的人员，寻衅冲击车站、码头，打着造反旗号殴打里弄干部，进行打砸抢，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和革命新秩序，他们之终于落入群众专政的法网，实乃大快人心。

上海这一做法并不是孤立的。这年夏季，对于返城知青来说，形势是益发严峻了，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分子的活动。

这一活动是与整顿城市治安、制止武斗升级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7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广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像当时一切中央文件一样，布告不是针对广西一地，而是针对全国的。布告要求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并特别要求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破坏交通、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恶活动，要求对这些人实行群众专政。这个布告的第四条又一次重审："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半个月后，又一个与其内容大致相同的《七·二四布告》出台。此时"文革"爆发已经两年，形势却仍然十分混乱，流血、屠杀事件层出不穷，连续发布两个布告，既透露出形势的严重程度，也透露了制止这场混乱的极大难度。

第 76 节：五返城风的平息(3)

为贯彻中央的"七三"通告，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委会发布了一个《告外地来广州市人员书》。书中提到很多下乡上山人员"以种种借口，擅离岗位，长期插手广州地区文化革命，甚至干了一些违法乱纪，危害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它还特别嘲骂了有些上山下乡人员是"打着造反旗号，披着革命外衣，装出一副受害者的脸孔，公然污蔑下乡上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对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处境谈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该布告要求返城知青立即返回本单位，并且强调说，对这个布告采取什么态度，是对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个考验。这是在对那些吸收了知青的组织施加压力《南方日报》，1968 年 7 月 20 日。。紧接着，一场"群众专政的革命风暴"就在广州市街道兴起了。在解放军部队的配合下，各街道都"狠抓阶级斗争"，动手进行对倒流城市的支农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知青被迫撤离了据点，拆除了武斗工事，交出了凶器和抢来的物资，纷纷检举坏头头，退出了组织。

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中城市在 1968 年下半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以"群众专政"的形势，在城市中进行着"政治大扫除"，这种做法到当年的国庆节前达到高潮，如上海市就曾宣称由"公检法机关、文攻武卫战士、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上所有的阴暗角落进行了一次全面大冲刷，割除了社会毒瘤……"《政治大扫除好得很!》,《文汇报》，1968 年 9 月 21 日;《本市文攻武卫战士今晨再战告捷，一小撮犯罪分子一个个束手就擒》,《文汇报》，1968 年 9 月 23 日。所扫除的对象，就包括了知青。他们还每隔几日，甚至天天在夜间突然到车站、码头、各公共场所甚至居民家中去"查户口"，给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家长，造成了莫大的压力。

返城知青至此，已不可能再对留城抱有任何幻想，返乡已经是唯一的出路。到这年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即使是在校的中学生(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老三届"即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生)想要留城尚且不得，更遑论这些早已失去城市户口的知青了。针对他们的措施都极其严厉，有的城市甚至曾统一收走这些知青家长的户口本和粮本，知青不返乡，粮本就不发回，全家没粮吃。于是，到 1968 年底，各地知青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他们下乡之地。

这场知青返城风就这样很快夭折了。它的水平、规模、对社会的影响和结局，与十年后的知青大返城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十分深刻的。

知青的返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它压抑个人选择生活道路的机会，将众多劳动力强制束缚在已经饱和的有限的土地上，在反复不断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背景下，无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视与矛盾，下乡知青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不可能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冷酷环境中与农民"结合"，因为结合总是需要感情的。

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和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对于他们的先行者，因地区的不同，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但其中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学生，态度是相当地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复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有些红卫兵参加过对知识青年组织的批判，指责他们是"为私造反"；也有些比较认真的学生动身到农村，对知青的状况进行过调查，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将知青的种种不满和苦闷归结为"素质差"。应该承认，"文革"前刘少奇搞的"两种教育制度"以及因此而造成的青年中的不平等，在在校学生，尤其是重点中学学生的头脑中是有深刻影响的，"文革"初期对"红卫兵小将"的吹捧，更使他们对自己的估价高到极致。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比他们先行一步的老知青，心里并不认为自己与他们是一种人。这就是知青这次返城风的悲剧。

第 77 节：六先驱者(1)

六先驱者

知青们为返城进行的第一次抗争终归失败，他们偃旗息鼓，再次回到广阔天地，再次去当有文化的新农民了。

但是，"文革"的这段经历对他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毕竟是"文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正常运行的社会中不可能提供的天地。经历过与他们同龄的大中学校学生未曾经过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看到过那些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看不到的社会角落的这批知青中的优秀代表，对于自身，对于中国社会和农民，有着更成熟，更认真的思考。在南方一些省市如广州、湖南、四川等地，老知青在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探讨是尤为突出的。这些地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比例较大，素质较高，其中不乏出色的人才。一位四川的当年在校红卫兵回忆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老知青在思想上比他们更活跃，更成熟，也更激进。学生们当时关注的，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但老知青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他们中很多人熟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后来才明白，他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们反复地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论证"文革"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其实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只有论证了这些不合理，才能证明上山下乡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即便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的学习和探索，他们的目光所及，毕竟达到了当时的在校学生不可能达到的深度，于是，这个时代最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的号角，最夺人眼目的思想解放的先驱，既未出现于"红卫兵小将"之中，也未出现在当时的社会精英集团中，而竟然就在这些从未引起人们重视的知青中脱颖而出了。

我们在这里指的，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

制问题的研究》。

30 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不得不承认，即使有的人比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更完满，更走在时代前面，但却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思想更尖锐，更大胆，对一代青年造成的影响更强烈了，无论从哪种角度，他们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

然而，即使承认这点的人，也几乎都未曾想到，他们都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识青年，是那个至今仍被人漠视的群体的成员；而且，那段经历，对他们思想的形成，都起到过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张木生，他对中国社会、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是直接从他在农村的实践中生发的。

（一）遇罗克与《出身论》

在第八章中我们已经叙述了遇罗克的人生经历。到"文革"爆发时，他已经不再是知识青年，但当知青的坎坷道路无疑对他思想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第 78 节：六先驱者(2)

《出身论》发表在 1967 年 1 月 18 日《中学文革报》的创刊号上，这份报纸只出了这一期就停刊了。"文革"是思想专制最严酷的时期，却同时也是对民间各种思潮、各种言论一度失控的时期，只要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号，往往可以有意无意地干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单纯的青年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看到了许多在正常社会中也许永远看不到的东西，这成为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途径之一，也成为日后思想启蒙的土壤。《出身论》就产生在这种特定环境下，虽然看上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却是理所当然的。

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出身对青年造成的危害："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三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中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对于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中主义观点"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是这篇文章最具特色，最富战斗力，也是当时最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之处。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作者敢于公开地大胆地宣称，盛行一时的那副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他说，它的错误在于，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而实际上，社会影响也罢，家庭影响也罢，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第二部分：重在表现问题。这段是全文的重点，也是篇幅最长的部分。作者在这段文章的批判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锋芒。首先他明确指出，出身和成分截然不同，关于党的阶级政策，当时最权威的解释是"一我们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甚至不少高级领导人谈到出身问题时，也以这段话教导青年，遇罗克却指出，这是不看对象，是把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话，用在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他揭穿了当时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这一观点的虚伪，他说："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

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最后，他又指出，出身好坏与保险与否毫无关系。针对一些人常说的"黑五类子女不保险"的问题，他批驳说，这貌似立场鲜明，貌似有阶级观点，其实，这是阶级偏见："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第三部分：受害问题。这里说的"受害"，指的是"文革"开始后很多出身好的青年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其内容如"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的确如遇罗克所说，这是颠倒黑白。我们在前边几章已经阐述过，从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国家就一直在教育部门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为工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做法到 60 年代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已达到极点，真正被拒之门外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遇罗克在这段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这种做法对青年身心造成的伤害：""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第 79 节：六先驱者(3)

最后，他呼吁："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这声呼喊即使今天看来，也太"大逆不道"了，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会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本身就几乎是一个奇迹。

正如今天一些谈及遇罗克的文章所说，《出身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就当时来说，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并不都是支持它的，即使觉得它说得有道理，却也如一个干部子弟所说，认为遇罗克的心理"太阴暗了"，这是当时社会最普遍的反映。的确，在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批得臭不可闻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而又紧，官方媒介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平等和爱，甚至也绝不能存有一丝调和和温存的时候，遇罗克却敢于公开宣称：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实在是太超前了。然而，这也正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所在。

所谓反响，其实也是极其有限的，看过《出身论》，知道遇罗克的，仅限于北京部分中学生这样一个狭小的圈子。

遇罗克则因此而被逮捕，并被枪决，他为自己这篇思想解放宣言，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生命，以及全家的被株连。

一代青年同样为此付出了代价："文革"使唯出身论的做法变本加厉。"文革"之前，总还有个"重在表现"的政策，"文革"却连这一政策也撕毁了，当"文革"期间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再次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在校期间付出的一切努力，包括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都被一概抹平，他们都"平等"地成了新农民、兵团战士，但是，这种平等实际上孕育着最大的不平等，因为几年以后，当他们面临着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时，被选择的唯一条件就是：出身。

于是一切才华，一切努力，一切表现都付诸东流。

在建国以后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这里指的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一代)就这样面

临了人才选择上最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个人来说，是使很多优秀的人才丧失了发展的机会；而从国家来说，则使这一代的精英集团从整体上降低了素质。

十年后遇罗克终获平反，他的《出身论》和他后来的遭遇也被公诸于世，这一切对那些心头从未笼罩过"出身"阴云的青年一代来说，恐怕并无出奇之处，但对于曾在那种气氛下生活过的人，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绝大多数人是到此时方才知道，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消除这种不公平发出过呼喊，成为思想解放的殉道者。

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黑夜中一道刺目的闪电"，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他是这一代知青的骄傲。

（二）张木生与《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遇罗克阐述的，是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张木生关注的，是"体制"，二者都触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要害、最敏感的问题，也就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不过，张木生并未遭到遇罗克那样的厄运，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出身有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专门阐述过"文革"前下乡知青中那些高干子弟的某些特点，张木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无论他在校时的表现，下乡后的经历，还是"文革"中的实践，在他那个时代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不惮篇幅，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他的经历。

第 80 节：六先驱者(4)

他原是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 年初中毕业，1965 年 7 月作为北京市集体组织的到外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同陈伯达之子陈小农等人一起，下乡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据他本人回忆本段内容，部分来自笔者 1994 年春节与张木生的谈话，部分摘自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3 年版)。张木生认为吴思这部书的记述大体属实。，作为高干子弟，他们当时已大体得知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毛泽东对王海容说那个上课睡大觉、考试抄别人的学生"有出息"的话，给他的影响很大。从在校时起，他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内学习倒被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效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也坚信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下乡落户的思想动力。

他回忆当年的生活说："开始真是苦学苦干……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 5 个钟头，苦干 14 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活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虮虱子，还鼓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精神。"

"当民工挑泥，一担 200 斤左右，27 天压得我拉了 26 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

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

拼着命干了一年，他们所在的大队分值更低了，几位知青大惭，发起一个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了出来，衣服、被子、现金、药品，能捐什么就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这里可能是回忆之误，因为这个提法是 1968 年底才出现的)，骨子里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有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文革"爆发后，这几个知识青年也回到了北京，与其他一些对上山下乡怀有一腔怨愤，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张木生等人满心里渴望的仍是进行革命实践，仍然抱有一腔热情和理想。他回到母校，却没有斗争老师的心思，而是与一些在校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想仿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办讲习所，搞共产主义实践。至少，可以认认真真地读些书。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讲习所几乎就要在湖北农安办起来了："我们动手太晚了。1967 年 1 月，"红色风暴"在全国掀起，各级组织一下子瘫痪了，学校根本无法再办起来。其实，按那时的条件，早上一年，没准真能搞成。"

第 81 节：六先驱者(5)

1967 年冬，张木生去了大寨，然后在北京待了一段，春天回到他插队的临河，他还想圆那个办讲习所的梦："我仍不死心，于是又拉了一批人，有知青，也有北京的学生，觉得在城里折腾得没劲，就来了，一共有六七个人吧。我们理解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革命总是从最落后、最偏僻的地方最先燃起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五星公社的五家村大队，这是全县最穷的公社中最穷的大队。这次与在湖北红安那次相比，条件可差远了，我们把牲口圈什么的全利用起来。闻风而来的知青一共有三四十人。我信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是办成事的第一步，我们就搞大组织，这个组织不参加造反，只是想搞讲习所，想读书。大纲编出来了，课也排了，算是热闹了一阵子。"

"从春折腾到秋，足足闹了大半年，钱也没有，权也没有，知青们觉得还不如在生产队，什么名堂也闹不出来，心就冷了。我真正死了心，就在这时候。"

回到村里，他却发现了一个奇迹，与他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李秋梦，在五星公社的讲习所只待了一个月，认为没什么意思，就回生产队去了。那时各级组织都瘫痪了，没人管，李就毛遂自荐当了队长，他小打小闹地试着搞了小型的包干制，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还组织了泥瓦匠、皮匠、鞋匠等等出去搞副业，还在队里办起磨坊、油坊，结果到秋天张木生回队时，队里竟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

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开始拼命读书，读马列和毛著，也读当时的"禁书"，包括当时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也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右派言论集，等等。他与后来也到临河插队的几个同学一起，常常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说，这时他已经想到了体制问题。

在大量读书和思考的基础上，1968年秋，张木生写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全文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他要从肉体上消灭富农，总共60万富农，让他杀了40万，剩下的"自行消灭"，弄到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去。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苏联的粮食产量到了20世纪50年代还赶不上1913年的水平，这难道是马列所说的社会主义吗?当然，在当时话还不敢说得太直露，只是客观地进行了描述。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将合作化之前与大跃进作了一个对比。他发现毛泽东在不同时期说的话也不一样，三年灾害后为了尽快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他一度也同意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三自一包"措施；毛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张木生抓住了这句话，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就存在着列宁批判过的那种主观社会主义的、民粹派的、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针对学大寨运动的。当然不能把这场运动说得一无是处，只能说学偏了，说大寨那种评工分的方法是奖懒罚勤，不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第82节：六先驱者(6)

第四部分分析1957年以后说假话说空话的根子。

第五部分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张木生最后写了从1956年起反反复复在农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要求，他说："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没敢说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所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是"产量上升，方向不对"。

他也怀疑到了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问题，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如果不从外面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就有自发地走向工联主义的危险，工人阶级尚且如此，更何况农民，毛主席不是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

作为干部子弟，他比一般青年能够接触更多的书籍，了解更多的信息；作为"文革"前的下乡知青，他比在校的学生乃至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换一个角度和环境，从底层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文革"的爆发，又曾给予他一个检验自己理想成败的舞台，这几环中缺了哪一环，也许都不会有《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诞生。

张木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他在北京的同学李小峰，并附了一封写得更为直露的信。反响是十分强烈的，很快就出现了手抄本，然后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他一下子收到了二百多封信，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看过这篇文章后很受启发。当然批判的文章也不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内蒙古突泉县(今属吉林省)学田公社插队的一批北京知青，他们在所编刊物

《广阔天地》中组织了一批批判《中国农民问题学习》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这些批判文章所指，并不仅仅是张木生的这篇论文，而且是针对当时知青中存在的种种现象的：

那个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招牌，到处妖言惑众的张木生，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地、顽强地、巧妙地争夺着这一代青年；修正主义拼命地侵袭着青年的灵魂，企图占领思想阵地。而张木生、李木生，还有那个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的徐浩鸳及写了篇狗屁洋文《历史哲学》的赵金星之流，已成为他们的俘虏……

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苦钻大部头，却对毛主席著作不感兴趣；大读封资修小说《麦田守望者》(美国)、《向上爬》(英国)、《怎么办?》(俄国)、《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之类；欣赏星期音乐会，唱黄色歌曲、黄色小调……很多鬼事鬼现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总之，在意识形态方面，青年中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好像见过了世面，好像看破了红尘，好像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没有关心的必要了，好像工人、农民不如自己高明，没有什么接受再教育的必要。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不到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在思想空虚、情绪消沉之中放纵自己，寻求刺激，对毛主席著作、报纸、红旗杂志不感兴趣，却津津乐道于封资修的腐朽文艺。对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修正主义的人性论，明知不对，却共鸣为快。

透过这篇空洞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些知识青年已经开始厌恶盲目、空洞的极左说教，而兴起了一股要求对社会、对人生进行独立思考，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自己解释的思潮。

总之，这篇文章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那个文化专制统治最严酷的时代，在思想界一片荒芜的情况下，这些青年的思考，就像冰封着的大地下涌动着的春意，"文革"结束后，它终于一发而不可收，生长成一片蓬勃的浓绿，汇合成一股澎湃的春潮张木生并未如如今一些文章所说被打成反革命，他的文章的确曾被人写成内参告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等人那里，但据说周恩来读后，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革命来对待，这使张木生得以平安无事地过了好几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1972 年，张木生还从插队的临河被招工到呼和浩特市，但就在这时，他自己说，不知赶上了哪个浪头，却被逮捕了，在呼和浩特的监狱关押了半年多。1973 年出狱后，他见到尚未被"解放"的胡耀邦，胡耀邦说他看过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表示同意张的看法，并且支持他回京，搞有关农业的研究。后来，张木生果然一度成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还要提到的是，遇罗克、张木生等人与后来下乡的"老三届"知青，毕竟是同时代的青年人，在"文革"中他们曾一同活动，也一同思考过，这使"文革"前后的两代知青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某种延续性，关于这点，我们还要在下一章中详谈。